

 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

中共党史学概论

宋学勤 / 著

ZHONGGONGDANGSHIXUEGAILUN

21 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

中共党史学概论

宋学勤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学概论/宋学勤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8
21 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6218-8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3520 号

21 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

中共党史学概论

宋学勤 著

Zhonggongdangshixue Gai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4.5 插页 1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2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以来，始终重视教材建设。中共党史学科和中共党史系的创始人何干之教授早在1954年就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被高等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先后三次修订再版，到1959年发行上百万册，并被译成俄、英、越等各国文字在国外发行。中共党史系已故老主任、著名党史学家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自1959年正式出版，到1966年底，共印行138万册，1979年后再版20万册。进入80年代后，中共党史系原主任杨先材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亦印行上百万册。90年代后，中共党史系原主任何沁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原主任王顺生教授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均印行数十万册。

当今学术研究进展迅速，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不断涌现，大有令人应接不暇之感。一方面，考虑到教材应当跟踪和反映最新的有共识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系本科教学亦亟须编写专业主干课教材。特别是目前使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基本上都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无论是涵盖范围、材料还是观点均已落后于时代和学术的发展；1991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90年代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近几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高质量著作但并非教材。由此可见编写一部最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教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除了传统的专业教材以外，近些年出现的新课程和新的研究领域，也需要编写教材，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党的建设等。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目前组织编写了第一批教材，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中国近现代史概要》、《中国民主党派史》、《中



《中共党史学概论》七本。教材的主要对象是本科生，但也适当考虑到硕士研究生、党政干部和对党史国史有兴趣的读者的阅读需要。

为了保证教材编写质量，我们特别组成了编委会，其成员主要是中共党史系的在职教授和兼职教授。当然，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缺点甚至错误难以避免，还请各方专家不吝赐教、批评，以为将来修订之用。

“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编委会

杨凤城 齐鹏飞执笔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共党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	1
二、中共党史学概论的科学体系	2
三、学习中共党史学概论的方法与要求	4
第一章 中共党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6
第一节 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	6
一、历史是什么	6
二、历史学是什么	8
三、中共党史与中共党史学	10
四、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	11
第二节 中共党史学的学科特点	13
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13
二、政治性与科学性的融合	13
三、理论性的升华	15
第三节 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16
一、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	16
二、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内容	17
第四节 中共党史同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联系和区别	17
一、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	17
二、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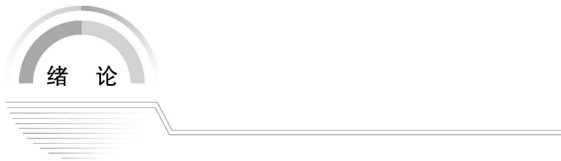
第五节 中共党史学的功能	21
一、历史学的功能解析	21
二、中共党史学的功能定位	27
第六节 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素养	29
一、哲学观点与学术立场的锻造	30
二、知识基础与生活经验的深化	31
三、高尚情感与性格气质的锤炼	33
四、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	34
第二章 历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	37
第一节 历史观与正确地认识历史	37
一、历史观是什么	37
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蕴	39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	43
一、中共党史研究的萌芽阶段（1924—1935年）	44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1935—1949年）	46
三、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阶段（1949—1966年）	48
四、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阶段（1966—1976年）	52
五、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阶段（1978— ）	53
第三节 历史主义原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56
一、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	56
二、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57
三、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	59
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61
第四节 中共党史人物评价问题	64
一、坚持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共党史人物	64
二、中共党史人物的价值评定	67
三、科学客观地认识中共党史人物的过错	70
四、人物评价中的方法论争鸣	73
五、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厘析	84
第三章 新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88
第一节 心理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88
一、何谓心理史学方法	88



二、心理史学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90
三、心理史学方法的局限性	96
第二节 社会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98
一、何谓社会史学方法	98
二、社会史学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100
三、社会史学方法的局限性	102
第三节 口述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103
一、何谓口述史学方法	103
二、口述史学方法的实践细节	105
三、口述史学方法的功用与局限	106
第四节 比较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112
一、何谓比较史学方法	112
二、比较史学方法的实践细节	114
三、比较史学方法的功用与局限	116
第五节 计量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119
一、何谓计量史学方法	119
二、计量史学方法的实践细节	120
三、计量史学方法的功用与局限	121
第四章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126
第一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类型	126
一、文献史料	126
二、实物史料	134
三、口述史料	135
四、声像史料	137
第二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	137
一、搜集史料的顺序与原则	138
二、搜集史料的基本方法	139
第三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校勘	144
一、校勘的必要性	144
二、校勘的主要内容	147
三、校勘的基本方法	150
第四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编辑	154
一、史料汇编	154



二、史料长编	156
第五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考证	159
一、考证的必要性	159
二、考证的分类与范畴	162
三、考证的基本方法	165
第六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运用	175
一、中共党史档案的公布与运用	175
二、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	178
第五章 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问题	184
第一节 历史编撰的基本理论与编撰形式	184
一、历史编撰的理论探讨	184
二、史著编撰的主要形式与创新发展	185
第二节 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原则与基本步骤	190
一、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原则	190
二、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步骤	193
第三节 中共党史论著的学术规范与撰写技巧	199
一、断限、标目与编次	199
二、引用、注释与附录	200
三、行文中的格式规范	206
第四节 中共党史论著的语言	209
一、中共党史论著语言的基本要求	209
二、中共党史论著语言的美学要求	211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24



绪论

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智力工程，研究者需要深谙其基本的理论方法与学术规范。初学者尤其要深入了解和全面认识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只有在掌握基本的史学理论上，建构起相应的知识结构，然后结合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践，才能进一步了解掌握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增加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为步入中共党史研究的神圣殿堂打下牢固的基础。为满足此要求，中共党史学概论应运而生，这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入门与向导。

一、中共党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

如同史学概论是对历史科学反省、反思和自我认识的理论产物，中共党史学概论就是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反省、反思的理论产物。中共党史学概论主要关注认识主体研究中共党史的实践活动。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不只是局限于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只是局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近几年来，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迅速，全世界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百个研究机构与成千上万名学者，对中共党史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尽管海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这样一个概念，也没有“中共党史学”这样一个学科领域，但我们应该重视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评析工作。因此，从地域上讲，中共党史学概论关注的对象须包括大陆及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实践及其理论方法；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共党史学概论关注的对象，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实践活动，也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实践活动。我们应拓宽视野，立足于对中共党史研究全局的鸟瞰和描述，既积极采撷国内学者的新成果、新方法，同时放眼域外，重视国际学术界对中共党史的观察和思考。只有这样，中共党史学概



论的内容才能更为丰实。

二、中共党史学概论的科学体系

中共党史学要对自身进行反省和反思，首先需要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具体地说，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应包括：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特点；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体系、学科组成体系；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任务、目的、功能、意义；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中共党史研究的立场、观点；中共党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中共党史学科与相近学科的关系；中共党史学科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等等。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以理论的形式阐释了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面貌。然而，就是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完全解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探索。例如，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关系问题等，学界就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分歧，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关乎中共党史学发展的全局。

其次，中共党史学要对自身进行反省和反思，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方面的得与失，将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抽象，建构出自身的指导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根本指导。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的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学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举凡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要体现各学科的特色，必须还要有各自的学科理论，法学有法学理论，经济学有经济学理论，文学有文学理论。但反观中共党史学，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对自身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度在研究中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现象。如阶级分析方法，是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区分的事实出发，强调对人和事的认识要注意阶级关系的一种很科学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多次强调过它在分析阶级社会中的作用，但这个方法并不意味着能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入阶级斗争的范畴。然而，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却出现了把近现代社会里的许多非阶级、非政治的活动都当做阶级斗争问题来处理的情况，造成了很大的偏差。其实，阶级分析方法需要坚持与历史主义原则相结合，要求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个人作具体的经济地位的考察，以明确其阶级属性，还要考察分属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影响等，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建构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既要坚持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又必须恪守历史主义原则，杜绝党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分析、教条式的运用。实践表明，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去研究中共党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这其中有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需要研究，把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加以理论总结，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是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的基本途径。简言之，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必须以



具体的党史研究实践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要注意到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应混淆。另外，还要注重当代科学方法及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与运用。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工作者注重从西方史学理论中吸取和借鉴对发展中国史学有益的东西，比较重视西方新史学方法的推介，先后影响中国史学界的有兰克学派、美国新史学学派、法国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派、计量史学派等，广为流播的研究方法有心理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皆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时间，“走向跨学科”成为史学发展潮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中共党史研究也应突破以前的学科限制，应当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注意研究的多元化。中共党史发展中的事件以及问题是社会中诸多原因的多元化的整合，利用跨学科方法可以使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上更深入，范围上更拓宽；从多维的角度去思考，不再囿于政治、军事、文化领域，而应当融合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甚至是图书馆学、新闻学等学科进行研究。这样的方法能使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不断更新，而且分析问题更加全面、系统。德国学者于尔根·科卡指出：“某些历史学家与某些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共同点，甚至比绝大多数同行更多。一方面，跨学科合作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各专业内部的分散性也越来越大。跨学科的交流与联合曾是相互促进与创新的汩汩源泉。”^①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蜚声中外，与费正清所倡导的治史理念是分不开的。尽管他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深知现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仅靠历史学家是不够的，因此他不但不排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而且想方设法罗致社会科学家来哈佛大学充实教学力量，使学科互不相干的教授们捐弃门户之见，打破学科界限，会聚到一起，通过讲座、讨论和特定的合作项目，互相交流、补充，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经过费正清等人的竭力倡导，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模式逐渐在哈佛大学发展起来。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发展，正如习近平 2010 年 7 月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倡的，“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②。因此，中共党史研究要重视新史学方法的运用，弄清各种具体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合理性、局限性及其适用范围，从而为各种具体方法的正确运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是当前中共党史学概念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再次，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任何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因此，探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也是中共党史学概念必须关注的内容。史料，或者称历史资料（historical data 或 historical resources），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从数量上讲，史料总是小于客观历史的，具有

① [德] 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4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0 年 7 月 21 日）》，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8）。



简约性；从性质上讲，史料是主客观化合的产物，在具备一定的客观性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尽管如此，客观的历史早已灰飞烟灭，人们只能通过史料这一中介来把握历史，没有史料就无法说明任何历史。换言之，史料是连接过去（历史）与现在（历史学家）的唯一桥梁，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基础。为了尽量客观如实地了解过去，首先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史料，人们不断发现新的史料的过程，就是不断走向历史的真实的过程。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史料问题，英国学者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①。胡适也说，历史学就是根据事实来推断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但史料的简约性与主观性决定了史料不是历史，所以胡适又提出历史学家“全靠用最勤劳的功夫去搜集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②，须练就扎实的史料学功夫，才有可能发现历史真相。史料学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从属于史学，但不等于史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史料学通论与具体史料学两类，史料学通论专门研究搜集、编辑、校勘、考证、运用史料的理论与方法，而具体史料学则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专业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亦需要扎实的史料学功夫，要了解中共党史史料的基本类型，掌握史料的搜集、编辑、校勘、考证、运用等基本原则与方法。

三、学习中共党史学概论的方法与要求

学习中共党史学概论，目的在于掌握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领悟治史的路径。要想掌握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储备。

首先，研读理论经典，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传入中国，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得到广泛传播，并很快在中国土地上扎下根来，在指导革命运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学术思想方面经过学者们的探索和创造，形成了指导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五四时期创立以来已走过 90 多年的历程，中间经过发展、壮大、遭受严重曲折和挫折、新时期以来空前繁荣各个阶段，经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艰苦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许多研究领域都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其次，研习传统史学典籍，汲取传统史学理论的精髓。《史通》与《文史通义》被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专著的“双璧”。《史通》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外篇论述史官建置、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关于史书体例的许多论断，至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文史通义》对清代以前的史书体例有较广泛的论述，而且着重阐发作者的史学理论见解，如“六经皆史”的思想，阐释了记注与撰述的区别，其“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思想，在今天仍具启迪作用。我们要

① [英]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10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② 胡适：《历史科学的方法》，见《胡适文选》，423 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善于从史学典籍中咀嚼出无穷美味来。传统史学中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具有生命力的、可以超越时代的精髓。

再次，放眼域外，汲取西方史学理论的精华。近年来，西方史学的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全方位、多渠道地影响到中国，如兰克学派、美国新史学学派、法国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派、计量史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一大批西方历史理论及史学方法论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罗素的《论历史》，鲁滨逊的《新史学》，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欧洲史学新方向》，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当代史导论》，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等等。另外，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很多外国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这些著作中除了叙述中国的历史事实之外，必然要涉及诸多历史理论、观点、方法。这方面的著作，最有影响的是美国费正清、英国崔瑞德担任总主编的丛书“剑桥中国史”，其规模十分庞大，上起秦汉，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分15卷出版。还有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不仅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且还产生了某些论争，如何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我们应该加强对近年国外有重大影响的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何兆武曾说过：“‘学’这个东西有真假之分，有高低之分，有精粗之分，但是没有中西之分。”^① 国外研究中国的许多优秀著作都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结合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学习他人的经验可以形成一些关于我们自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思考。

最后，拓展知识面，加强其他学科知识的训练。新时期以来，历史学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科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方兴未艾，诸如社会史学、人口史学、生态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计量史学正在崛起。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从其他学科中借用了新概念、新范式、新方法，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真正将全人类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使历史学克服了内容狭隘、选题单一、方法陈旧的缺陷，有利于历史学改变面貌，焕发青春。^② 采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随便选择一部史学著作，都可以发现，它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科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方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跨学科研究也对我们提出了掌握多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的要求。

^① 何兆武：《中西文化与全球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见季桂保编：《思想的声音：文汇每周演讲精粹》，9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②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98（6）。



第一章

中共党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节 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

在明确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之前，首先要搞清什么是“中共党史”与“中共党史学”这两个概念。而要说明这两个概念之内涵，还要先从什么是“历史”与“历史学”谈起。

一、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这是各种史学概论的教本都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西方，讨论这方面的专文及专著，可以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以 What is history 名其书者，亦屡见不鲜。”^① 美国学者特纳在《历史的含义》中说：“自古以来，有多少史学家几乎就有多少种历史概念。”的确如此，对于历史概念的认识，古今不同，东西方各异。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对“历史”的解释：“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谓往事），或者是对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② 但他又进一步明确，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不是历史，历史只能是止于往事的记录。这个解释近似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对历史本质的思考。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普遍认为，历史事实属于过去，而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则属于现在，因此历史学家与其对象——过去之间是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的。英国史家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同上书，17页。



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谈”^①。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融通的现象。因而真正的历史，在伽达默尔看来，既非客观的，也非主观的。他把自己所理解的这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认为，与其说关心世界上的存在物或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如说关心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意大利学者克罗齐（1866—1952）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是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②这段话恰当地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上，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③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化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西方近代哲学家有一个共识，即把“历史”当做精神产品，特别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强调当代社会现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把史学家的著述看做真实的历史。

中国当代大陆学者有关“历史是什么”的论述，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本质的思考而出发的，如较早出版的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中说：“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可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但是，通常我们并不广义地使用历史这一概念，我们所讲的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④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同阶段和现实生活所使用的“历史”一词的含义看，历史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它是一切事物固有的属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是一种狭义的历史，即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史，是关于人的历史，正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费弗尔提出的：“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和思想的科学。”恩格斯指出：“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⑤

① [美]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美]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286页。

③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④ 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导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历史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它的客观性。李大钊认为，历史过程与历史著述有联系，但却是一种意义、性质不同的东西。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它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史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然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它的永续的生命。”^① 历史的客观性的内涵在于它不得历史学家的发现与解释而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默默行进。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去随意解释历史，但是历史作为一种失去了的客观实在，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把它变更的。

二、历史学是什么

明确了“历史”的概念，我们来进一步讨论“历史学是什么”。简言之，历史学是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的学科。具体地讲，历史学是在整理、鉴别、分析、综合历史现象（史料）的基础上，重构历史过程，并对历史过程做出解释和评述，其中贯穿着撰史者的好恶、褒贬、史观、史法。由此可以断定，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学，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手段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既然历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那么历史学的性质又该如何界定呢？这里从经典命题“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谈起，这个问题在学界已经争论了很多年。比较典型的见解有以下几种：一是历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性质相同的科学。英国史学家伯里（J. B. Bury）甚至说：“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他认为，历史学在研究目标、研究方式、操作程序等方面，与自然科学没有本质区别。历史学家公正客观的研究态度，对历史现象中因果规律的阐明，对历史资料的考证辨伪等，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完全相同。二是历史学是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科学。这种观点承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认为历史学不能划归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依然不失为一门具有自身规律与特点的独特科学。严格的科学得出来的结论和发现的规律都是可以重演的，而历史学则不能。三是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门学科。这种观点吸收了上述两种见解的因素，认为史学具有可靠的知识、求真辨伪的精神、客观公正的态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目标追求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史学同时又离不开合理的想象、审美的追求等，因而与艺术创作又具有很大的—致性。四是历史学纯粹是一门艺术。

^① 《李大钊史学论集》，197—19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在研究过程和成果表达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一系列艺术创造活动，如合理想象、据实虚构等。因此，历史著作中记载的史实只是“史家的史实”，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史实”。历史学家试图完全再现客观历史全部事实的努力，只是一种幻想或理想。五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称为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以人类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历史科学能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真实地探求客观的历史真理，能够透过大量的各色各样的历史偶然性因素揭示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在说明历史现象、阐明历史规律时，历史科学既不否认社会意识的作用以及历史偶然性的大量存在，也承认历史认识的局限性。但历史偶然性因素不但不否定历史规律存在的根据，反而恰恰是反映历史规律客观存在的外在形式。历史规律正是通过各种历史偶然性因素去表现自己的。

综上所述，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揭示历史真相与发现历史规律，科学性是历史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作为一门研究社会历史并揭示其规律的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有相似相通之处，与其他社会科学有不同之处，它包含了艺术的成分，但却不是一门艺术。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哲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从多样性、特殊性走向统一性，而人文科学则必须凸显其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历史学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主题都要丰富和广泛得多。一般的社会科学多是研究社会生活历程的一个侧面，探索和表述社会历史进程中某一特殊的对象；历史科学要探索和表述整个社会历程，要发现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研究各种学科对象的历史联系，把各种学科的历史对象都看做自己的对象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研究历史就是要科学地解释历史，而解释就是发现历史现象的原因。“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这句话道出了历史科学与其他许多学科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如社会学，它主要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手段去发现现实的社会问题，提出社会发展的实施方案。当然它也要查找问题的原因，但其侧重点则是在前者而不是在后者。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用过多的力量去分析社会问题的复杂的历史原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历史科学有三种用法。一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考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提出的科学概念，泛指一切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物质的运动形态或物质运动的反映，自然和社会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都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因此，研究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科学，都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这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深远的科学意义。二是泛指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研究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诸学科。三是指通常意义上使用的、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部门的狭义的历史学。作为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科学一个部门的历史学，其内部结构以研究对象来划分，可分成三大部类：其一，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诸学科，如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事件运动史和历史哲学等；其二，以历史科学本身为对象的诸学科，如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编撰学、史学评论等；其三，以历史资料为对象的诸学科，如辨伪学、校勘学、辑佚学、版本学、考据学和史科学等。^①学科门类众多。

三、中共党史与中共党史学

如同历史与历史学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中共党史与中共党史学也不能混淆，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而不是中共党史学的简称。中共党史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具有客观性与过往性，而中共党史学则是研究这一进程的学科。因此，凡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研究实践，不管从什么角度、什么层次，都属于中共党史学的范围。可我们有时稍不注意就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如“中共党史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中共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等，这都是由于没有区别学科的主观性与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所致。中共党史，是已经过去的客观过程，不存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问题。但是中共党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研究队伍、机构、成果、资料诸方面都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近现代史上无出其右，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乃至社会意识，不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是绝对不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涉及的社会层面极广，内容十分丰富，过程特别曲折复杂，不单独立“学”，不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体系，就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将中共党史学单独建立为一门学科。^②

据研究现状来看，中共党史学的体系由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及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全过程进行叙述和分析，作贯通性的研究。二是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按时间顺序分阶段进行研究。中共党史延续时间长，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可作断代性的研究。三是对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活动，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分门别类进行分析，作专门性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只有对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才会有扎实的基础。四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按其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为线索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主要是分地区进行的，进行这种地区史的研究是中共党史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人物进行研究。人物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① 参见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6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② 参见张静如：《中共党史学诠释》，见《张静如文集》，785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共党史学也不例外。同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还应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性回忆成果。这类成果不仅有回忆者提供的亲身经历的实际历史情况，更重要的是有回忆者对历史的见解。这既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六是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指导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共党史学的基础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中共党史史科学、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等，这些都是中共党史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共党史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呢？一般来说，两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①如上所述，中共党史学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当然，如果严格区分，两者也有一些区别。所谓“学”，是指独立的学科，它有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而“研究”作为对事物的一种探求，含义比较宽泛，既包括系统的学科，也包含具体的、零散的探索。也就是说，有些研究内容已经成为独立学科，有些研究内容则只是一般性的探讨。如对某些历史事件，像南昌起义、整风运动等，可以进行研究，称为南昌起义研究、整风运动研究，但它并不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不会称为南昌起义学、整风运动学。由于中共党史学和中共党史研究二者有一致性，为叙述方便，本书中这两个概念是并用的。

四、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其中“政治学”与“历史学”之争较为激烈。在1985年以前，“中共党史”一直是作为政治理论课开设的。1985年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由于其政治理论课的属性，长期以来被归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但学界对此争议较强烈。有学者明确指出：“凡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归属历史科学。党史学是近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②不能因为其作为政治理论课就改变其学科的性质，中共党史学不应属于政治学科，而是一门历史科学，应将中共党史学视为一门历史学科纳入中国现代政党史的范围，即作为中国现代政党史，它是中国近现代时限内的专门史，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或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并称之为“中共历史学”。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也作了明确的定位，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研究党的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同其他历史学一样，都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③。

这种认识很快被中共党史学界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有的学者指出它既属于历史学科，又具有政治学的色彩；有的仍认为它应属于政治学，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科，或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学科；有的还

① 参见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2~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②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新想》，载《党史研究》，1987（6）。

③ 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认为它既非历史学科，也非政治学科，而是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有的甚至认为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等等。

在国家规定的学科分类中，对中共党史的划归也不相同。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将中国共产党党史划归在历史学大类中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类目下，与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等专门史并列。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的《学科专业简介》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则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划归在法学门类中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中，与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并列。那么，中共党史到底是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政治学，或是别的什么学科呢？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分歧，是因为存在两种认识偏向。持政治学一级学科门类观点的学者所言的“中共党史学”是包括中共党史与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在内的，是广义的中共党史学。他们认为，即使中共党史学可以归属到历史学科门类，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也是无法归属到历史学科的。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尤其是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的执政党建设问题，包括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执政党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问题等，是从横向的角度研究党的自身建设与领导方式，注重的是现实政治，更注重应用研究，毫无疑问，应当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而且中共党史学本身又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性特点，也比较适合归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持历史学一级学科门类观点的学者是从狭义的中共党史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出发的。他们认为中共党史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门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实际上，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党建”的归属问题上。

鉴于以上分歧，还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学科应当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他们认为，中共党史学本身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科、政治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不同于这些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又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既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也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社会、其他政党及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问题。因此，简单地将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科、政治学科中的任何一个一级学科，都不甚合适。从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应当在法学门类中单独设立“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或“中共党史与党建”一级学科，下设若干个相关的二级学科，使其按照自己特有的规律独立进行学科建设。

从学科门类的科学划分来说，目前的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的。正如简单地将中共党史学科划归历史学



一级学科并不合适一样，笼统地将中共党史学科划归到政治学一级学科同样也不合适。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学科归属之争还会持续下去。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从事中共党史方向研究的学者应遵循历史学的路数来开展，而从事党建方向研究的学者大多是遵循政治学路数的。在越来越提倡跨学科研究的今天，多学科研究的开展，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领域。本书主要是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概论，不涉及现实党建问题的研究。

第二节 中共党史学的学科特点

中共党史学有着历史学的一些基本属性，又兼具政治学的特点，学界通常概括为“五性”，即历史性、现实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

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历史性，是指它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多具有过往性，和政治学及其他一些学科着重研究现实问题不一样。现实性，是指中共党史学在研究内容上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大都已经成为过去，而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内容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研究它们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现实社会对中共党史学的制约因素非常之多。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客体来说，中共党史研究的客体是当今中国社会执政党的历史，存在着当代人作当代史之利，但也有“时过境未迁”之弊。众所周知，当代史研究的主要困境在于，首先是作为一个时期、历史阶段，过程还未完结，甚至还处于活跃阶段，因此，对很多问题究竟如何发展变化还看不清楚；其次是当代史的一切活动，还有待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检验；再次是当事人还健在，对于他们的评价，一时还很难最终下结论。中共党史研究的客观的主体，即创造中共历史的人，现在仍在中国共产党内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言行影响着中共党史研究。而且，中国共产党现实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起着重大的影响。

二、政治性与科学性的融会

政治性，是指中共党史学与其他历史学科不一样，与政治紧密联系，并受现实政治的制约。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或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①也有学者表述为“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如何理解党性？龚育

^① 郭德宏：《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之有专门论述，他说：“何谓党性？遵守党的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这是党性的极重要的方面，没有这个，党就不成其为统一的有组织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但这不是党性的唯一要求。党性是有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那种以为只要遵守既定的‘本本’就无往不胜，躺在决议上饱食终日，空洞乐观，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无产阶级党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他说，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思想路线，应该属于党性的要求吧。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还说：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这是对‘党性’下的科学定义。”^①

科学性，是指它与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可信，掺不得半点假。正如周恩来在谈到撰写文史资料时所说的，要“存真、求实”，“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胡乔木在1980年的中国史学会上说过：“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事实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不能永远被掩盖住。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局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②

科学性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只有具有科学性的中共党史才是真正的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胡华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坚守中共党史研究党性与科学性有过一段讲话，他说：“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但是要讲真话，是真理我们就宣传，有些不是真理，就不要讲。不能讲假话。要你吹捧林彪，你觉得林彪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不吹捧，不写；叫你吹捧江青，你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你也可以不去吹捧；叫你批判朱德、贺龙、陈毅，叫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叫你反对‘天安门事件’、追查政治谣言，你觉得不能昧着良心瞎说，至少可以保持缄默，你可以不说不写，何必昧着良心去迎合什么人呢？何必去拍人家马屁呢？我又不要什么高官厚禄，我们是党员，是党史教员，应该是正直的人，正直的革命者，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怕丢失，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蒙蔽我们对真理的认识。”^③ 他一再要求要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他说：“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要敢于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能歪曲和篡改党史。有些问题，我们还有个认识过程，更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要解放思想，敢于冒风险、闯‘禁区’。对这样的问题，研究出成果来，政治影响大，教育作用也大。因此，党史研究者必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

① 龚育之：《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见《党史札记》，8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②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载《中共党史资料》，2007（1）。

③ 胡华：《关于党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见《胡华文集》，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战斗；要增强党性，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史。”^① 这些话语至今仍发人深省。

三、理论性的升华

中共党史研究不是单纯叙述史实，而是十分重视经验教训的总结，正如有学者所说：“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出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个人的经验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经验，也是如此。”^② 中国历代史家，一贯认为历史学之用于以古鉴今，总结兴衰成败教训，汲取历史智慧。早在春秋时代，周人就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司马迁作《史记》，标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代司马光卷入党争，屡经沉浮，但不论哪派得势，却都不曾对其《资治通鉴》动过一指头，因为他们都懂得，从历史中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通过中共党史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党史学的使命。有学者指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③ 而“批判性的反思”需要高度抽象的分析与认识，因此，尽管中共党史学的根本属性是历史学，但它的特点不仅政治性强，而且理论性也强。中共党史学区别于其他的历史学科之处，即在于它不仅要求史实的真实和准确，而且要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点加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这需要从多样性中抽绎出一般性、普遍性，从若干具体事件的认识中做出理论分析与概括，从而穿透表象达到本质性的认识。如果缺乏理论性，表述就容易平淡、沉闷、一般化，中共党史研究就不能深入，不能很好地发挥启发、教育、借鉴的作用。如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历史经验的升华，闪烁着历史智慧之光。^④ 邓小平自己对此作过说明：“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⑤ 中共党史研究的鲜明特点，尤其在于它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支持。重视理论思维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的“五性”的存在，也正说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几种各具特点的中共党史研究范式，套用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

① 胡华：《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见《胡华文集》，29页。

② 蒋梦麟：《西潮·新潮》，27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③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24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④ 参见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70页。

⑤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4～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谓”说，中共党史研究中也存在“三调”：一是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中共党史学的政治性、服务性、教育性。二是学术的中共党史研究，更多的是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三是民间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从民间个体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研究和言论的自由性。但不论哪种形式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点它们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最大限度地寻求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者来说，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抑或从民间个人的角度，都应积极地推动中共党史研究，使它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进步。

第三节 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一、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

如前所述，中共党史是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指已往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即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①“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就是涵盖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历史实践活动，如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科技活动及组织活动等。有学者认为，党史研究对象应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②。这样表述有利于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有利于把握和抓住党史研究的重心，是有道理的，有意义的。但活动的目的只是活动中的一个具体方面，活动至少还包括活动目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措施、过程、结果、效用、影响、意义等。有的学者认为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也有的学者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策略作为研究的对象，包括它在各个历史阶段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但也有学者提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是历史活动、历史言论的具体内容、重要内容，不必在研究对象中具体表述。有学者强调党史与国史应有区别，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党史研究》，1980（1）。

^② 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载《北京党史研究》，1993（1）。



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①综合以上观点，要而言之，中共党史学以中国共产党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但要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及其机制。

二、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是有联系的，是研究对象的具体体现。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工作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包罗万象。所以，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内容很多、很宽泛，要而言之，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总结。

其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具体分析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在各个历史阶段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就整体而言，包括：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史；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建设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历史；等等。

其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与自身建设的研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应该予以关注的基本内容。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同，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寓之于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不是抽象的研究。还要研究党的建设发展过程，包括政治、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等方面的建设。

第四节 中共党史同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联系和区别

一、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

中共党史指涉中共活动的全过程，而革命斗争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史指涉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它的主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如果从同一内容研究的侧重点来看，中共党史侧重于党的活动，而中国革命史侧重于包括党的领导在内的人民的斗争。

当然，“革命”一词内涵丰富，对其理解颇不一致。“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称为技术革命或产业革命等；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称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

^① 李向前：《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3）。



火车头，它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和集中表现，通常要使用暴力。历史上有过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列宁的定义是：“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同样认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国革命史就其内涵而言，是指中国人民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为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其外延看，它应包括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各种进步阶级所进行的各种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变革；就其内容而言，不仅包括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也包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围绕巩固政权所进行的一切重大斗争，同时还应包括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的革命斗争史。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内容，便不成其为完整意义上和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革命史就应从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开始，写到无产阶级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重大斗争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革命史”指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这种特定含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象应表述为“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不应笼统地表述为研究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斗争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斗争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断限问题，学术界有多种看法，但大多数认为应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上限，因为鸦片战争使中国由独立完整的封建国家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下限，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的下限；二是1952年全国土改的完成是中国革命的下限；三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革命史的下限。依据上述所说的特殊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其下限应定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

^① 如有学者认为，“革命不仅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同时也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应“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1946年到19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见《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另外，还有一句邓小平的名言为大家所熟知，即“改革是中国第二次大革命”。有学者分析这个“改革”本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但是，我们要把它提到革命的高度，充分重视它，用革命的精神、胆略和气魄去完成它。所以，这里的“革命”是转义或借用。邓小平在这里讲的中国就是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而“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自然就是第二次革命了。（参见金春明：《改革为何称革命——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札记》，载《教学与研究》，1994（4））



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这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科学预见。它说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但不能说是最后的彻底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但革命并没有结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要继续向前发展，向高一级的层次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围绕着巩固政权的一切重大斗争都是革命”。如果说我们这里讲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史，那么，下限定为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上，我们这里讲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显然，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为革命史的下限是不科学的。

同样，如果以为1952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新的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等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可以把中国革命史的下限定为1952年，也是不可取的。因为1952年，我们虽然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国民经济，但建立起来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①的过渡时期。

所以，只有以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完全确立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下限才是比较科学的。这是由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象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决定的。

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胡华对此论述道：

党史同革命史的关系，顾名思义，党史是侧重于党的创建和党组织的发展，党的历次会议，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国革命史则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时限可以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的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可以少讲一些，着重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割地赔款，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运动则着重讲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阶级革命。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则从五四运动，建党的准备时期讲起，这以后，同党史基本内容一致，不过党的会议，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可以讲得简略些，对敌斗争，敌友我三方面酌情要讲得详细些。就是说，既要讲革命方面的历史，也要讲反革命方面的历史，既要讲共产党史，也要讲国民党史，也要讲到其他党派的纲领和历史。就是说，内容要更宽广，社会历史背景，要求讲得更多些、更清楚些，给学生以较丰富的知识。革命史的核心还是党史，不过革命史的面更宽。^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② 胡华：《关于扩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问题（节录）》，见《胡华文集》，228页。



胡华的观点代表了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讲得非常清晰明白。

二、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作为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其中，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以下简称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是属于同一时空下的历史，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有着交叉重合，对于二者的关系问题，学界曾进行了探讨，二者的学科定位与学术取向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实际上，从理论上讲，二者之间的区隔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学者撰文指出，二者在研究的角度、研究的范围、研究的重点以及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党史是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之变成国家意志，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相互交往，如何进行自身建设，等等。而国史的角度是整个国家的历史，研究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是如何发展的，各项行政制度、法律法规是如何制定修订的，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等等。从研究的范围来看，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及其执政规律和经验，因此，其研究范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至于其他领域，如社会领域的变迁，像婚姻、民俗、服饰、饮食等，尽管与党史或多或少也会有一定关联，但不是党史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来看，党史研究的重点应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状况，党的领导人、模范党员和与党关系密切的人物的历史和事迹，等等。对于这些，国史研究虽然也会有所涉及，但更多的应当研究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和行政制度、人事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过程，经济、文化、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等等。另外，二者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也不完全相同。国史和党史作为史学或与史学相关的学科，都应当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等。在这些方面，二者基本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应当有不同。但是，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还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①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而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二者有各自的学科特性与学术取向。

尽管没有人简单或机械地否认党史与国史在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内容和侧重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隔，但是二者区隔的标准和界限究竟是什么，则始终莫衷一是。如何在党

^① 参见朱佳木：《谈谈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的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7）。



史与国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史与国史的编纂和教学过程中，将两者严格而清晰地分隔，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①实际研究中存在党史与国史分不开的情况，存在“国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或者党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撰写的内容”^②的现象。针对这一状况，有学者指出：“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③诚如有学者所论：“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并不表明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是一个学科，而这正是今后需要通过加强这两门学科自身建设来加以解决的问题。”^④

如前所述，大陆主流学界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与国史的区隔基本上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但在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中，基本上还没有分科意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党史、国史不分。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上面。从《中国季刊》、《中国研究》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分析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的成功与失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的研究，成为大多数国家研究中共党史的主流。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多与同时期中国问题研究一起进行。特别是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的影响，他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除政治、经济方面仍然是研究重点外，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制、军事、文化、社会事物、两岸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呈上升的趋势。他们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是涵盖在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大视角之中的，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当代中国，是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五节 中共党史学的功能

一、历史学的功能解析

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学的价值何在？古今中外无数史学家与哲人都对此问题作了解答。比较经典的一句话当数英国学者培根的“读史使人明智”。而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

① 参见齐鹏飞：《关于“党史”与“国史”关系的再认识》，载《教学与研究》，2008（5）。

② 朱佳木：《谈谈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的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7）。

③ 李向前：《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3）。

④ 朱佳木：《谈谈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的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7）。



之哉？”^①就具体内涵而言，历史的价值或历史学的功能是丰富而多元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社会功能与学术功能。

（一）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是指史学成果对社会整体所产生的作用或效能。历史是一种过往的客观存在，但与现实、生活有着永远无法割舍的内在联系。“我们要正确地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那个问题的历史，也就是说不能离开研究那个问题的历史学。我们生活在历史里面，也可以说，我们是在相当程度上生活在历史学里面。因为，我们不能不历史地看待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而且“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间的，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即使有人非常不喜欢历史学，可是生活也会迫使他们去考虑历史学上的问题”^②。只要人们面对现实，就必须面对历史，通过研读历史指出当代社会表象的潜在构成因素，以供现实资鉴。这里以具体的历史认识成果来说明。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以古鉴今”。不同民族或国家，之所以有那么不同的命运，大体上跟是否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具备及时而有效的纠错功能有关。历史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提供经验教训。《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在1944年春天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而作的长篇论文，不仅在历史学界，而且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1944年是甲申年，也是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倾覆明朝300周年。当此之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明显转变，民主力量蒸蒸日上，胜利曙光遥遥在望。中国抗战也由艰难局面开始转为战略反攻态势。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已经取得可观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正是提供了一面在胜利面前如何防止骄傲自满、保持旺盛斗志的借鉴之镜。郭沫若的深刻分析，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又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当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而且在以后常常被人称道。这篇史论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诚如朱佳木所评价的：“这篇史论适应了中国共产党防骄拒腐的需要，为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郭老在文章中总结了李自成起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深刻教训，道出了争取执政或已经执政的政治力量要想取得政权和长久执政就必须防止骄傲和腐化的铁律。”^③田居俭指出，从1944年中共中央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到20世纪50年代，这篇史论所总结的防止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风的思想，曾经对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产生了宝贵的鉴戒作用。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全党面

^①（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3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②胡乔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1980年4月8日），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朱佳木：《一篇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史学论文》，载《北京党史》，2004（3）。



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威望达到高峰时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于被破坏，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不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证明毛泽东当年推荐《甲申》的必要和正确^①。历史是前人用血泪凝成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了最生动的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不以史为鉴，将会再现“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结局。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共脉动的学问，从历史中认清现实的国情，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是历史学借鉴功能之体现。

胡绳《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以史识今”。历史学还有着重要的思想引导功能，即“以史识今”。学习历史，是为了向历史学习，要把从一连串事件中获得的认知运用到另一连串的事件上去，其目的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研究历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完美的规划，帮助人们创造更为光明的前程。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历史规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胡绳指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有人认为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是不可取的，中国本来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②因为这是事关中国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中国基本国情的大问题。胡绳的《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书，不是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优劣，而是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认识，澄清错误观点。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总结：一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胡绳指出，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已丧失完整的独立主权。二是中国缺乏一个能担负领导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推翻封建主义势力，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资产阶级力量。胡绳对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资产阶级力量逐一审视，从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到国民党政权都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三是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决定中国只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胡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拒绝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这样的机会。”^③四是“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④。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

① 田居俭：《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为“甲申”三百五十年而作》，见《春泥集——田居俭论文存》，168~16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② 胡绳：《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同上书，11页。

④ 同上书，16页。



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民主和统一问题。胜利后的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审时度势，提出了中国应该经由资本主义有某种程度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建国根本纲领。胡绳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① 胡绳的论证通过转换时空坐标，增强了人们对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度与广度。通过研究历史，认识中国国情，观察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把握历史前途。李大钊的论述更为深刻，他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面一层一层地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得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得愈清。”^② 他认为：“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③ 在此种意义上，历史学是一种提高人类智慧的学问。

一直倡导重视历史教育的白寿彝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曾在许多场合反复论述研究历史以观察未来、认识历史前途的重大意义。1982 年 5 月，他在北京市史学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历史前进的教育”，通过了解过去，解释现在，观察未来。^④ 1983 年 12 月，他又提出：“历史家跟政治家不同，但也要以天下为己任。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家也担负着跟政治家共同的责任。”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而是要产生社会力量，产生社会的效果。如果是接受正确的历史知识、正确的历史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有利。有了更多的人看到历史前途是什么，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全人类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就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坚定他们对工作的信心，在工作上的勇气，这对于建设我们新的国家更为有利。”^⑤ 1988 年 1 月，他再次强调通过学习历史、把握社会前途的重大意义：“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认识时代，增加人们的智慧，让人们更加自觉地认识历史，看清楚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这种认识，集中起来是巨大的物质力量，其社会效益是不可估计的。”^⑥

① 胡绳：《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 页。

② 《李大钊史学论集》，245 页。

③ 同上书，195 页。

④ 参见白寿彝：《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250 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⑤ 白寿彝：《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270—271 页。

⑥ 白寿彝：《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295 页。



另外，历史学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对国民进行人文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渠道。新时期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进行，结束了以往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国人一下子打开眼界，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成就和其他先进事物，对比之下，深感中国落后，因此，有的人盲目崇拜西方，甚至对于自己民族的力量和前途失去信心。而且在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大量输入的同时，形形色色的观念和“学说”、“流派”也一齐涌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人在价值观上感到困惑。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一方面是各国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紧密，另一方面是各国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关键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当前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迫切的意义。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曾指出，自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和清朝灭亡以后，中国的人文教育传统逐渐被淡化。近现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专业化和技术化，人文教育更加缺失。今天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富强和谐的社会，就需要重视人文教育，需要让人们了解最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需要培养更多能改造社会、改造观念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历史研究是人文教育的重要渠道。白寿彝早在新中国成立初年，便提出通过历史教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在一方面认识中华民族的不断的进步，中华民族力量的不断的发展，认识中华民族的高度的智慧，中国人民的优良的高尚的品质，因而得以培养他们对于祖国历史的热爱，祖国人民的热爱，培养他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消灭民族自卑心、民族失败主义；在另一方面，认识中华民族每一阶段的进步，中国人民力量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对自然界斗争的结果，对反动势力斗争的结果，都不是凭空得到而是长期地用鲜血和热汗灌溉的成果，因而得以培养他们对于祖国国土的热爱”^①。老一辈史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学的此项功用，而且在实践中能够有所行动。启功曾回忆他的老师陈垣时说：“在抗战时期，老师身处沦陷区中，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手无寸铁的老学者，发愤以教导学生为职志。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② 大敌当前，历史学家也能为保家卫国尽一份力。

世界各国不论历史悠久还是短暂、政治制度和国体如何，对于历史教科书该如何编写，该承载怎样的教育功能，看法却惊人的一致，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都把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任何一种民族精神的生成都不是自发的，它需要弘扬和培育，才能从一种为个人所有的高尚精神转化为民族的大多数个体乃至整个民族所拥有的高尚精神。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也

^① 白寿彝：《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161页。

^② 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诞生百年纪念》，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9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就不会产生对国家、对民族深厚的感情，更不会有为国、为民族献身的决心与力量。任何民族精神都有自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它们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孕育和形成，并且通过历史记忆加以传播的，民族精神首先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基于一定时空体系内发展的民族的历史性的反映，民族精神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历史积淀。欲使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的感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文化认同力量，而这正是历史学职责所在。正如江泽民所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①。诚哉斯言！

（二）历史学的学术功能

学术功能亦称学术价值，是指史学研究成果所具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于该成果在史学这个学科中所具有的学术程度和水平的高低。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功能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既没有脱离任何意义的“纯”学术功能，也不存在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纯”社会功能，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瞿林东在探讨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求实和经世的关系，反映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错综复杂的，但从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协调和一致的关系。”^②一方面，史学是一门科学，实现它的社会功能的前提是它的科学性，或者说，是它的学术价值。“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致用。”^③只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史学研究，才有利于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助于社会前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正是提高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条件。现实的需要，是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了解和变革现实的需要也必然促使人们站在这样新的认识高度上去思考今天的由来及其与过去的联系。这样，人们也就必然不再满足于过去史学研究的成果，而去对已认识过的历史进行再认识，对已评价过的历史事物进行再评价，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并在研究中运用现代的概念、范畴、理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这样，人们也就能够不断克服过去的历史认识中的狭隘、偏颇、表面和谬误的部分，使历史认识不断扩展、全面、深化和更新”^④。

有学者指出：“在社会科学众多研究领域，很少有一门学科像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之时开始，就是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要为目的的。”^⑤美国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是在国际冷战背景下进行的，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美国的

①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9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9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③ 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载《学术月刊》，1997（1）。

④ 宁可：《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载《光明日报》，1985-12-05。

⑤ 刘杉：《美国的当代中国政策智库》，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9-10。



政策制定者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新的角色去理解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视，缘于其在东亚和全球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和相关课题的成果，反过来又为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效果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在客观上起到了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库的作用。研究宗旨是以政策研究为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研究的分析方法与研究质量。他们以说明问题为主，而不是以发展学术体系、探求真理为目标。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创始人，也被称为“西方中国学之父”^①。但他创办中国学的宗旨非常明确，强调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而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长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费正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目标是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时期，由于过分强调经世致用的立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缺乏学术研究所必要的严谨性。对一名中国问题学者是否成功的评价往往不是看其学术成果，而是看其受美国政府重视的程度和是否在政府中担任要职。^②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冷战时期著名的“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One china, but not now），以及冷战后的对华“遏制+接触”（congagement）政策都出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报告。他们不仅表现为影响政府决策，在更大程度上还表现为领导舆论，为大众进行政策宣传教育，为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建立社会共识。正因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偏重于政策研究，而且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要求。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以所谓的“民主化”为主旋律，强调美国价值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到了80年代，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成了很多政府中国问题专家的追求，许多人向学者型的方向发展，潜心治学，以著书立说为奋斗方向，但他们仍然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费正清所创设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把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对我们重估中共党史学的功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中共党史学的功能定位

作为深具历史学属性的中共党史学，具有与历史学相同的社会功能与学术功能担当。毛泽东在1942年就曾谈道：“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

^① 费正清（1907—1991），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正清”是梁思成为其取的中文名，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创办美国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并长期任该中心主任之职，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费正清一生笔耕不辍，编著的作品有60余部，像《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新史》等广为人知。

^② 刘杉：《美国的“中国政策智库”》，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9—10。



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①论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功能，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论述：研究中共党史有助于认识国情；研究中共党史有助于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现实；研究中共党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共党史是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以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增强信念、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途径；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等等。显然，中共党史学界特别强调其社会功能，或者说注重其指政治功能的发挥，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服务，充分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让中共党史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共党史学的功能也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

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开始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共党史研究的“求善”以“求真”为基，宣传教育功能以认识功能为本，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共识。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既继承中国传统历史学“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借鉴功能、“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教育功能之长，更继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认识功能之长，无所偏失地“求善”、“求真”。但是，由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在功能、价值、标准上有着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特点。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能离开政治性、党性抽象地谈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同样，没有学术性、科学性为基础和前提条件，也就谈不上这一学科体系的政治性、党性。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是无法割裂的，两者互相支撑、互相体现。离开了学术功能和价值，中共党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无法发挥和实现的。中共党史学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发挥、实现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借鉴功能和价值、教育功能和价值发挥、实现的深度和广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包括中共党史学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历史学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不仅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无一己之私所然，而且是因为其深浸历史学以认识功能为借鉴功能、教育功能之基、之本的精髓。^②

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是中共党史研究自身价值的客观体现，它以客观真实为标准，真实性、客观性越高，则价值越大。正如梁启超所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③“学”与“术”体现了不同层面的社会需求。而“学者之职，本在发明原理原则以待人用耳。而用之与否，与夫某项原则适用于某时某事，此则存乎操术之人，必责治学者以兼之，甚无理也。然而操术者视学为不足轻重，则其不智亦甚矣”^④。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学”是以认识事物为旨归，而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党史研究》，1980（1）。

② 参见齐鹏飞：《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③④ 梁启超：《学与术》，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235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术”则是以服务现实为方向，只有在“学”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术”的作用。“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求原理原则。”“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① 具体而言，任何一种政治的宣传或经验的总结，如果没有真实性做基础的话，结果都必然是自欺欺人。如果只是把中共党史学当做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忽略了其历史学属性的求真原则而使其过分政治化，就会使中共党史研究迷失自我，丧失历史学的基本品格。当然，在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当下，中共党史研究在不断推进学术进步的同时，更担负着资政育人、坚守民族精神的重任。

第六节 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素养

在中国史学史上，对史家自身修养的培育一直比较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正在逐渐形成的时候，就对史家自身修养提出了要求。孔子率先强调史家应“书法不隐”，也就是要直笔，并将它作为良史的标准。其后史家也一直以据事直书为必须坚持的原则，反对曲笔隐讳、毁誉任情等不良作风。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史家提出“素心”的要求，认为史家在分析评价历史时，应做到“析理居正”，从而使史家修养论略具理论色彩。《隋书·经籍志》对史家所具备的修养也有概括和总结，诸如“博闻强识”、“疏通致远”、“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等等。唐代刘知幾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说法。北宋曾巩对“良史”提出了“明”、“道”、“智”、“文”四条标准。元代揭傒斯提出了史家的“心术”问题，在他看来，修史以用人为本，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心术”正与不正最为重要。清代章学诚在总结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论，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近代史家梁启超在他作于1926—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单列一章“史家的四长”对史家修养论作了独到的论述，以“德”为先，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可以说，梁启超的史家修养论在继承前代学者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既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更为当时学界所推崇，如金毓黻曾说，梁任公之“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者，极惬于余心。盖余治史之方法，凡稍有所得，无不与任公之说合，则立说之精当，不待论矣”^②。直到今天，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仍然被当代学者们反复称引。具体而言，史德是要求史家研究历史要有端正的“心术”；史学是指历史知识的积累；史识是指历史见识、价值判断；史才是指历史编撰的能力和史文表述的能力。钱穆也论证了史学家所应具备的

① 梁启超：《学与术》，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2351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第六十六，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廿三日条，长春，辽沈书社，1993。



四方面素质，表述更为具体：“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瞭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①今天的学人们，不仅要以“史家四长”为自我修养的准则，还要继续探索如何在现实条件下赋予它更科学、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内涵。“史家主体修养，就是主体意识结构的培育问题。它包括主体哲学观点的进步性、政治立场的革命性、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生活经验的深化、高尚情感的培养、性格气质的锤炼等诸多方面。……如果新时期的史学还要充当当代社会活动的向导，还想和整个社会历史时代保持同步发展的水平，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高度重视改变自身的主体条件，以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②这可谓是新时期对史家修养论的新阐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前人提倡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者，在今日不仅有大力提倡的必要，而且要赋予时代内涵。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对中共党史的每一步新的认识，都是从自己的主体意识结构出发，带着深深的个体素养的印痕。个体主体意识结构的更新与发展，是个体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因。而个体认识的无限丰富与发展直接推动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依赖于主体修养之“求真”、“博学”、“创新”等丰富内涵的全方位培育。当然，德、学、识、才的修养也不是一日之功，但在现代社会思潮纷繁、变动激烈的情况下，时代对我们的德、学、识、才的要求更高。

一、哲学观点与学术立场的锻造

历史学是一门反思、俯瞰以往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学科。首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学家以什么观点、站在什么认识高度考察过去的历史，换言之，历史观点是贯穿每个史家研究工作之始终的指导思想，不管史家本人自觉与否，它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同时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它必然受到代表时代智慧水平的哲学观点的影响，进步的哲学观点对于史家从事求真求实、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推动、启迪和提升作用。由于中共党史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党史研究者的理论修养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是每一位党史研究者的必修课。“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下大力气研究马克思主义，改变过去教条式、注经式的学习与研究，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革新我们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理论束缚。在带来主体性解放的同时，去丰富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更进一步讲，哲学观、历史观、学术立场三位一体，哲学观决定了历史观的选择，进而影响学术立场，而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研究历史，往往决定了对历史的某些认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同一事件往往会

^①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载《思想与时代》（月刊），1943（18）。

^②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65页。



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说。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非正常的关系中，提出了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还是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如果只按照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来研究中共党史，以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句句是真理，而不考虑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结果如何，那么甚至会吧中共党史上的一些政治路线是非搞混淆了。“搬外国的东西”，“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①。这里谈的就是立场问题，指出了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而不能站在外国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指出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实际上也是强调了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路线的立场上，站在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上，其意义也是相当深远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现实社会中，政治立场是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史学家无例外都是现实中的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就很自然地变成了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中介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史学工作者立场鲜明，站在人民革命的立场上，肯定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但又走过了头，以至于对农民起义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和带来的消极后果没有作应有的揭示和分析。而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又往往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在揭示他们的阶级本质的同时，对其中那些对历史发展确实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这种片面的所谓“革命立场”，也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导致了与客体历史的背离。历史学家有自觉反省意识，是立足现实来回忆过去，在很大的程度上，历史学家“是那个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②，其学术立场决定思考趋向，得出的结论也会相异。古人强调君子治学当“正其学于先，乃以慎其术于后”^③，而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二、知识基础与生活经验的深化

治史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具体而言，知识基础包括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及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党史研究》，1980（1）。

^②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34页。

^③ 王夫之：《宋论》，卷三“真宗”，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以此为基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奠定主体认识成果的科学性。知识基础的深浅直接反映了论著的学术水准。古人治史反复强调“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学贵博能约”，近人治史特别注意“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处于知识信息爆炸的当下，今人更应建构起适应于时代需要的知识基础。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与现实发展息息相关的，适应时代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去选择研究课题，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容推托的社会责任。而研究主体的知识基础决定了其治史视野之广狭、研究领域之宽窄，直接影响其研究选题。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无论一个人所受的是哪一种学科方法的训练，他本人的文化修养越广博深厚，则越能在那种方法上发挥他一切的智能。无论这些智能是不是由那种特殊学科训练上得来的，它（指由文化修养而得来的智能）都可以使一个人的说话有分量，有价值。反之，由一个修养浅薄、目光短狭的人，机械地应用一种孤立的学科方法，常常会产生浅陋的，甚至荒谬的结果。”^① 诚哉斯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就要改变我们知识结构单一、贫乏，研究手段单调、落后的状况，广泛吸取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素养和方法论手段，建构跨学科的合理的知识结构，拓宽视野，开拓思路，适应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

每个认识主体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阅历，并积累起深刻而丰富的个人生活经验，而个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很容易沟通对历史上社会生活的理解，因此，认识主体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重现历史、重构过去。一个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决定着他们如何理解与把握历史。近年来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不乏杰作，但对诸多党史问题的解释也存在着很多牵强之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缺乏在中国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形成了一种西方解释话语。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为框架，再辅以常见的史实为佐证，其论证偏理论分析而少史实考辨。虽然此种话语在研究方法上多具新颖性，但对很多问题的分析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而我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曾一度存在过僵化地论说党史的现象，出现了一套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党史解释话语。这套解释话语不仅成功地同化了学者们的研究基调和研究结论，使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原因在于，“左”的思想影响以及学者个人“泛政治化”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在党史研究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严重地禁锢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但生活经验是一个人的宝贵财富，时过境迁之后，学者可能会将他关于“生活的全部知识”作用于他写到的每一件事，所以才会出现不是史学家的季羨林写出了值得史家去参考的《牛棚杂忆》。^② 生活经验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双重的，由于个人的经历，可能使

^① 陈启云：《关于思想文化史研究》，载《开放时代》，2003（6）。

^② 参见季羨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这是季羨林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本回忆录，讲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此书对“文化大革命”残酷性的揭露让人不寒而栗。他出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总结教训和“经验”。



他不去涉足某一领域，但也可能加深他对历史的理解，从而写出更为深刻的学术论著。梁启超谓“大学者多以六七十岁为成熟期”，以及通常所说的“世间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就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深厚学养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指生活经验的逐渐深化也需要经过岁月的磨炼。吕思勉曾说：“学问……不在纸上、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它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①

当然，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毕竟还是有限的，与史学相关的知识包罗万象，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知识盲点，遇到知识盲点时，就要有虚心求教的精神。彭明说：“个人的能力有限，集体的智慧无穷，一个人的本领再大，也不能百事精通。因此，我在研究和写作《五四运动史》的过程中，采取了虚心求教的态度。例如，在研究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情况时，便向山东、天津、湖北等地方的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请教；在研究五四运动和妇女解放问题时，便向妇联干校专门从事妇运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请教；在研究五四时期的经济情况时，便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家请教。”^② 前辈史家的学术风范值得后学效法。

三、高尚情感与性格气质的锤炼

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一个方面。列宁有一句话被广为传颂，那就是“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③。黑格尔也说：“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④ 作为胡华的学生，彭明曾深情地回忆过老师胡华撰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时的艰苦状况：在刚解放的河北正定城胜利街一座房子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只有一只漆黑的小铁碗盛着为数不多的菜籽油；几支灯芯草轮流地燃起一缕缕摇曳不定的灯光。灯光下，一位不满27岁的青年正在用一支蘸水的钢笔（还需不时地更换笔尖）奋笔疾书。时值三伏天，他还需不时地抽出一只手来拍打叮在腿上的蚊蝇。已是深夜了，他站起来伸伸手脚，便又伏在案上……这就是我所见到的胡华老师在1948年夏季写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时的情景”^⑤。这种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严谨治学的精神境界是值得后学深思的。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很能体现个人对事业所应具有的精神境界：“追究一个人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荒唐的。然而，每个人都有一种理想，这

^① 吕思勉：《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见俞振编：《嵩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2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② 彭明：《板凳集：彭明随笔》，9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③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5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④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2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⑤ 彭明：《科学研究的艰苦岁月——忆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编写》，见《彭明文存》，23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种理想决定着他和判断的方向。在此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称之为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亦不关注客观世界——那个艺术和科学追求永远无法企及的对象，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空虚的。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是可鄙的。”^① 王国维的为学三境界也为人们所熟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的“三境界”诠释了“潜心才能治学”的道理。侯外庐在法国留学期间，“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罗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②。《大学》亦云：“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静”、“安”、“虑”、“得”的治学之径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符合人的思维规律的。要想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必须排除功利心的干扰。

人的不同首先是性格气质的不同，性格气质的不同又导致了个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方法论有所不同，这些进而又导致了个人的文化思想的不同。胸怀开阔、气质恢弘的人，其治学路向与学术建树必定要胜于心胸狭隘、行为猥琐之人。一名真学者应注重“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的培养与塑造。“独立人格”首先是指做人有气节、有原则，一身正气，让人肃然起敬。孟子教人养“浩然之气”，也就是让人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了人格独立的基础，研究者才会坚守个人立场和职业底线，既不降志辱身、媚从权力意志或世俗力量，也不投机取巧、见利忘义、随意改变自己的信仰，从而才能谈得上“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指个体思考不受他人意志的左右和外物的限制、束缚，具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以他人的眼光和善恶看待研究，更不以他人的善恶是非标准为标准，不在乎别人的理解和评价。只有独立精神状态下的思想才是自由的、不受限制和束缚的。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宽广、远见卓识、无私无畏的政党，党史研究者更应具备这样的胸怀、气度与情操。治学志在真理，曲学阿政、曲学阿权、曲学阿利、曲学阿名都是背弃真理的行为，研究者人格异化，精神扭曲，此类情形为真正的学者所不取。“历史学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历史学家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言。”^③

四、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

要培养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关心当代社会的发展，增强从时代需要出发

^① Albert Einstein, *The Word As I See It*, 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演说词粹》，25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③ 陈铁健：《绿竹水南集》，3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去阐释中共党史研究的自觉性。所谓自觉性，就是时时刻刻有意识地思考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不等外因的激励、催促与逼迫。在学术自觉的基础上，还要着意培养自己的学术勇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研究者不必惧怕和迷信学术权威或其他因素，不必受旧有观念、习惯的束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善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风而不顾。”中共党史学者的使命感，即要实现一位中共党史学者工作的社会价值（包括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学者邵维正在谈到他做中共一大考证时的情况说：

当时听到的反映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我做这项研究；有的担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有的出于好心，私下劝我不要冒这个风险；还有的提出考据是资产阶级治史方法，我们不能用，党的生日早有定论，把叛徒、汉奸的名字列上党的成立大会影响也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会犯政治错误等等。……在此前后，还有一件事使我受到触动：阅读海外资料时，我曾看到台湾反共史学家郭华伦1973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提交的一篇文章，就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嘲讽和攻击我们党说：“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已有52岁了，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以生辰。”这真是以学术研究为名，行反共之实。气愤之余，政治责任感油然而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由我们党自己来研究，尽管有不少困难，也要知难而进，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让别人来指手画脚，更不容许别有用心的的人以此作为攻击我们党的借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考证一大的艰难路程。^①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即一位学者来说，必须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张载所说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的境界和胸襟。“为天地立心”，就是赋予自然万物意义，它体现的是学者的人生理想，追求的是本体理解和终极价值。“为生民立命”，就是敢于代民众发言，挺身维护民众权利，它体现的是学人的道德理想，追求的是社会良知和现实价值。“为往圣继绝学”，是指传承知识、弘扬真理，它体现的是学者的认识理想，追求的是学术良知和知识价值。“为万世开太平”，是指营造和平的社会秩序，追求的是社会责任和政治价值。作为一名学者，这种社会责任感既表现为个人对学术、对自己所选职业的敬畏和诚意，也表现为通过学术为苍生而献身的精神。学术发展固然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社会责任感是学术赖以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最关键的一环。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与否取决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之强弱。陈垣曾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③ 此段话诠释的是一位学者的崇高的

① 邵维正：《板凳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4）。

②（宋）张载：《张载集》，3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③ 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社会责任感。

只有基于社会责任感，学者才会具有一种强烈的敬业精神，将学术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来看待，由之产生一种对于学术的敬畏、诚意和诚信，并甘愿为学术付出巨大的精力乃至生命的投入。这种敬业精神会支撑着学者孜孜以求地执著于学术事业，遵行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而杜绝诸如短期行为、粗制滥造、追风跟风等不良学术行为。正如有学者所说：“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稷史自稷，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糨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智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作？”^①做人、做事、做学问要相统一。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做人是其中的根本。做事、做学问的原则，是做人的原则在社会实践、学术研究中的延伸和体现。老老实实的做人之道，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踏踏实实的良好作风，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就是扎扎实实的科学态度。历史证明，只有诚实正直、堂堂正正地做人，才能干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大事业；才能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真学问。品行不端、学风不正者，虽然也可能取得个人的某些成功，但人格的局限、道德的亏缺决定了其事业、其学问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和好的作用。”^②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人品、事业、学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① 章开沅：《论史魂》，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1）。

^② 高翔：《做人·做事·做学问》，载《人民日报》，2002-11-23。



第二章

历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

第一节 历史观与正确地认识历史

一、历史观是什么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认识，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总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与评价，而判断与评价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即为个人的历史观。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或正确的，或错误的；或进步的，或倒退的。一般来讲，历史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历史行程的价值本位为准。如对“历史是退落的、循环的还是进步的”这一类问题的回答。二是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历史演展的动因，或在个人，如英雄史观、王者史观；或在社会，如经济史观、知识史观；或在物质，如地理史观、人种史观；或在神权，如天命史观、神意史观；等等。

从历史学自身的历史看，历史观本身有它的发展趋势。不同时代、不同信仰的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己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①而“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楼，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②。大体上说，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29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② 同上书，296页。



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历史观越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越真实，越接近于历史实际。

从社会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而言，历史观又可以区分为两类：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是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精神因素的社会历史观，它包括两种理论形态：一是主张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二是主张某种神秘的精神实体决定历史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这两种唯心史观的主张都是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则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没有一种历史观能超出唯心主义的范畴。如列宁所言，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有两个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

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观对历史认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世纪时期，神学史观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在中世纪的西方史学中，整个人类历史被写成了上帝意志在人世间的实现。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上帝之城》集中体现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中国古代史学，也受神学史观的影响，有不少荒诞不经的记载，即使像《史记》这样的优秀之作，都不能避免，如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说他是他的母亲刘嫖与蛟龙结合的产物，有龙颜、天子气，把他夜斩巨蛇虚构成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汉书》以后的封建正史写皇帝本纪，神意的色彩就更浓了。事实上，没有任何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受一定历史观的指导。因为揭示历史真相的考实性认识只是历史认识的第一步，历史认识还包括更加重要的工作，即抽象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求得历史运动的法则和规律。完成这一阶段的工作，史学家头脑里的历史观必然发挥作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更是有力的例证。20世纪以来，进化史观及西方新学理输入，唯物史观的传播，新时期的理论创新，都因其凝聚了观察历史的科学性，并且相继达到新的高度，而成为推动中国史学接连跨进新的阶段、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因素。进化史观，这一崭新的哲学观、历史观为20世纪之交的进步人士提供了新的观察历史和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梁启超、夏曾佑在20世纪初撰成的著作，与此前的史学论著相比，在根本指导思想和著述宗旨、论述的内容、视野和思维方式，乃至著述格局、表述形式上，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就在于崭新的进化史观使这些“新史学”提倡者站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极大地开阔

^① 《列宁选集》，3版，第2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了他们的眼界。20世纪初史学第一次大放异彩，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史学”正式产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进化史观的直接推动。五四时期，李大钊首先宣传唯物史观，特别是由于三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更为20世纪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境，指明了发展的新方向。唯物史观的开拓传播，在时间与五四时期实证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同，其后形成平行双线发展。李大钊指出，这种新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①。此后，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得到迅速传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即相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逐步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是鸦片战争以来150余年中国学术史上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②唯物史观，使中国历史学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也顺应了世界史学发展的新潮流。但还应指出，20世纪50年代在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中，由于水平限制和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出现了教条化、公式化、片面性及忽视扎实的史料功夫的偏向。一些对唯物史观理解深刻的学者，特别是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针对错误倾向，敢于顶住压力，态度鲜明地提出批评，坚持和捍卫了唯物史观的正确原则。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对历史学造成了严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历史学界开始反思如何准确地理解、掌握唯物史观的本来意义，努力促使史学研究达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以来，在历史观方面明确提出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使唯物史观在人们的研究中走向立体化。无论是重读，还是研究路向的确立，都是着眼于恢复唯物史观的本真面目，并且结合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实践，创新和丰富唯物史观。

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蕴

自唯物史观问世以来，由于其具有做出符合历史本原的解释的科学品质，从而超越了任何其他形式的历史观，并且对于全球越来越多的史学流派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那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借鉴和运用唯物史观。西方众多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总体性经济危机以后，即“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观点。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正像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说的，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② 高翔：《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学术道路》，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2）。



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分析’^①。这一段话说明了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因为其所具有的巨大解释力而得到原来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能够让反对者掉转方向成为支持者，如果理论本身没有强大的科学性支撑，是根本不可能的。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什么”为命题深入探讨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他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学家的主要价值在于他对历史的论述，而非他对于一般社会的论断。”^②他认为，马克思总的方法和观点实属才华横溢、博大精深，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唯一能够使我们解释人类历史整个过程的理论，并且为近代学术研究开创了最有成就的起点”^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观是历史阐释的基础，而不是历史阐释本身”^④。他指出，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的原因为于：

马克思的理论仍然是较为规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迄今为止——他是唯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学者。就这方面说，马克思要高于马克斯·韦伯，他是马克思的唯一对手，他对历史学家产生了理论上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更正。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无需韦伯学派增补的历史学是可以想象的，但对韦伯学派而言，除非它把马克思或至少把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课题作为它的起点，否则它就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要探索人类社会演变演变的进程，就意味着即使你不接受马克思的答案，但你至少要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马克思没有给这个问题画上句号——远远没有——但他确实为这个问题开了头，我们仍然有义务把马克思开创的研究工作进行下去。^⑤

霍布斯鲍姆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他认为，迄今为止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最有说服力的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换句话说，如果不回溯至马克思，或更确切地说，如果不从他思索的起点开始，严肃的历史探讨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基本上——如盖勒所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⑥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它对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揭示，使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超越它、代替它。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马克思的方法始终是能够使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②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169～1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③ 同上书，178～179页。

④ 同上书，186页。

⑤ 同上书，193～194页。

⑥ 同上书，6页。



们全面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唯一方法和从事现代讨论的最有成效的出发点。他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作了高度评价，但他并不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字都是无法改变的真理。“我并不是说马克思就是正确，或者说马克思的看法就是很恰当的，而是说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①

法国年鉴学派是国际史坛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新史学流派，其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奇怪的崩溃》中写道：“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造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在殿堂之首列。”^②因为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更进一步地说，“从新史学的总体系着眼，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年鉴学派史学家冲破事件史传统格局，将历史研究引向经济、文化、人民大众、物质文明等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③。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勒高夫在《新史学》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理论”，“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与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都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④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认为，20世纪上半叶历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他写道：

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强大的思想力量，在整个亚洲也是十分强大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同样强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伊赛亚·伯林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他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⑤

此段论述甚为精辟！

①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6页。

② ③ 《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3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④ [法] J. 勒高夫、P. 诺拉、R. 夏蒂埃、J. 勒韦尔主编：《新史学》，3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⑤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61页。



综上，唯物史观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各国史学家的共识，而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承认历史过程的客观实在性，一切研究都仅仅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二是探讨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三是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以生产发展为基基础，各种历史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的有规律的过程去研究。这些方法论原则使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方法论原则都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三个“坚持”中抽绎出来。

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那么，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方法。胡适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被孔丘、朱嘉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② 正确理解胡适之言的含义应该是去教条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忘记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研究。”^③ 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南；一是说它仅仅是指南，是方法，而不能当成一种先验的原则去框架具体历史。仅就第一重含义而言，唯物史观所坚持的从经济入手研究人类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早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由于这一正确方法的使用，从而对于人类历史本质所做出的科学揭示也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然而，唯物史观在带给学术研究以强大方法论技术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认真分析人们的质疑，主要疑点在于将唯物史观的科学内容演绎为僵化的教条，背离了其第二重含义。正是由于在学术研究中将唯物史观予以教条化，不但败坏了学术研究的风气，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蒙受了灾难性的命运，招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应有的一些误解。如果深入研究将唯物史观予以教条化的深层根源，除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本身具有艰深的思想内涵难以挖掘之外，学术追求上的急功近利也是重要的原因，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作为学术研究的唯物史观与政治诉求的不解之缘，尤其是受到政治短视的影响。对于这种不当对待唯物史观的风气，并非始于今日，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就遭到过包括教条化在内的各种歪曲。对于这种现象，恩格斯早已进行了告诫：“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④ 从恩格斯的真诚告诫中，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4页。

②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8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③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们不难发现使唯物史观免遭教条化的良策：一是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唯物史观的经典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从理论来源、理论生成以及真切内涵等方面全面解读唯物史观，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尤其值得细读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二是要结合人类的社会实践来验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人类的实践活动虽然不及自然历史一样悠久，但是回顾人类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原理所具有的真理性。具体而言，要充分占有资料，具体分析历史实际，防止空论。三是重视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可能性。唯物史观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观，作为一种历史观，还是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其必须对于现实问题具有理论上的高度解释力，否则，说教式的灌输只会徒增人们对于所诉求灌输内容的反感与排斥。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唯物史观，其科学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将历史概念化实际上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他们虽然认为科学的概念（也包括社会学的概念）反映了实际历史事实的特殊方面或特征，但他们也反对把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尤其反对把这种概念的内涵同它所指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① 恩格斯在他的 1895 年的著名通信中写道：“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②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分析苏联史学家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时指出，马克思和列宁建立的大框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大框框内确立精确的和普遍承认的俄国史或世界史的分期方法上没有丝毫进展”，因为“在历史的现实中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奴隶制或‘纯粹的’封建制这样的东西。历史学家遇到的是因国家而异的‘不匀称的结合’”^③。这也验证了恩格斯的经典之语：“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④ 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需要我们科学地对待。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使中共党史的研究一开始就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果说中共党史的研究滥觞于 1924 年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

① [美]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9—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9 卷，40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③ [美]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3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4 卷，68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那么到今天止，中共党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九十年的历程。^①从更广阔的历史和政治语境的眼光出发，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转型紧密相连。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历程正是由于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而发展的结果，根据时代变化及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出发，中共党史的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②

一、中共党史研究的萌芽阶段（1924—1935年）

自1924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延安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应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萌芽阶段。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较为短暂，另外，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还处于自身发展阶段，还长期处在战争环境当中。因此，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多为中共党内的领导人，一些研究多为介绍情况式、汇报工作式的。如《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是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是蔡和森在中共顺直省委会议上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作的报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瞿秋白为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作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是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中共党史报告时的讲演资料；《党史报告》是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宣传其“左”倾思想的系列文章之一。他们研究的目地性很强，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出于宣传教育、总结经验教训的需要，政治色彩较浓厚。这些党史研究者多曾任中共党内要职，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及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自觉地应用到党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体现。

如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5

^① 中共党史研究滥觞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看法，一说是开始于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说是开始于1921年1月瞿秋白撰写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于俄国的期望》、《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以及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字，表明中共党史研究在1921年已经萌芽。本文依从1924年说。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应该是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是陈公博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在1924年1月完成的硕士论文。文章一直保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960年才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发掘出来。这篇论文由绪言、正文六章、六个附录构成。绪言概述了中国的基本变化；第一章分析了中国辛亥革命的真正原因；第二章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先驱；第三章、第四章分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第五章分析了国民党的新计划及其最近的趋向；第六章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结论：六个附录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参见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② 目前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分期主要存在两种方法：一是五分法，即五个时期：萌生（1924—1935年）、初建（1935—1949年）、成型（1949—1966年）、挫折（1966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复兴（1978—）。二是三分法，即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49—1978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这两种分法各有其道理，实际上也并不冲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年第二次中央执委会会议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这篇报告中，蔡和森开宗明义提出开展党史研究的必要性，一是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二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尽管不长，但已出现了种种复杂的史实，对党外的谣言、攻击，欲澄清是非，须研究中共党史。基于此，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的发展作了全面的研究，梳理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发展阶段、发展道路、经验教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五四运动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他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初步理出了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发展线索，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宣传的时期，中共四大解决了一些民族革命的理论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群众组织发展，形成阶级与群众的党。在研究中，蔡和森还从中共的思想路线、组织工作、重要会议以及党内生活、党内精神面貌等多侧面、多层次研究中共党史，将工运史、农运史、青运史等与中共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对国民党的历史及发展状况作了分析。作为一部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之作，蔡和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中的成绩与不足作了分析、评定，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础，为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党的机会主义史》主要论述了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八七会议期间党内斗争的情况，着重研究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生、发展以及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较严重的“左”倾情绪，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招致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沉重灾难，一直比较愤恨，要想公允地评价机会主义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和森能较实事求是地论说历史事实，说明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以及机会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分析了当时中央指导机关的状况以及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与应负责任，还正确评价了共产国际代表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负的责任，没有把所有的错误算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这在当时来讲，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特别是蔡和森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较客观地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绩与错误，为今天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研究结论也对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他写于1927年2月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系统地论述和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能够力争并取得革命的领袖权，必须领导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必须重视暴力革命和取得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他的这些思想



与认识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写于1929年至1930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是瞿秋白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形成时期所作的系列报告的系统总结，惜仅存提纲。从提纲目录来看，瞿秋白引用大量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会议的文献资料，分析问题详细、全面，构建了完整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作于1930年2月，而1930年前后是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也是“左”倾冒险路线形成时期。《党史报告》论述了1921年至1930年初中共的发展史。一方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某些经验教训，对党内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一些“左”倾思想，如他在《党史报告》中对共产国际作了不恰当的评价，甚至认为一切正确的东西都是共产国际领导的结果，一切错误都是中共没有听从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对共产国际的盲从、迷信是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肯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中共党史对于政治路线与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这些著作都能够比较客观地叙述中国共产党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问题的发展过程，对一些中共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大多以个人的经历为论述的佐证，以个人的体验和理解去说明中共党史，都是作者的独断之学，有鲜明的个性与风采。但由于这一阶段的中共党史研究还处于自发的、孤立的和零星的状态，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文献资料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他们的中共党史研究带有很大的回忆成分，这些都使中共党史研究在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严重的不足。但这些中共党史著述不是书斋里的产物，而是依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其历史资料价值远远大于他们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1935—1949年）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回顾中共党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共党内干部、党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高级干部开始大规模地、有计划地集体研究党史，自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热潮。因此，这一时期的大批研究成果在中共党史学史上影响极大。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热潮的出现，这一时期全党对中共历史文献征集工作开始重视起来。1938年6月，解放社发出“为征集中共历史文献的启事”，号召各根据地搜集中共成立以来的一切文献，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及各省组织所发表的重要文件及刊行的党报和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著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共历史资料搜集整理活动是《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历史文献集的编辑出版。1941年12月，《六大以来》正式出版，该书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至194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556个



文件，计280多万字，包括中共会议纪要、决议、指示、声明、通告、电报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信件等。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要求整理六大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文献。1942年10月，《六大以前》出版，收入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献199篇，计136万字，其中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文章约占全书的2/3，其余的是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宣言、通告以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决议和列宁、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这两部文献集的出版奠定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础。

但苏联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之影响不能不提。1938年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苏联出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为此专门通过决议，宣布其内容为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的正式解释，具有法典意义，不允许有不同的见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活动不断结合的过程，强调在革命过程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该书介绍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文字以及引用他们的有关语录，占了全书的1/4，有神化领袖、宣传个人崇拜的倾向；把联共（布）党内斗争用“路线斗争”来概括，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总结出十五次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以“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作联共（布）党史的主要内容。1939年底中文译本在延安面世，中共中央号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马列主义普及教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适应了中共思想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极为推崇，视之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书目，用以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

中共高级干部在研究中共党史时积极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例如，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就认为，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以乡村作为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则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作全面系统的阐述。而毛泽东对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理论的开篇之作，对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中心、研究方法、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以及中共党史分期方法等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毛泽东指出，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2~8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实际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还根据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变化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大革命的准备阶段（1911—1924年）；大革命时期（1925—1927年）；内战时期（1928—1937年）；抗日时期（1937— ）。毛泽东在中共党史学理论方法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中共党史的开展提供了思想武器，自此以后，中共党史研究者不仅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历史，而且融入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把研究中共党史作为其开始的内容，又始终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在反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领会马克思主义，其最终成果就是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此《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涉及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对中共党史研究影响深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政治决议，其主旨在于对“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与危害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了深刻分析，使全党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其重大政治意义毋庸置疑；作为涉及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对中共党史问题研究贯彻了唯物史观思想，对一些中共历史重大问题作了分析评价，其分析问题的方法与结论对中共党史研究都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奉为党史范本的情况下，《决议》明显地受到《教程》的影响，一是突出个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忽视集体领导的作用，如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唯一代表，称毛泽东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二是强调路线斗争，存在着把中共历史描述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倾向，这为建国后阶级斗争逐步扩大化的情况下把党的历史写成完全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作了铺垫。另外，由于《决议》之政治意义重大，使中共党史研究者把《决议》的结论当成定论，开始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制约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三、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阶段（1949—1966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时期。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我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史学界也开始了重大转向，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为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成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成为高等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在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逐步增加，党史研究队伍逐渐形成，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开始建设和发展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最早设立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研室，并自1951年起开始招收1~3年不同学制的研究生，还开设马列主



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分班；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置了全国第一个中共党史本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专业毕业生，成为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共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要骨干力量。而《毛泽东选集》1~4卷的出版，对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等，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另外，一大批高水平的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如《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等500多种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学的内容。

（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比较重视《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与发行工作，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去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树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心与勇气。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17篇著作。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写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写的31篇著作。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70篇著作。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本身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的杰作，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老一代党史学家胡乔木、何干之、胡华等历来重视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与研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是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因此，《毛泽东选集》与中共党史研究关系密切，其1~4卷的编辑出版，对中共党史学学科的建立、研究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195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的“而立”之年，社会各界掀起了学习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高潮，此时，社会迫切要求出版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的简明通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应时而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系统地阐述了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所经历的自五四运动、大革命、十年内战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大理论问题，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三十年，乃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斗争，通过许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①可以说，《中国共产

^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党的三十年》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20—40年代历史的总结，它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论述，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此书虽是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的急就章，但在史料采择与理论深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所以，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当时社会的极大欢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首次全文发表。各地报刊纷纷转载。6月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至1962年5月，人民出版社已重印28次，印数达212万册。此外，各地出版社也大量重印，如上海人民出版社至1962年3月就重印38次，印数达156万册。另外，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星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学习参考提纲》，初版印了25次，发行量达到45.2万册。“通过对该书的学习，在全国掀起了学习中国革命史的高潮，使人们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①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大。在20世纪50年代，中共党史学还刚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究竟如何进行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建国后第一部系统地概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著。”^②也是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完整地、系统地简要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作为中共党史学成型时期的代表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所创设的研究体系和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及中国革命规律、经验的探讨和研究，把成型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分期问题。由于述史论事都必须有明确的分期，因此，分期问题是历史研究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共党史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把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49年）。这种划分充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说明了不同时期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这种分期对中共党史研究影响较大，为史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研究体系的基本格局。《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所体现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是从政治原因、政治需要出发论史。此书的出版是有着特殊的背景的，其思想内容受当时政治背景所限，出发点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论述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重墨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其撰写的突出特点就是毛泽东著作中的材料来解读中共党史，此书直接引用和介绍的毛泽东论著有18种，客观上也出现了用毛泽东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和党的一些重要决议的观点来论述党史。当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过多地引用毛泽东的论述来说明各种问题，不仅易于走向毛泽东史代替党史的不健康之路，也易于造成用毛泽东的是非来评定中共党史是非的不科学倾向”^③。《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面世后，由于舆论上和宣传

① 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161页。

②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1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③ 周一平：《中共党史学史》，137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上，都过分突出其经典性，以至于在一定时期内，中共党史研究深受其影响。

（三）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最初是作为教材，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末。1948年5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8月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同时期，以陕北公学为前身的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建立了华北大学。学校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解放全中国，为迅速建立的各级新生的人民政权培训大量急需的干部。在此形势下，华北大学校内印发的教材中，有一本是胡华编写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该书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雏形。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深入抗日敌后办学的华北联合大学就把这篇著作列为“中国革命问题”课的主要教材。后来，中共中央在对华北大学的有关决定中，规定要开设“中共党史”课，胡华担任了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在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时候，常常要结合着历史来讲，便把这门课程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历史”。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历史”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课程之一。1950年3月，胡华根据长期教学过程中积聚起来的资料，编写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后经中宣部领导同志审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发行后即成为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该书上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分六个时期叙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兴起的学习党史、革命史热潮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此后不久，胡华又根据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指示，主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他和两位助手戴逸、彦奇，用三人所得的全部稿费购买了一架飞机，捐献给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该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印了13版，发行230多万册，除了中文版、日文版和朝鲜文版外，还用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从初版到第13版，一直称为“初稿”。这是因为，书虽然出版了，但作者始终认为，这本“应急之作”有待于听取各界读者的指正，不断补充修订，这足见胡华谦虚治学的态度。由于该书是为新中国诞生而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北京图书馆曾把这本书的手稿征集在国家的珍本文库中。由于胡华的卓著成就，被学界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应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年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需要，经胡华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以新的研究成果再次亲自补充、修订再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198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共10余万册。2009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们的修订，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该书既有厚重的学术深度又有简明革命历史读本的特点。

（四）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何干之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后任历史



系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不仅主讲校内马列主义研究班和各系科的“中国革命史”课程，还被高教部聘请为全国革命史教员授课。1957年全国中国革命史的教师有13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听过何干之的课。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曾受业于何干之，后来他们都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12月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领袖活动与言论成为全书的史实概括和理论分析的前提与依据，明显地带有以论带史的烙印。该书1956年再版，1957年第1次修订时改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1958年、1959年、1960年连续3次再版。1957年修订时，何干之根据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对旧版本中关于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的一些过高评价和不适当的提法作了修改，全书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并删去50多处毛泽东的名字、7段毛泽东重要论述和多处斯大林的名字。1965年修订时，进一步增加了对敌方、友方和人民群众的论述内容，以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国革命史的面貌。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指定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教材。从1954年底出版到1960年，发行超过了160万册，并被译成俄、英、越等各国文字在国外发行。该书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共党史著作的编写，“‘文化大革命’后编写的党史教材，虽然所依据的材料比过去多了，编写者的认识、观点也有了很大变化，但基本框架仍然源于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①。而且，“在60年代、70年代，直至80年代出版的若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或专著中，都可以看出《中国现代革命史》在体系、体例、史料选择运用、理论分析，甚至于行文风格等方面的优点被继承、被发展”^②。

四、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阶段（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共党史研究是重灾区。林彪、“四人帮”为达到夺权目的大肆篡改中共党史，用“三个突出”原则来编写党史，突出毛泽东个人缔造了党、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在此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党内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给他们自己树碑立传，把中共党史篡改成了个人崇拜史与路线斗争史（两条路线，十次路线斗争）。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便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天这个犯了路线错误，明天那个犯了路线错误，一会儿你打倒我，一会儿我打倒你，斗来斗去，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得凄凄惨惨。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正确，几乎没有哪个领导人没犯过错误，动不动就给别的领导人扣上“反对毛泽东”的帽子，甚至诬蔑朱德总司令为“黑司令”。同时为了树林彪，把林彪说成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把1928年朱毛并

① 张静如：《何干之对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载《北京党史》，2006（5）。

②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193页。



冈山会师说成是林彪与毛泽东会师，朱德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严重歪曲。

谁都不否认，两条路线斗争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两条路线斗争仅仅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中共党史的全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日益结合起来，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转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胜利，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日益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把中共党史歪曲成一部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丢掉了中共党史的根本内容，抹杀了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歪曲了中共党史的真实面目。

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来看，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也不是主要的。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要算是时间最长的了，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其次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其他的错误，都只不过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例如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虽然在1926年12月汉口中央特别会议上开始形成，但真正在全党占统治地位，还是1927年4月1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也都不过几个月。这些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相比，不是主要的。它们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有的虽然非常严重，但也不能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因此，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两条路线斗争史，完全是错误的。

五、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阶段（1978—）

从1978年12月至1981年6月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窒息混乱的中共党史学科带来了发展的生机。中共党史学界端正了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推翻了一些不公正的历史结论。这一阶段党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冲破党史界的外部禁锢，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中共党史研究矫正过来，恢复中共党史的本来面貌。党史学界逐渐摆脱传统思维方式或消极因素的影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历史主义原则，从历史本身去研究历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大量的翔实可靠的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改变以往“文献串讲”、“讲话阐发”的研究模式，开始大量运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不少论著的论述方式有了很大的突破。对一些学术上的争论，不是简单地照搬以前政治批判的语言，而是严格地依据史实，从事实上对不同观点进行驳击，在史料引证和注释上，大多能做到严谨可靠。如对中共领袖人物的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分支之一。新时期以来仍是非常重视对中共领袖人物的研究，但研究对象从基本上研究毛泽东一人发展到对多



位领袖的研究。当然，毛泽东依然是最受研究者重视的人物，甚至出现了“毛泽东学”。但这时的研究就不再是歌颂和诠释的性质，而是强调客观和准确。不再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结果，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还出现相当大的争议。如有关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时间就有三种说法：一是遵义会议；二是毛儿盖会议；三是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权威性的政治论断消失了，而是依据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不再是某种宣传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1981）一书的材料，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评价也有了新的论述，指出“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指出蒋介石认识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①。肯定了蒋介石在1935年已有联苏抗日的想法而不是一味妥协投降。对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态度，分析论述道：“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当时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②这个论断同以往的中共党史读本中对蒋介石所作的一些政治否定断语相比照，可谓有着天壤之别。这也说明，且不论一些非官方的民间性党史研究话语的兴起，就是作为特别强调中共党史学的政治性、服务性、教育性的“官方”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已能运用一些新材料做出诸如此类的新论述。这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日趋客观和深化。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实践表明，中共党史研究从关心宏大历史越来越转向微观的实证分析，这蕴涵着研究主体治史理念潜在的转变。宏大叙事以探求普遍性的规律为旨归，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学者们在许多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③。这并不意味着对宏大历史的忽视，而是试图通过对基本史实的发现与钩沉，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去揭示历史的真相。这也暗合了梁启超所总结的一条学术规律：“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④学者们在搞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使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如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陈独秀与向忠发的研究，等等。

诚然，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靠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但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方法论变革或范式革命意识则凸显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利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新探索，提倡从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5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169~170页。

③ 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59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443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心理分析法,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许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新创见都是依赖于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突破而前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为学术的发展创造了思想基础。宽松的政治氛围使中共党史研究有了广泛的学术自觉。中共党史研究也日益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逐渐改变了原来公式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从对政治的被动依附跟从中逐渐独立出来,学术的自觉与研究主体的自立意识增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表明,中共党史话语日趋摆脱政治论断模式,步入规范的学科语言系统。正如胡乔木对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评价:“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来,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质量之高,数量之多,新领域之开拓与新方法之运用,史料的公布,组织机构的健全,刊物报纸之多,可以说是超过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成果总和。中共党史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国内外相关档案相继解密,使不少学者开始考虑采用协作的方式、选择适当的专题和学术团体共同整理文献,共同出版论著,跨国界研究的学术风气渐起。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也更为丰富。石川祯造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给国内中共党史学界带来不小的震动。对于国外研究成果,我们要采取积极交流、取长补短的态度来对待,同时在交流中分清是非。

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中共党史研究将更加求真务实、生动活泼,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者的态度更加客观、实事求是,学术风气更加清新,国内外交流日趋频繁。

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共党史学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中共党史学是一门有关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科学,其基本内容不但要揭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门学科还必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规律。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中国历史道路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挥自身的先进性而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而在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中,必须以现实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历史为基本的研究“质料”,对这种“质料”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就是唯物史观的运用过程,因为中共党史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历史。总之,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人书写的,唯物史观提供了真正观照“人”的方式。它既注重历史的表层,又走向了历史深处;既展现历史丰富的个体细节,又揭示历史宏观的运行规律,从而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说明和深刻把握。“有远见的历史学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1页。



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① 不仅如此，还应该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以努力做到接近历史本原、展现历史的丰富性，来充分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达到对历史规律和人的活动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从而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

第三节 历史主义原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一、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

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就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②，其内涵即为历史主义思想。历史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给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个总的方法论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求奉行历史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主义思想的表述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③ 其实质内涵即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有规律的统一运动过程，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每个发展阶段出现的历史事物，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从方法论角度视之，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要求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时，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考察问题。同时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事物，把历史事物作为一个过程去研究，把先前的历史看作现实的可靠基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历史遗产。^④

① 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载《历史研究》，200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16～217页。

④ 参见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279～320页。



毛泽东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一文中特别强调历史主义原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称之为“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举例分析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据此，毛泽东提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①毛泽东的这篇宏论，对目前的党史研究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确，“研究党史，应该把党的活动纳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范畴来考察，不要离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孤立地讲党史，防止党史研究中简单化的倾向。要正确反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与党史的联系，从当时历史的全局和整体出发，把党的活动放在恰当的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才能全面地说明党的活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②。

二、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即是用阶级理论来分析观察阶级社会历史上的种种现象。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上，离开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很多问题是谈不清的，特别是无法准确地解读改革开放前始终依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指导革命与建设中的种种成功与失败。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党史研究》，1980（1）。

^② 王首道：《〈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序》，载《人民日报》，1984-04-30。



我们所要评价的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阶级的代表，因此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就难以离开阶级分析。但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需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把阶级斗争观点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用生产的发展来解释阶级的起源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其基本理论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之间的斗争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由这个专政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毛泽东在文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质、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划分了全国约4亿人口中敌、我、友的界线。

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如果脱离了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方法是不可得到科学运用的。一段时间以来，甚至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史学界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始终存在一种偏见，研究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只能肯定，不能批判，只能热烈歌颂，不能客观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民粹主义。翦伯赞认为：“要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歌颂他们英勇的革命斗争，但历史家不是诗人，除了歌颂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① 其实，“应该用历史观点对待这些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不要依照现代无产阶级的样子去塑造他们的形象，不要把他们写得和解放了工人阶级一样是当家作主的阶级”^②。整个极左时期，阶级分析被简化为阶级成分划定，根据家庭出身贴阶级标签，这样的运用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践踏。拨乱反正以后，学界开始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唯阶级斗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历史时必须抛弃阶级分析方法。针对近来中国近代人物的评价中出现的翻案现象，有学者再次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必要性，指出，对于历史人物不是不可以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和出发点上，要不要对历史人物作基本的阶级分析，要不要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发挥的作用作总体的把握。如果对此完全置之不顾，恐怕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的。^③ 阶级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与阶级标准混为一谈，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并不是以阶级为标准去判定。

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一个阶级要进行具体深入的阶层分析，不要把一个阶级看成铁板一块。任何一个阶级都分为不同的阶层和集团，这些阶层和集团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差异，他们也就产生了不同

① ②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载《光明日报》，1961-12-22。

③ 参见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见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95~11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的利益诉求，从而使他们之间相互区别。简单地判断某人从属于某阶级或集团，而去肯定或否定之，这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是根据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而非家庭出身。要认识到，个人是阶级的代表，但并不一定是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代表。孤立地静止地用个人出身、家庭成分来解释一个人一生的言行是站不住脚的。很多政治家的阶级属性并不从属于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同样出身的人，甚至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而去充当不同阶级的代表。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其阶级属性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学说所服务的阶级，他们的思想学说所体现的阶级性与他们的出身也常常是不一致的。三是阶级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但不是社会关系的全部，不能用阶级分析取代对所有社会关系的研究。除了阶级关系之外，社会关系还应包括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宗教关系、民族关系、乡土关系、家庭关系、交友关系等，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当做阶级问题去处理，对任何问题都“上纲上线”进行阶级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从1949年至1956年，社会阶层结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组成；自1956年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阶层结构为两个阶级与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所构成。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化日渐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经济体制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两种巨大的变迁催生社会全方位的转变，特别是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①。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社会新阶层逐渐形成。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划分阶层的唯一标准，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来的发展也导致了不同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

三、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

人们总是习惯于拿今天人们的意识，去推想历史人物的活动，把现代意识强加于历史

^①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人物头上。每一事物都只从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不能把它跟不同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其他事物相混淆，或者对不同时代条件进行简单机械的类比。因此，对客观历史环境的正确分析极其重要。黑格尔曾多次强调：“必须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①“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②对历史人物应当从他们当时特定的处境、条件和认识来解释或评价，而不能用以后或现在的实事与认识来假设古人应当或可以怎样，然后作非历史的评价。清人陈弘谋曾言：“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得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③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就是要能“深入于历史”之中，“处古人之位”，如同陈寅恪所论，要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即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场景之中，按照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特定身份、地位、教育、知识等所决定的立场情感背景，来具体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如学界在研究孙中山当年在对日关系问题处置上所引发的一场孙中山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的争论。问题是由在日本所发现的孙中山当年为谋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不惜向日本当局承诺出让“满蒙权益”的各种文献资料所引起的。同情孙中山的研究者坚持这只是孙中山的一种革命策略，不表示孙中山不爱国；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则断定孙中山民族意识淡薄，事实上认为孙中山不那么爱国。但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而根源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能够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之中，设身处地地按照孙中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问题。说孙中山不爱国，那他革命干什么？读一读孙中山当年种种革命言说，几乎无一不洋溢着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的强烈情感。问题在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的是，当年孙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国”。孙中山革命的初衷，不过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指的是满人，“中华”指的是汉人历史上的国家，其范围在北方即以长城为界。换句话说，孙中山当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是把满人赶到关外去，而在长城以内重建一个汉人自己的中华国家。这也就是说，孙中山当年所爱的“中国”，在疆域上有别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中国”。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人对何谓中国，以及应当如何建国，有着和我们今人的中国概念非常不同的认识，我们就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拿今人的眼光和今人的认识来衡量和要求历史人物。^④

胡华在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时强调指出，人物传稿必须“严格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发展的各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② 同上书，112页。

③ (清) 陈弘谋：《从政遗规》，卷上，24页，金华，国民出版社，1940。

④ 参见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1—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个阶段作如实的叙述和具体的分析，不虚构事实。对前人既不苛求，也不溢美。基本事实必须考订清楚，力求准确无误，信而有据”^①。老一辈革命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王首道亦指出：“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和广大群众的活动造成的”^②。研究历史人物，撰写人物传记，“必须以研究其在某一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事件的发生、发展、消亡为中心，如实叙述该历史人物所参与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并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③。

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④

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历史进行抹杀消除，而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虚构历史的思想潮流。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它采取极端消极或极端激进的方式，通过割断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联系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不承认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是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漠视人文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及其教化意义。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呈现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大气候的影响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加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出现理想式微、价值坍塌、道德滑坡等种种现象，国际因素与国内状况都助长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中共党史研究最为显著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化道路只是起了一种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应当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二是认为中国五四时期以来背离“以英美为师”的现代化主流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三是认为中国设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显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以否定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取得民族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而体现出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持的这些谬论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不和谐的“噪音”和“杂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并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带来了严重冲击和挑战，因此，必须从思想上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

在方法论上，历史虚无主义执著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并以此代替对历史整体的把握，从而疏离了历史的真实本质。虽然历史虚无主义口口声声要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目

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前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② ③ 王首道：《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载《人民日报》，1983-12-09。

④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标，但由于它总是脱离历史中的联系，仅仅抓住某些“片面性”的历史事实来判断历史整体，以偏概全，将一时一事等同于整个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以事实为出发点，不是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加以涂抹或剪裁，凭借“新奇大胆”的想象肆意歪曲和否定历史。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力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那些“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现象，实质上就是缺少对历史的本质探索和宏观把握而导致的对历史的戏耍，最终不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历史虚无主义打着“思想解放”、“反对僵化”的幌子，通过对历史的否定达到对现实的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被否定必然会使现实社会制度的存在失去历史依据，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就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殷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样的，历史的、现实的，内部的、外部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但在其解体前夕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起到了很坏的推动作用。苏联被摧毁的一个重要的舆论突破口，就是否定苏联的历史，从否定斯大林开始，发展到否定列宁。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要炸毁过去的一切”喧闹声中，摧毁了苏联共产党。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如出一辙，同样是肯定中国近现代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制造思想混乱，以达到煽动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不满，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绝不能小看。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就要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

胡绳的《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一文，从正、反两个方面，有理有据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即使犯了错误，仍不失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此篇文章的撰写，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胡绳的思考路径不同于历史虚无主义者，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剖析中共党内存在的阴暗面。

胡绳指出，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没犯过错误，没有阴暗面。实际上，每个时期党都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东西，同时也有错误的、阴暗的、不光彩的东西。“党的组织中会有阴暗面，不存在阴暗面的时候是没有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同坏现象、同党内阴暗面的斗争。党

^①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8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不在于没有阴暗面，而是在于能与这些阴暗面作斗争，在斗争中使正气占主导地位。”^①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决地不断地为克服自己内部的阴暗面，自己内部的错误而斗争，正如不断地同党外的敌人作斗争一样。它之所以是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此”^②。每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都有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区别在于哪种情况占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情况，但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总能最后战胜错误的趋向。胡绳论道：“在党的历史上是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好像也不是。也有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党内也有积极、健康、正面的东西，只是一时处于被支配、被压制的地位。它不断地生长、抗争、发展，经过一定的条件终究会取得胜利。”^③

胡绳坚持从总体上评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毫不回避中国共产党犯过的任何错误，他反而认为，如果把几个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截然分开，反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的总体说清楚或说到位。他说：

还有一点要明确的，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就党的全部历史来说的，不必将哪个时期例外。如说这个时期党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另外一个时期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很难这样分。因为在每个时期，党都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东西，同时也有相反的东西，而这些相反的东西在绝大多数的时期内不是主流。如果“声明”一下，说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要将（20世纪）30年代前期除外，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除外，那样反而说不清楚了。对我们党，要看重内在的、整体的、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党自己克服了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这本身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纵然是在错误路线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党的健康力量，党的活力，党的优良传统依然存在，并且总是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斗争，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并向前发展。它们就像石缝里长出来的松树一样，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茁壮地成长。这种斗争虽然是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但终究会取得胜利。这正是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所在。^④

胡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个整体，在评价时不能截然分开。如果仅仅抓住这些暂时的失败和挫折，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就可能会得出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结论。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了胜利。但是，如果视错误而不见，武断地否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的各种错误，全盘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使中国共产党及时改正错误，端正方向，找准道路，而且极易把中国共产党重新引向“左”的深渊。因此，这两种中共党史研究取向都是要不得的。

^{①②③④} 胡绳：《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5）。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我们应该看重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不会为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事件所局限，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就会深化，从而在分清是非的前提下，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采用走极端的做法，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然不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辉煌成就的事实，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法西斯主义政党且有过之无不及。综上所述，要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只有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失误，才能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不贬低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又不回避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透彻的研究，才能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领导，以理服人。

第四节 中共党史人物评价问题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史诗，涌现出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英雄、模范。分析与评价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认识中共党史的必要的直接的基础。中共党史专家彭明曾指出人物研究“虽然不能代替全面的历史研究，却能使历史研究大为丰富、深入而具体”^①。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物的深入研究始终没有真正活跃起来，在“左”倾思想的束缚下，神化个人，使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脱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般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公式化。无法生动、具体地展现人物的思想、个性。以致在相当的时间内，没有把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放在应有的重要的地位上”^②。因此，应该重视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

一、坚持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共党史人物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篇就是围绕对重要中共党史人物评价的拨乱反正而展开的。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难点。有些人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有些人则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甚至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邓小平高瞻远瞩，依据唯物史观关

^①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见《彭明文存》，279页。

^② 吴家林：《中国现代革命史人物研究》，序言，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以及杰出个人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等原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解决了这个难点。邓小平在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精当的见解。“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对错误的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①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唯物史观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以及杰出个人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等原理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革命领袖人物依靠群众力量实现自己的历史作用；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定的社会需要的产物；历史个人可以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个人隶属于阶级，历史个人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②

近几年来，一些中共党史人物评价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人物成长发展的内在关系和相关联系分析不够。一个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够对重大历史事变产生影响，其一切必备的个人素质，都不是偶然获得的，而是他一生中思想和才能培养、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有一些人物评价对历史发展趋势与党史人物的关系把握不准确，评价党史人物存在着拔高的现象，不够客观准确。唯物史观认为，英雄、伟人任凭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也不可能提出并完成客观物质条件尚未提出的任务，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去创造历史，不可能具有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的能力。有些传记把中共党史人物写得小革命，一贯正确，从来就没有缺点错误，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与科学评价中共党史人物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存在评价方式带有模式化的问题。实际上，胸怀宽广的共产党人能够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真对待，以汲取经验教训。如邓小平，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③ 1986年9月，他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坦言相告：“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

①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96页。

② 参见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24~3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7页。



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①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邓小平都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

坚持用唯物史观评价党史人物，就是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叙述和全面认识党史人物。在全面准确把握党史人物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应该从一个人的主流、大节上去评价，从历史的功绩、贡献上去评价，看他的社会实践是不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有没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我们不应该苛求党史人物，而应该正确看待他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和所犯的错误，而不能以偏概全和情绪化地评价党史人物。胡乔木曾指出：“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要求那些革命人物是完人，像悼词上说的那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同志不是完人，是否被毛泽东同志整过的人就都是完人？也不能这样说。我与他们一起生活很长时间，了解一些情况。要尊重历史。不久前《人民日报》刊登的张树德同志的一篇文章，说1945年那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任弼时同志口授，由他记录的。几个人（包括我）整理一下就成了那个历史决议。这里要申明一下，不是因为牵涉到我，我就讲这件事。我认为，这篇文章写的基本上不是事实，不实事求是。现在写回忆文章，好像回忆谁，谁就都是正确的，形象非常高大。任弼时同志对革命贡献很大，但是他没有起到的作用不要硬加给他。回忆录有些不是本人写的，难免有些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但要尽量做到科学，实事求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不大容易弄清楚的，出现回忆文章不实事求是，让人更加弄不清楚。那个历史决议不是我的作品，也不是弼时同志的作品，是集体创作。讨论时大家提意见，弼时同志也不是提意见最多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写党史时遇到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免不了感情上的问题，但不能说他们没有任何缺点，对这些人物都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对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上帝，后来变成魔鬼，不成为历史，成了神话故事，成为不可理解的了。”^②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历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如对张国焘，胡乔木强调：“建党初期一些重要人物要搞清楚。不要回避张国焘。当时陈独秀有名无实，张国焘资格老，活动能力强，北方工人运动一直是他领导的，在党中央比较有发言权。后来他成立第二中央，为什么他能这样做，这与他在党内有资本，是老资格有关系。别人在当时的资格都不如他。现在党史中根本不提张国焘建党初期的活动，是不对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

①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73页。

② 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1985年11月4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43—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③ 胡乔木：《党史应拿出权威性的材料，要有些新东西》（1987年6月12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53页。



都会不一样。”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时,工作人员多次建议把“我的一个大失误”这几个字去掉,而小平坚持保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是以他检讨自己失误结束的。可见,客观准确地评述党史人物要包括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的失误和教训。

历经多年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在人物评价方面树立了楷模,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也获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例如,1985年4月在美国出版的《共和国中国》第10卷第2期中,一位美国历史学博士评论说:“和以往出版的那些人物传记比较起来,这套书显著的一点是对历史人物不作《圣经》中‘使徒行传’式的歌颂,即只讲优点,不讲缺点,而给予比较全面的历史评价。这样它就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史料宝库……这一点反映着近来中国史学的进步。它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典型。”^①

二、中共党史人物的价值评定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首先遇到的是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定位,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其时代价值的界定;二是对其历史价值即历史地位的界定。在此过程中,还要面临对一些人生经历较复杂的中共党史人物的功过应该如何进行评定的问题。

(一) 分析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伟大需要,以此判断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价值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始于毛、成于邓”,这句论断清晰地说明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二人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过109年的斗争,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从此结束。毛泽东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②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水平极其低下,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大量存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极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部分,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也是任何考虑中国发展问题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事实。毛泽东就曾形象地把建国之初的中国国情概括为“一穷二白”。那么,如何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走出一条既符合人类社会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翻身获解放的劳苦大众,对社会主义新社会、新制度无限向往,他们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在社会建设中焕发出超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烈要求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种要求加快发展、

^① 转引自彭明:《〈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编后感言——并纪念主编胡华教授》,见《彭明文存》,2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渴望早日实现富强的社会心理，引起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强烈共鸣。毛泽东从中国这个时期的特殊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指导，将新中国的发展目标定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性质，毫无疑问，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但是，新民主主义毕竟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它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1952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中共中央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于1953年9月庆祝建国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一设想，在同年12月的宣传提纲中具体解释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估计，少则10年、15年，多则几十年，即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形势后来发生了变化，这样一个15年的计划，不到七年就完成了。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首先宣布完成三大改造，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某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①。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新中国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要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一方面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决定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华采取了十分敌视的态度，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更是断绝同中国的一切往来。但强国意识主导着开国领袖的思想和行为，新中国要想走出困境，关键是实现自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联系，要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必须具备现代化的“机器”——工业。但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性的工业只占10%左右，更谈不上国民经济的完整性和均衡性。毛泽东很生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尽快转到工业化的发展轨道上来，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资源解决最为紧迫的问题。因此，选择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另外，当时的世界形势是资本主义已向下降落，社会主义已开始向上成长。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巅峰时期，国际地位举足轻重，与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形成对立的冷战格局，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使中国政府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当时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重工业设备，还派大批技术专家来华和接受中国派去的大量留学生、实习生。这在当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国际上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以及对新中国的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还有新中国建设计划需要等多种因素，促使中共中央提出中国的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正确选择。三大改造高潮的到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完成，完全改变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正如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论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①这也是“始于毛”的真实内涵。

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认识到了一些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确立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并进行了经验总结。但其间由于种种原因，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偏离，使社会主义发展遭受了挫折和损失。“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的宣言书，由此而形成了新的发展战略，掀开了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新的新的一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是“成于邓”的真实意蕴。

（二）分析中共党史人物对整体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此判断其历史价值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有一个概括：“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③十五大报告的这个概括，有助于人们从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观察和把握中国20世纪历史的基本进程，从而也为这三位伟人的历史地位作了很准确的判定。十五大报告之所以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称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伟大贡献所带来的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三位伟人的历史价值或历史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794页。

^②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69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2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位是不难判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有争议的党史人物，会给我们的价值评定带来一些难题，如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评定问题，一度在学界出现过很大的争议，对于这些中共党史人物的历史价值或历史地位的评定，同样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但也有过一些沉甸甸的帽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等。目前学界对陈独秀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他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但是，对他的评价仍然分歧很大。评定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有两件对整体历史进程刻痕较深的大事不能不提。一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当之无愧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至今没有一份刊物能与之相比。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陈独秀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作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共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了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这两件大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名留青史、功垂千古！所以，陈独秀的杰出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抹杀的。

三、科学客观地认识中共党史人物的过错

诚如毛泽东所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①科学客观地认识中共党史人物的过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共党史人物的前提，其中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客观地分析中共党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不苛求于历史人物，但也要分清是非，指出其过错中的个人责任。所谓历史局限性，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党史研究》，1980（1）。



面：一是时代的局限性，就一个时代来说，任何个人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认识，都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及科学文化发展水平所规定的界限；二是阶级的局限性，任何个人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认识还不能超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及阶级地位所规定的界限；三是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局限性，除去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之外，任何个人的活动和认识又不能超出他个人有限的活动能力和认识能力的界限。因此，分析历史人物的过错，首先要从这三个方面去找原因。^①

首先，要指出时代环境对个人行为有着很强的规定性，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无法超出时代规定的限制。针对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社会发展，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②“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政治决策的影响。

其次，要对历史个人进行阶级分析，联系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利益诉求，解释其个人活动的阶级性。有学者曾对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依靠的阶级不同、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利益和政策目标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这两个党，政党的需要对他们个人发展的影响是首位的。蒋介石曾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也曾比较激进，但是他所依赖的政党对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还是也会服从于国民党的阶级需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要服务于其所在的阶级基础。而且对于蒋介石这样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宏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出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蒋介石

^① 参见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71～372页。

^② ③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7页。



和毛泽东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① 在分析一些历史人物时，找出其思想行为的阶级根源，一些较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再次，要实事求是地分清过错中的个人责任，指出个人认识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局限。对于陈独秀、瞿秋白等党史重要人物所犯的错误应该怎么看呢？很多学者已经指出，陈独秀的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而已。唐宝林认为：“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1923—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② 在充分利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新史料并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唐宝林认为鉴于莫斯科直接干涉中国革命，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两顶帽子不过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斯大林等人寻找替罪羊、为自己推卸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在当时的条件下，谁都不能不犯这样的错误，而且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一些主张还进行了抵制，如他1922年4月6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从一开始就反对进行党内合作，因为党内合作这样的方式最后必然导致激烈的冲突。当国共发生摩擦后，他又主张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国共破裂的事实，证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分析是十分深刻并有预见性的。现在，戴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帽子已经被摘掉，改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杨奎松认为应该进一步利用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妥协调退让的一些文件，全面否定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陈独秀的错误在于缺乏坚持真理的决心，缺乏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③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推卸责任而硬扣到陈独秀头上的。唐宝林坚持认为，在中国大革命中，没有“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有“联共（布）、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只是犯了执行这条路线的右倾错误。

今天，学界对于瞿秋白的认识，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瞿秋白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直到1927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一直是比较顺利发展的，一方面与他本人的勤奋努力有关，另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也有极大关系。可是，后来他被撤职，被开除出政治局，与他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犯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有

①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见《民国人物过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② 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载《历史研究》，2002（3）。

③ 参见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评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9（2）。



关，同时，也与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信任王明密切相关。^① 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主要责任人，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四、人物评价中的方法论争鸣

（一）“动机论”与“效果论”

动机与效果是反映人们实践活动中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范畴。动机属于主观范畴，指支配人们进行某种活动的主观愿望或意向，是人们活动的直接动因。效果属于客观范畴，反映人们按照一定的动机进行实践而产生的客观后果。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没有无动机的活动。无论人们做什么事情，其活动本身都内含着对某种效果、目的的期望和追求。每一个正常的人，其行为都要受动机的支配。但由于人类历史活动的复杂性，人们的动机与效果往往不相一致。实际上，从某种动机出发，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样一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就会出现一个难题：是侧重动机还是侧重效果？康德说：“如果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无情自然的苛待，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如果他竭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仍然还是一无所获，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当然不是个单纯的愿望，而是用尽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办法），它仍然如一颗宝石，自身就发射着耀眼的光芒，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②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康德是动机论最著名的代表，他主张，对一个行为的评价根据，只能是他的“善良意志”。边沁和密尔是功利主义思想家，也是效果论的最著名的代表，他们认为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的依据，只能看行为的结果，动机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既是非常复杂的，也是难以证明的。动机论，片面强调动机的作用，否认或忽视效果的重要性；效果论，片面强调效果的作用，否认或忽视动机的重要性。二者皆存在认识上的偏颇。

辩证地看，动机与效果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关系，动机是效果的行动指导，而效果是在一定动机的支配下，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达到的。动机的好坏及其效果的好坏，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最终的、客观的回答。在“事与愿违”的情况下，判断和评价历史人物要既看动机又看效果，把二者统一起来，做到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在以往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常常有“动机不纯”、“投机革命”等评价语言，单纯从动机出发去肯定或否定一个人，是不客观的。特别是所依据的“动机”都是“个人的表白”的时候，这样的

^① 参见谢毅：《论瞿秋白评价的合理性》，载《暨南学报》，1993（2）。

^②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评价会更加偏颇。在对瞿秋白的评价问题上，学界就曾经存在过这样的问题，经过大量的辨析考证，才得以恢复公正。

瞿秋白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他临终之际，却写下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著作《多余的话》，文中有“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历史的误会”、“怅然若失”和“一场噩梦”等语，令后来许多人无法理解。“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①对于瞿秋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这是否如同《多余的话》中所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陈铁健认为：“从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越。因此，当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上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肩负其领导工作显得力不从心。”^②这可谓是对瞿秋白“自我表白”的客观理解。但瞿秋白是一位死而未能盖棺论定的人。对瞿秋白的评价，持否定意见的大都是集中指向瞿秋白所犯的错误和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留下的口供和文字，尤其是他对自己一生做出总结的《多余的话》。自传性的遗书《多余的话》，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正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怯懦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名声”。他毫不掩饰、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头的压抑与矛盾和盘托出，暴露出真实的、没有丝毫虚假的自我，留待后人去品评是非。这份遗言最初发表在中统特务机构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许多同志读后对他产生了新的误解和曲解，甚至有人将其视作“叛变投降自白书”，从而又为瞿秋白的历史结论抹上了一道浓浓的阴影。经过学界多方考证，《多余的话》既非他人伪造，亦非“叛徒”的自白，而是他对自己思想深层的无情解剖。

八七会议是瞿秋白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其后就往下跌落，灾难接踵而至。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瞿秋白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和作了口头报告。在报告中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并对他自己所犯错误作了检查和自我批评。这时，共产国际再次强调，必须由工人身份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又与王明等人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所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出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瞿秋白只当选为政

①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陈铁健：《瞿秋白传》，30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9年秋天，苏共中央发动全国性的清党运动，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分子，米夫、王明趁机打击瞿秋白及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其他同志，指责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等。1930年6月，共产国际撤销了瞿秋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向忠发，但由于他文化水平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瞿秋白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之外，后来他转移到文艺战线，与鲁迅先生一起领导了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用自己大量的著作和译文，奠定了他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约稿，写过一些政论时评文章，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斗争》和《中国与世界》等刊物上。这些文章又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当瞿秋白表示不理解时，则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说他“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义的抵抗”。瞿秋白又只好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全盘承认了“错误”。后来，瞿秋白奉命被调遣到中央苏区去，后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

瞿秋白身后，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是天壤之别。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毛泽东起草的，评价瞿秋白说：“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毛泽东为瞿秋白做出了公正的评价。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挥毫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①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瞿秋白遗骨从福建

^① 参见《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但是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出版的第一套4册8卷《瞿秋白文集》中并没有刊登。1980年以后党中央批准搜集整理瞿秋白的文稿，在重新编辑包括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章时，才从中央档案馆里发现毛泽东的题词。经过中央批准，毛泽东的题词首次发表在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上。



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在革命战争年代，成百个中共优秀的高级干部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中央只决定迁葬瞿秋白一人到北京，由此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瞿秋白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但由于《多余的话》，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瞿秋白就被公开称为“叛徒”，一些党史教科书则把瞿秋白当做反面人物进行鞭笞，称瞿秋白完全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说他在1922年混入中共内部后，在八七会议上窃取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的职务，后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即向敌人屈膝投降，出卖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写下自首书《多余的话》，堕落为可耻的叛徒。这种从所谓的“动机”出发逆推人物行为而进行全盘否定的评价，是极其错误的。粉碎“四人帮”后，这种现象得以扭转。

从对瞿秋白评价上看，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效果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才能对客观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而作为主观意识的“动机”或“自我剖析”，是从属于效果的。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从效果出发，但也要顾及动机，从历史人物活动的时空联系中，揭示隐藏在历史人物活动背后的动机，二者结合考察，这样的评价才能更公允、合理。

（二）“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

如何看待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对此问题，不少史学家与哲学家都奉献了自己的才华。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部著作：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美国哲学家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这三部著作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人类中所谓英雄人物及其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卡莱尔认为：“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①他立论的根据是：

我们思索一下便会发现，任何时代只要能找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非常智慧和善良的人，它就不会走向毁灭。这个人有真实地洞察时代的需要之智慧，有领导它走上正确道路的勇气，从而使时代得到拯救。另外，我也把那些一般的慢慢吞吞的时代，即无信仰、苦恼、困惑的时代，具有倦怠的怀疑特点和混乱环境、无力地陷入最终灭亡的灾难之中的时代，比作一堆干柴，等待着来自天堂的火光点燃它。具有直接

^① [英]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1~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来自上帝之手的自由力量的伟人，就是这火光。他的话是所有人都能相信的济世良言。一旦人触动这时代，一切都围绕着他燃烧起像他一样的火。^①

卡莱尔所看到的历史只是一部英雄史，而英雄是一个个孤立的历史火炬的接传人。所以，卡莱尔认为“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②。卡莱尔把人类历史视为一部英雄史，把英雄视为历史的推动者，也就必然要主张英雄崇拜，他是英雄史观论者的代表人物。

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写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的核心论点是任何伟人都不能挾拔历史的表针，伟人的活动不过是历史必然过程中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伟人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在于这些人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能改变某些个别外貌、局部后果，但不能改变历史事变的一般方向。^③历史事变是在社会规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他指出，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人们差不多总是发生一种错觉，即把业已成为伟人的力量看成独一无二的力量。由于社会需要而使某一有才能的个人成为伟人后，社会组织就堵住了其余一切有才能的人的成功途径。于是，人们就把业已成为伟人的力量加以夸大，将其看成唯一的力量，把提出和支持了这一力量的全部社会力量统统归到他一个人名下。普列汉诺夫进而指出了伟人产生所需要的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时代的社会需要。第二，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有恰当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④他认为：“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杰出人物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其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到现实的门槛”^⑤。普列汉诺夫解释说：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伟人称呼为创始人（beginners）。这是极其适当的名称。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但这是一种莫

① [英]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20～21页。

② 同上书，21页。

③ 参见 [俄]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④ 参见上书，31～32页。

⑤ 同上书，33页。



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经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或者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所以他在这种场合移动他的表针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既不能把时间加速，也不能使时间倒退。^①

美国哲学家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中，以反对英雄史观、诘难社会决定论以及介乎这二者之间的折中观点来展开自己的思路。胡克认为研究英雄时应当注意“英雄活动的框架”。他认为，作为有文化的有机体，“人的智力不仅决定于他所具有的种种生物学上的机能，而且也决定于社会。因为正是社会给他建立起那个兴趣和注意的框架。也只有在这个框架之内，他才能发生怀疑和进行探索”^②。在此基础上，胡克提出了历史选择论，认为“当历史局势容许今后发展道路有重大选择的余地时，英雄人物的活动才会发生决定作用”^③。他相信“历史局势当中确实存在着可能加以选择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乃是英雄人物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④。而且“在这种局势之下，伟大人物的历史影响是个相对独立的因素，所谓独立是说独立于决定道路选择的各种条件，而且在这时节，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或预测）究竟哪一个可能的道路竟会得到实现这一点上，其他一切有关因素都只具次要意义。在这种局势下，我们也就能够说（而且能够提供这样说的事实根据）如果那位伟大人物没有降生的话，则事变进程在一切重要方面，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之下，都会完全改变方向。凡是否认对于处在这种局势下的伟大人物所起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这样评价的人，都得提供各种事实根据好来证明；事变进程在一切重要方面，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之下，都只有仍走老路”^⑤。胡克认为，历史上有着可加选择的发展道路，而且也正是这种可能导致相反结局的选择才有可能说明已然发生的事变过程和今后的事变过程并非只有此路一条。为了较清楚地说明问题，胡克提出了“事变创造性人物”这一概念，提出应把历史上行动方面的英雄人物和思想方面的英雄人物分开，把英雄行动的历史意义和在历史上的声望分开。他论道：“所谓历史上的英雄就是那样一个人：在决定某一问题或事件上，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样的影响归因于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行动，或者，他的行动不像实际那样的话，则这一问题或事件的种种后果将会完全两样。”^⑥从这一界定出发，胡克进一步区分了作为事变性人物的英雄和作为事变创造性人物的英雄。“所谓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这一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

① [俄]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38页。

② [美] 胡克：《历史中的英雄》，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③ 同上书，77页。

④ 同上书，81页。

⑤ 同上书，82~83页。

⑥ 同上书，109页。



位或情况所促成的。”^①“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都出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早先的事变方向已经给他们的活动准备下了可能的条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事变性人物的场合，条件的准备是在一个很高的阶段。为了做到那决定性的选择，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行动——一道命令、一个法案或一个常识上的决定。他也可能把他的任务‘错失’，或者被别人中途篡夺了去。但即使他没有失败的话，那也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特异的天才。他的功过是根据他的行动后果竟给人们带来幸福还是祸灾而断定的，而不是根据他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另一方面，那事变创造性人物虽然也一样在历史路线上找到了一个交叉点，但他却还可以说帮助创造了这个交叉点。他不但具有种种非常的天才，而且在实现他所选择的历史路线上，发挥了他的特异才能，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像恺撒、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等人物，至少也得从他们政敌的手中打开一条出路，而在这样做时，发挥了他们特异的领袖天才。正是那些作为事变创造性人物看待的英雄把他们的个性积极地烙印加盖在历史上面——直到他们从历史舞台上消逝后，这个烙印还依然明显可见。”^②显然，胡克既考虑到决定英雄存在的社会条件及其活动的具体局势，又考虑到英雄诞生的个人因素。他认为历史所提供的可能性程度的不同以及伟人素质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或为事变性人物或为事变创造性人物。

卡莱尔、普列汉诺夫、胡克对英雄的解释有着各自的模式。卡莱尔是“英雄造时势”论者，普列汉诺夫是“时势造英雄”论者。胡克兼收并蓄，但他仍未能将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在统一起来。

中国史家梁启超对时势与英雄的关系也发表过专论。他说：

或云英雄造时势，或云时势造英雄，此二语皆名言也。为前之说者曰：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故有路得然后有新教；有哥仑布然后有新洲；有华盛顿，然后有美国独立；有俾士麦然后有德国联邦。为后之说者曰：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人群之所渐渍积累、旁薄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于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而生于第十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纪即无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实例亦然。虽无歌白尼，地动之说终必行于世；虽无哥仑布，美洲新世界终必出现。余谓两说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③

① [美] 胡克：《历史中的英雄》，110页。

② 同上书，112页。

③ 梁启超：《自由书》，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340～34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这段论述十分精彩地分析了二者的关系。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对这个历史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梁启超谓“两说皆是也”，提出了一个“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的辩证命题。从时代条件对英雄的塑造来说，时势造英雄是无可疑置的。因为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①英雄的个人素质是时代所培养的，英雄活动的舞台是时代所提供的。但以上的分析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单是承认时势造英雄，并不能完整地解释英雄何以成为英雄的问题。梁启超的答案是：“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②这个答案该如何来看待？学界以往总是把它列为梁启超—英雄史观论者的主要证据。“英雄所以为英雄，就在于是他而不是别人具备了胜任某种伟大历史使命的特殊才能。他的才能使他能够凭借社会物质条件和人民群众、先进阶级的伟大力量，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满足社会的特殊需要，解决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改变现有的历史状况，把历史推向前进。从这一点上说，英雄是可以改变时势的。他改变了已有的时代条件，创造出新的时势。”^③所以，在讨论英雄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时势造英雄的一个方面，同时也要讲英雄改变时势的一面，这才是完整的理论。正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论：“一个伟人就是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又是它的推动者，既是历史力量的代表，同时又是这些力量的创造者。这些社会力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的思想。”^④梁启超对二者辩证关系的探讨现在看来还不过时。梁启超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辩证的命题，而且在此后所作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又对此进行了发挥。他把英雄人物分为两类：“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⑤并界定说：“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也；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⑥但“造时势之英雄”亦为时势所造就。时势创造了英雄，英雄又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时势，这是个辩证统一。因此，我们今天再来谈论这个命题时应多一点辩证思维。

综上，尽管英雄是伟大的，但英雄史观却是不可以接受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英雄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夸大。英雄的才能无论如何超群，他都不可能具备改变历史发展一般趋势的能力，他也无法去实现社会客观条件尚未提出的任务。但另一方面讲，社会需要提出了产生英雄人物的要求，至于谁来充当这个英雄人物，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因素。正如胡克所论，是由英雄个人自己的才能、品质、个性等生物属性诸方面来决定。“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未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33页。

② 梁启超：《英雄与时势》，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341页。

③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33页。

④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56~57页。

⑤⑥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481页。



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①显然这里既涉及了历史必然性与个人自觉活动的统一问题，也包含了主体选择以使自己的活动得以成功而不致失败的思想。正如邓小平评价毛泽东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②

（三）“正面人物论”与“反面人物论”

其实，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具备深厚内涵的学术概念，应属于政治标签。历史本来就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历史人物也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是简单的“正面”与“反面”两个词可以概括的。正面人物不是一切都好，反面人物也不是一切都不好。评价历史人物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好坏分明。而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了。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都是‘天才’，都是‘神童’，造反精神都很强，都是百分之百正确，而一旦被打倒，又全部皆非。这种写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③。因此，彭明反复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防止宣扬天才论、宿命论。特别是在评价正面人物时要注意这种倾向。”作为一位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多年的专家，他曾谈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

1948年，我那时作为华北大学的研究生跟随几位老师去东柏坡中宣部编审中学历史课本。当时肖三同志也在那里修改他的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一本书。他经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聊天。当时他说的一句话，使我很受启发，一直没有忘记。他说：毛主席告诫他，在写他本人的传记时，不要像国民党给孙中山写传那样。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1948年春，毛泽东从陕北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当时，晋察冀有一种小学课本，书中说毛泽东小时候就打菩萨，破除迷信。毛泽东看后对周恩来说：这个课本说的不是事实，我小时候不仅不打菩萨，反而为了母亲的病去拜过菩萨。进城以后，周恩来在1949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时，就讲到了这件事。他指出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他早年信奉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并说在一定时间内，“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

国民党是怎样写孙中山传记的呢？我记得小学课本上也有从小就打菩萨的事。1976年，李新同志叫我跟着几位同志到广东去帮助修改《孙中山年谱》，有机会读

① 《列宁选集》，3版，第1卷，2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99页。

③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见《彭明文存》，283页。



到了一些解放前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传记著作，才大开眼界，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天才论，宿命论。许多书都把孙中山描述为一个从小就具有革命思想的神童，许多书都从地理环境（翠亨村周围的风水）来解释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成长。^①

长期以来，我们在评价所谓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增添衍加效应：只要某人可判定为“正面人物”，那么就“为善者更增其善”，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没有任何的缺点；但当某人被判定为“反面人物”时，那么就“为恶者更添其恶”。正如彭明所质问：“我们历史地分析一些伟大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并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前进的，使这些人物更加可亲、可尊、可信、可学，这有什么不好呢？”^②对所谓的“反面人物”，更要反对“脸谱化”，即“先端出一顶定性的大帽子，然后在帽子下面塑造人物，引证材料。只要是反面人物，从一生下来就是坏蛋，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没有一点是处。甚至使用一些谩骂、讽刺、挖苦的词句，而不注意科学性”^③。因此，对“反面人物”的评价尤其值得讨论。

在所谓“反面人物”的评价中，切忌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偏概全。以往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流行着一种“逆推论”^④。某个人物只要后来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就把他说成生来就坏、一切皆坏，予以全盘否定；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被当做“反面人物”来评价。蒋介石集独裁、内战、卖国于一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把他说成是一个天生的坏胚，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反动透顶，这就割断了个人活动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只能使读者感到这是不真实的。辛亥革命前后，蒋介石与王金发等人追随陈其美，组织先锋敢死队，光复杭州，这应该说是顺应时代之潮流的，特别是在孙中山困守永丰舰的危难时刻，蒋介石来到其身边帮助策划军事，并护送孙中山脱险回到上海，从而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而成为其重要军事助手。如果简单地把这说成是投机，是难以说服人的。在当时，蒋介石这样做，应该说是效忠孙中山的表现，客观上也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后来蒋在帝国主义及其买办阶级的收买下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法西斯统治，才走上了与历史潮流相反的道路。近年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过《蒋介石日记》的杨天石提出，正确地评价蒋介石关系到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关系到国家统一大业，对于国家统一大业、中华民族和解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蒋介石的一生，热爱中华民族，希望中华民族振兴，尽可能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对英国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说明他不是英美的走狗，对

① 彭明：《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见《彭明文存》，290—291页。

② 同上书，291页。

③ 同上书，292页。

④ 夏宏根：《略论反面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载《求实》，1986（3）。



英美他有斗争，有抵制。蒋介石有大功两条：第一，领导北伐，初步统一了中国；第二，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大过两条：第一，1927—1937年，十年的清党剿共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1946—1949年，三年反共内战。杨天石说，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会常常迷失。某些人可能被某一类人捧为圣人，而被另一类人看成千古罪人。圣人和罪人都远离了本相。所以我们要寻找真实的蒋介石。^①

二是夸大错误，掩饰优点。对“反面人物”的一般认识上的错误加以夸大，而对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一些人物传记和历史读本往往隐而不显，略而不言，或者语焉不详。事实上，“反面人物”的演变有一个过程。像张国焘、王明、林彪这样的人，如何以历史的态度看待其变坏之前的言行，这是正确评价“反面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林彪晚年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但由于他走上这条道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在分析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行时，不宜简单地套用叛徒、卖国贼这个结论。林彪的阴谋活动主要是在1959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但如果因为他后来的言行抹杀他前期的贡献，是不尊重历史的。对于“反面历史人物”不同阶段的言行，应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而不应该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随意夸大错误就会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近年来，这种情况稍有改善。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军事博物馆挂上林彪的像，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正面效应。

（四）“阶段论”、“方面论”与“综合论”

历史人物的一生的活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复杂的，一生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很难论定。梁启超曾说过：“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②这是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的感慨，有些中共党史人物的复杂性不亚于此。1983年11月20日，王首道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讲如何评价党史人物时曾指出：“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写一个典型的、真实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人，而不是任意编造出一个人来，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

^① 参见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自序，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② 梁启超：《李鸿章》，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510～511页。



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①很多中共党史人物身上，往往表现出各种互相矛盾的现象。从纵的关系上讲，有些人可能有时间阶段上的变化，甚至在几年时间里，前后言行判若两人。从横的关系上讲，有些人又具有多重性。英雄与暴君聚于一人，才子与纨绔汇于一身的人物并不鲜见。对一些人生历程较复杂，盖棺难以定论的中共党史人物，我们就可以有多种评价体系，根据不同人物的具体情况，采取阶段论、方面论或综合论等方法论来进行评定。

阶段论，即分期评价法，就是根据历史人物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并结合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逐个阶段去评论他的功过是非。这也就是从纵的关系上去剖析与评价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人物一生活的全过程，弄清其思想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停留在某一点上，应根据其发展变化做出具体分析。如对林彪的评价就应分阶段来进行，不能因为其后期的错误而否定其前期的功劳。

方面论，即要从历史人物活动的各个不同领域指出他的贡献或过错。这是针对一些具有多重性的复杂历史人物而提出的方法论原则，仅仅使用阶段论的方法，从纵的关系上论述历史人物不可能揭示出所要评价的历史人物的全貌，而且往往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方面论者认为，在进行评价时应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联系，不能用事情的一个方面来概括其整个方面，也不能因多面性而忽略了主要方面，更不能一概而论，以点带面，以偏概全。

综合论，即主张全面衡量，将历史人物功过分出主次，对历史人物做出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的结论。综合论者认为，历史人物的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多面的完整体，仅仅采取阶段论或方面论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评价历史人物仅仅区分其前、中、后期，这不难，难就难在给予所评价的历史人物一个总的评价。这就需要把阶段论和方面论结合起来运用，然后再综合定论，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展示出历史人物的变化发展全貌。

五、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厘析

美国学者特里尔在写作《毛泽东传》时，指出：“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人类有着某些相似的特质和志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标准衡量人类的领袖人物。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他为他领导的人们带来了什么。”^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确立评价中共党史人物的标准呢？

以往，在人物评价中，曾出现过形形色色的评价标准，影响较大的有：阶级标准、当

^① 王首道：《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载《人民日报》，1983-12-09。

^② [美]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时当地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现代标准、道德标准、历史作用标准或历史进步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学界所反复讨论。

阶级标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阶级标准成为历史人物评价的一种主要标尺，表现为阶级立场、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学者大多认为，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的个人，个人的思想行动又是阶级利益的表现，因此我们不可能离开阶级来评价历史人物。但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之时，阶级标准甚至简化为贴阶级标签。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剥削阶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阶级标准和阶级观点日渐式微。

当时当地标准。即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考察，看他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有学者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对生产是起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对文化艺术是起提高作用还是摧毁作用？不能用要求现代人的标准来要求古人，也就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对历史人物，主要看他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假如评价不是从当时当地的人民利益出发，那么，历史人物可能会没有一个及格。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凡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在当时和后代会有不同的意见，什么看法才对？主要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① 这种标准的不妥之处甚多，的确如有些学者所论，当时当地的人们对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认识未必是正确的，而且多数人的看法未必正确，少数的意见未必错谬；有些历史人物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时当地未必能显示出来，倒是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才能逐步为人所认识。^②

人民利益标准。这种标准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标准与否，这种标准看上去十分科学，但实际上，却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人民利益标准这一提法，缺乏思想的明晰性。是人民的一时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是当时当地人民的利益，还是人民整体的利益；是加以历史界说的人民利益，还是抽象绝对的人民利益，这个标准并没有回答清楚。”^③

现代标准。这种标准以当代社会的各种需要去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以今日之是非标准去衡量古人之是非。这种标准与历史主义原则相违背，是不证自明的。虽然这种标准没有人会公然提倡，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时时闪现。

道德标准。许多学者都主张道德是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一，其中包括历史人物品质、气节。道德标准表面上看来大家容易接受，但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从道德人品的层面来评价历史人物，严格说来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导致研究者的情感倾向左右史实叙述，导致不客观。一旦对某些历史人物道德人品的观感极差，对其历

① 参见吴晗：《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载《新建设》，1961（1）。

② 参见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73页。

③ 同上书，375页。



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就会几乎完全负面。还有学者提出，如果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①气节和个性品格强调的是精神层面的因素，显然不宜单独作为一种标准来使用，只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

历史作用标准或历史进步标准。有学者提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②这种标准主张要看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以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为标准。因为人类社会在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中，首先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程。所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历史人物的言行或思想只要顺应这一必然趋势，推动社会的发展，就该肯定。反之，逆历史潮流，阻碍社会的发展，就该否定。这种标准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他们虽然表述不一，但基本观点一致，都是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以及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作为标准。如瞿林东认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关键在于，看他是否“加速”了还是“延缓”了，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③李振宏指出，分析任何历史事物，都必须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去认识其本质属性，从而肯定和支持一切推动历史上升和前进的动力。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应该是看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看他是否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可谓历史进步标准论。他还认为历史进步标准相较于其他的人物评价标准具有客观性、全面性、本质性、稳定性的特点，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一个评价人物的总的原则。^④但很多学者认为，历史进步标准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很难把握，因为“进步”本身有时需要辨析。如郑师渠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对历史的促进作用“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经中介产生影响，因而往往给史学家的判断造成困难和分歧”^⑤。的确，历史人物各种各样、千差万别，情况复杂，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具体的评价，单用一个正确标准去套是不够准确的。因此，要想做到既全面、又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必须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评价方法。但以历史人物的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为依据，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最终标准。

① 参见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13页。

②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3卷，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③ 参见瞿林东：《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载《湖北大学学报》，1997（2）。

④ 参见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76页。

⑤ 郑师渠：《近些年来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1）。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中共党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这将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对一些中共党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认识，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中共党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三章

新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第一节 心理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一、何谓心理史学方法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关注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内在动机，早在司马迁所在时代就开始了，只不过这种分析是依靠常识来进行的，易于出现以个人的心理去衡量别人心理的错误。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方法是指自觉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及影响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

综观人类历史，有影响的思想家认为，人类的行为受理性支配，但实际上，从历史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受非理性支配之处极多。但无论理性与非理性都与心理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是由许多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构成的，而行为是心理的实现。因此，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是深化史学研究必须考察的重要内容。社会心理^①是由特定时代、特定人群中个人的需要、意志、感情等心理状况汇集而成，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同时这种社会心理的特点又会在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两者互相依存。如果历史学家希望寻找心理动机和意识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就必须去认识在某个社会中，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日常生活的经历，他们对空间和时间、生与死、家庭关系和宗教活动持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念。普列汉诺夫对此论述道：“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

^① 本书所采用的社会心理、社会心态、时代精神、群体情绪、社会心智等概念指涉的都是同一个内涵。



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① 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或社会制度出现重大调整时，它的作用愈加明显。所以，正如梁启超所论：“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② 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相互作用制约着历史进程。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当地之社会心理基础之上。

从研究方法上看，心理史学方法涵括了心理学理论的诸多分支，如个性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职业心理学等。从目前中共党史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社会心理学理论借鉴颇多。社会心理学试图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存在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心理过程影响到他人和社会。所谓他人，不但指个体，而且指他人所构成的群体、社会、历史、文化等。所谓影响，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相互的过程，作为接受影响的主体，对影响具有建构和解释的能力，于是，社会环境就不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的环境，而是被主体建构过的环境。由此社会心理学可以揭示出个体心理与群体社会心理、微观与宏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学科角度。^③ 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亦指出：“心理学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领域是集体行为和反应的分析方法。”^④

从中西方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心理史学由于自身的局限受到了种种责难。甚至有学者称心理史学的失败之作远多于成功之作。^⑤ 20世纪是心理史学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奥地利、美国、法国是心理史学的三个重要阵地。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6）创立了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并把它应用到历史及文化问题上去。其代表性著作有《梦的解析》、《性学三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具有明显的泛性论倾向，它把本能理论从解释精神病扩展到解释一切人的行为，并把本能、欲望作为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原动力，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对人的行为所起的重大作用。美国史学界最早尝试应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是 P. 史密斯，他于 1913 年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以精神分析观点看路德的早期发展》一文。此后，埃里克森（Erik H. Erickson）著有《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等。巴恩斯于 1922 年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3 卷，272～273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第 7 册，4147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③ 参见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载《社会学研究》，2006（4）。

④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05～106 页。

⑤ 参见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见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12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论新史学》中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增添精神分析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深刻地说明了行为的不自觉动机，这是理解任何个人行为内幕根源所必需的”^①。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大力倡导历史学与心理学的融合。这些学者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历史人物方面有一定的建树。但是，由于心理史料的相对缺乏，导致理论与史实不能有效地结合，以致遭到了学界的猛烈抨击，认为“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最惊人的智力欺诈，是思想史上近乎于恐龙那样的绝代怪物，一个设计上根本不健全的、断子绝孙的庞然大物”^②。

但我们能否因为某些学者的失败之作就去排斥这一研究方法呢？对此问题，巴勒克拉夫断言：“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而且“历史学家现在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来使用心理学知识，不再把人的心理看作解释人类行为的始终一贯的、不变的、永恒的、固定的基础，而是看作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侧面，必须同这个历史背景下其他所有的侧面一样予以解释”^③。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向历史学家提供的与其说是新的技术手段，倒不如说是促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环境”^④。而且“无论研究哪个社会和哪个时期，历史学家都必须解释心理的紧张——稳定力量和变化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那种保证社会继续运转所必需的社会秩序的上层结构与作为社会成员的群众本能反应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它是历史的骨骼和血肉”^⑤。此论堪称切中肯綮！可以说，这才是道出了心理史学方法的真谛。把人的心理看做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侧面，心理史学的这种发展态势与研究视角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方法论利器。

二、心理史学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一）克服传统偏见，重视心理史学方法的运用

由于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主体的内心世界和潜在的无意识，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客观世界的歪曲甚至错误的反映。虽然这些反映的确在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历史的进程，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共党史研究注重对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习惯于从客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条件出发阐释问题，较少论及主观因素。因此，用研究主观世界的心理学理论来阐释中共党史研究所需要论证的客观必然性，其可信度受到怀疑。又加之，在以往对心理史学方法不绝于耳的质疑中，一个最突出的反映是：心理分析虽有助于历史

① 转引自 [美] 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2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② [美] 斯坦纳德：《退縮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2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③④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12页。

⑤ 同上书，107页。



研究,但存在着史料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是不存在着这一局限,但是相对而言,由于中共党史学的现实性,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某些共时状态使这种局限要少得多。与其他史学分支一样,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不外乎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回忆录、声像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比较特殊的是,由于现行档案制度的关系,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可查阅的档案文献不足以支撑相关的研究。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重视口述史料、回忆录、日记、信件等其他类型的史料,因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越性。而信件、日记是研究心理活动史料的重要来源。特别是政治人物的私人信件能够揭示出官方档案没有记载的心理活动。日记记载着一个人的心灵感受。写日记一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大多会写下作者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思考和主观上的反应。从这些记载中,我们更能揭示作者的性格和观点。特别是大多数作者并没有想到它们将会被史学家当做史料去用,因此,私信和日记最能揭示政治家深思熟虑的策略和下意识的观点。一些普通人的日记更能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因为这类史料的作者并不在乎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多记载了当时的内心思想活动。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一些日记和书信,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使我们能从历史的纵深处来窥见史实的真相。分析报纸的内容是研究一定时期社会心理动向的有效方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各省的省报等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报纸的内容受版面的限制,而每天发生的事件数不胜数。因此,报纸的编辑所选择的大多都是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事件,研究人们对一些事件的关注程度,可分析一定时期内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注意的轻重缓急,通过分析,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内人们的心理取向。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历史当事人的一些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等)、演讲稿等,通过考察其语义及用词来寻绎其个性与心理特征。如通过《多余的话》,我们可以窥测瞿秋白的性格特征:执著、正直、真诚和独立思考,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软弱。从《多余的话》和狱中诗词、书信中,既能看到他心灵的消沉悲观,也会看到其隐含的积极、坚定、乐观、反思的诗人兼哲人的气质与个性。《多余的话》中隐含的二元结构,与瞿秋白自谓是“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流露了困惑、消沉、无奈,乃至悲观的灰暗情绪;另一个是作为忠贞烈士的瞿秋白,在临刑之际唱《国际歌》,呼“共产主义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壮举。两个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二元的瞿秋白。^①

综上,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行为是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的行为,以研究人和人群为对象的心理学成果和心理史学方法可以用来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因此对中共党史及其历史人物进行心理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历史人物的性格、习惯、能力、素质、意志、欲望、情感、梦幻、观念(时间、金钱、性、死亡、魔鬼

^① 参见陈铁健:《再说〈多余的话〉》,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10)。



等)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等;研究人的无意识行为、自动行为、变态行为等;研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史事的心理原因和现象等。西方的中共党史研究一贯注重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但因意识形态、思维方法、史料来源等的不同存在许多的主观臆断成分。中国学者可以用严谨的研究态度和丰富的史料来深化党史研究中对心理史学方法的应用。中共党史人物复杂多样,要避免千人一面的简单化研究,引入心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是一个突破口,也可以把中共党史及其人物的研究提高到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整体性的水平。

(二) 运用心理史学方法推动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一定社会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与生产力、生产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社会心理有关。对社会心理、阶级心理、群体心理的研究,对于研究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变化,社会思潮的涨落、嬗变,有重要的作用及意义。我们可以考察心理状况对思想进程的影响、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关系、社会心理的承受量和决策人物的个性特征对社会改革的影响,等等。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可以进行心理研究的问题很多。如社会心理中的阶级心理、阶层心理、政党心理、民族心理、社团心理、干部心理、百姓心理、工人心理、农民心理、军人心理、学生心理、商人心理、私营业主心理、华侨心理,等等。社会心理氛围体现出人们共同活动相互影响的结果,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把人的心理看作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侧面,这一方法论原则在具体研究中要得到很好的贯彻,必须认识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众所周知,新中国几乎是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走过了成立后的近三十年历程。^①任何一场运动都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运动的发动者与拥护者的信念以及对运动结果的期望是运动形成和发展的依据。每场运动总是要经过其发生、展开、高潮、停息的过程,一方面,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往往也与一定的社会心理相联系。有学者曾深刻指出,社会心理作为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是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中介,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发展,有很大的影响。^②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更是表明,社会心理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影响又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变迁。

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新中国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在这一年曾发生多起骚乱事件。对这段历史的研

^① 据官方公布的统计,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间,仅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计有70多次,平均每年2.5次强,而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超出这个数字的10倍。参见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101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② 参见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究，我们在关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还要考察当时的社会心理。因为社会转型与新的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具有更复杂、更躁动、更迷茫、更活跃的特点，而且经常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因为制度变革在调整全社会利益格局过程中，给予各种利益群体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是各不相同的，或者有所赋予，或者有所剥夺，赋予或剥夺的多寡和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新中国成立头七年就是社会心理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还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洞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是中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变化，就无法说明在新政权刚刚建立、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怎么能产生出那么大的社会能量，取得那么大的社会效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也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推行，当时的社会心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与社会心理形成了强大的互动，使得原计划用15年来完成的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历史性变革在3年的时间内完成。

1957年到1966年为全面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而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出现了重大理论失误，也埋下了人为发动社会动乱的隐患。影响这一段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之梦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演绎，还须考察社会各阶层的意乱迷茫。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超前完成，大好形势产生的惯性驱动力，使得领导群体有高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心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而刚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广大民众，体会到了新旧制度的差别，他们一方面崇拜权威，另一方面急于求成的心理表现也非常突出，这在当时已成为全国上下各阶层、各地城乡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就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尽快地赶超英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精神上受束缚的被动状况。“就是这样一个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当有人振臂高呼‘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当人们相信只要拼命奋斗就可能在数年之内‘超英超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那么，‘大跃进’时期人们宁可砸锅卖铁，昼夜苦战，甚至‘真实地造假’，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不正是涂尔干（Durkheim）所精彩分析过的‘集体狂欢’（corrobbori）的社会景观吗？”^②就这样，领导群体的狂热心理与广大民众的快富速强的浮躁心理互相配合，合奏了一阵迷乱的狂想曲，使国民经济发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② 董延中：《试论关于晚年毛泽东的整体解读》，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6）。



生严重困难，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1966年到1976年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的心理因素。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以及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处理问题的心理定势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社会心理形成强大的互动因素，所以当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出现时，一些人响应了，各种“红卫兵”、“战斗队”等群众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全面展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引起群众组织的相互争吵、对立甚至武斗，造成社会大混乱。周恩来曾对毛泽东评价道：“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①学者萧延中认为：“所谓‘巨大人物’是指其对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种深远影响力的深厚基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情绪息息相关。”^②所以他主张从多种角度解读毛泽东，其中“心理动机”与“历史情境”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层面，因为“本质上，社会心智必受到集体记忆和历史情境的制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主观意志的随心所欲是不存在的”^③。历史从来都是由人们自己书写的，一个人的意志绝对不会支配历史。历史个人的意志只有在调动了群众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而对群众力量的发动也必须在历史个人的意志同群众的心态达到一定程度的暗合，才能得以成功。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大革命”可使我们更为透彻地明了这一段历史的多重面相。

1978年至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亦是重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一种表达，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心理时时处于流变之中。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心理变迁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的心理迷茫和躁动时期；80年代前期的心理憧憬和观望时期；80年代中后期的心理高涨和冲突时期；90年代以来的理性化时期。^④自70年代末起，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风俗、新习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有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心理的迷茫和躁动、憧憬与观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心理亦时时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对传统的眷恋和对变革的向往，对于一些社会变革在理性上的认同在情感上又难以接受，使得人们在心理取向上经常举棋不定，难以抉择，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都要经历一定时期的动荡。在社会转型时期，常常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现阶段突出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很多，但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键问题是决策者要洞悉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想什么、关心什么、希望什么，这些社情民意是与社会心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了解把握社会各阶

^①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见《周恩来选集》，上卷，331～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② ③ 萧延中：《试论关于晚年毛泽东的整体解读》，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6）。

^④ 参见刘崇熙、王铁：《大潮下的情感波动》，146～1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层心态，发现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热点，及时调整政策化解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疏导公众情绪，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关注点，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当下社会的着力点。

（三）运用心理史学方法分析鉴别中共党史史料

“心理学的理论对史料考订的过程做出了贡献。”^①这是英国史家彼得·伯克的认识。中国史家梁启超早就有过类似体会，而阐述更为深切：“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②所以他认为在史料的鉴别上进行一些心理分析是必要的，还曾对伪书制造者的作伪心理进行了分析，归纳为托古心理、邀赏心理、争胜心理、炫名心理等。^③在中共党史史料的处理中更应进行心理分析。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单就回忆录一项，可谓丰富至极。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以回忆录作者的身份性质来划分，大致可以分成这样两类，一是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二是非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现已出版的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较为丰富，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还有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以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等。非当事人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亦有部分出版，如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有关“大跃进”和“反右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等。显然，回忆录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这些回忆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实？对此类史料的考证工作，需要从多方面来进行，但考证作者的心理状态则是必经的一环。为此，马克·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④如果不能把握史料制作人的心理状态，虽遇真史料亦可能导出错误结论，曲解史料。薄一波有一段回忆颇能说明此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受排斥打击，而一些看风使舵的人物却受到提拔重用。这也就迫使一些同志不得不‘只磕头，不说话’，或‘只照报纸说套话’，或‘昧着良心说假话’，或发些违心之言。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这个话虽不能代表一般，但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⑤如果我们研究这

①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1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第7册，4125页。

③ 参见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5017～5021页。

④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8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29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一时期的历史，找到的也是当事人所记录的原始材料，如果径直使用，会不会出现这些“真史料”却记载“假问题”的结局呢？这样的史料在党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所以针对此种情况，我们还是用心理分析的手段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以后再大胆使用较为稳妥些。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对比、判断，准确地判明每件史料中哪些信息反映的是记载人在心理常态下所述的客观事实，哪些信息反映的是记载人不得已而述的虚假记录，然后取其当取，去其当去。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在加深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上确实能够起到其他理论和方法无法取代的作用，对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也已引起了学界一些学者的重视，在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上已经有了方法论的自觉。但就研究广度与深度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目前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对新中国重大政治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的探讨，特别是集中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还不多见。不可否认，现有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如开辟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获得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深化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一是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尚嫌笼统、粗疏。如对“大跃进”的研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运动的发动者与社会各阶层的心理也有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存有相似点，但也有不同点，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社会心理学的原理进一步加以研究。二是研究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展，没有普遍研究的问题更多，如火荒、瘟疫、战争、动乱等对人们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影响而产生的行为变迁，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三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存在着对原始资料的占有、挖掘还不太充分的状况。一方面应注意从精英人物的日记、书信、自传、年谱、著作等文献材料中挖掘整理出反映人物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素材，另一方面要通过田野调查，采集口述史料，体察风俗习惯，搜集一般民众的日记、书信等诸如此类能反映当时人们精神状态的史料，把心理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三、心理学方法的局限性

从心理学理论在当代中西方史学中的应用来看，心理分析方法的使用不当或滥用同样会给史学研究带来严重的损害，关键问题是我們如何有效地来使用它。

（一）心理学方法往往受制于心理学理论，使得心理分析易出现以理论模式去套史实的危险

如以卢西恩·派伊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用精神分析理论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分析，归纳出毛泽东的心理类型有仇父心理、父权欲望心理、恋母情结心理等。显然，这些分析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这是由于坚持某些极端的精神分析理论教条（如对童年经历的过分强调）所致。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不能机械地套用理论模式，而应将研究客体放在特定时代情景中加以考察，避免以主观臆测研究问题的局限性。正如费弗尔所指出，



“我们当代心理学家的心理学，不可能通用于过去的人，我们祖先的心理学也同样不可能笼统地应用于今天的人”^①，因为人们生存的一般条件以及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观念、心理、情感都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绝对不可以忽视时代、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别，当代心理学的理论不能简单推广到历史中去，也不具有普世的价值。我们应运用在心理史学上可以成立的理论，不能凭借个人的常识，以个人的心理去衡量别人的心理，以今人心理推测古人心理。

(二) 心理史学方法只是提供了观察历史的一种视角，不能指望用历史人物心理上的某一特征解释其一切行为，随意夸大历史人物心理状态的作用是错误的

巴勒克拉夫指出：“心理分析法也许有助于解释某个历史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但它解释不了事件本身。”^② 历史人物的行为还受阶级、宗教信仰、社会环境、个人特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历史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另外，在重视心理分析的同时，还要认识到不是所有的史事都可用心理史学方法来分析，因为“在心理学知识水平的当前阶段上，心理学能够为历史学作出的贡献仅限于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③，只能适用于历史人物、群体和部分历史现象的研究。如何克服以上局限性，科学地运用心理史学方法呢？我们可以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时，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要研究历史个人儿童时期的心理因素，也要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阶级、政党等对人物心理、行为的影响，还要研究各种因素对心理因素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也可以把心理史学方法和其他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结合起来，以克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如可以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心理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研究阶级、阶层心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和心理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经济心理、法制心理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心理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政党心理的研究等。

尽管心理史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心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现有的研究实践亦是深刻表明，用心理学的理论去分析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共党史发展的深层次的内涵，所以“历史学家不一定要做心理学家才可以利用心理学的发明或学说。这种发明和学说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贡献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的许多陈腐观点”^④。尤其是在史学研究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受到越来越激烈挑战的今天，心理史学大有用武之地。正如有学者所论：“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怀疑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有不同观点。就此而言，宣称能解释人类之中理性行为的心理分析理论就有了相当可以发挥的空间。心理史学以为人类行为往往要从其非理性之一方面可以解释完整，以往从理性上来解释人的行为，往往只是指出其中

① [法] 吕西安·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②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03页。

③ 同上书，111页。

④ [美] 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70页。



的一小部分而已。不论个人或群体，其许多行为要借心理分析工具才能有满意的解释，因此在未来心理史学要比从前更有前景。”^①

第二节 社会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一、何谓社会史学方法

社会史学大致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至少在三四十年代，曾一度辉煌，先后出现过不少颇具学术分量的著述，如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另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也有大量篇幅涉及社会史的内容。此外，在30年代还先后出版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的《社会史料丛编》四册和瞿宣颖所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3册，都对社会史研究起过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研究的课题相对冷落。在五六十年代初，仍有一些学者在有关婚姻、家庭、家族及其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董家遵的《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林乃桑的《中国古代的烹调 and 饮食——从烹调 and 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马起的《婚姻和家庭在历史上的演变》、陈直的《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等。另如吴晗的《灯下集》和《学习集》也收录了有关中国古代习俗、服饰这样的短文。及至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像上面列举的著述，在大陆也再难见到了。社会史研究处于一片荒漠。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是从1986年10月召开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开始的，主要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既是一种顺应学术潮流、对业经唤起研究热忱的学者们的支持和肯定，同时也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把社会史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此以后，《历史研究》等刊物与一些出版社纷纷组织稿子，推出研究成果。1992年9月，又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使学者们更有一个正规的定期讨论、互通信息的场所。自此以后，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学界对社会史的概念仍存在着认识上的多种分歧，就研究内容与范围而言，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广义的社会史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通史。就学科性质而言，有学者认为，社会史并非一种特殊的历史，而是在每一个史学分支当中都具有的一个方面；而更多的学者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相并列的独立学科。就目前学界研究状况而言，

^①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180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史主要是“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与风尚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直接表现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①。社会史研究范型主要有：一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以及基本社会制度。如家庭、家族、宗族，亲属制度，社会群体，社区，等等。二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外在现象。如饮食、服装、居住、行走、娱乐、风俗、巫术与宗教，等等。三是研究历史上基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如社会的分化和分层、社会人口流动、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等等。就此而言，社会史不是单纯考察某一社会现象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是侧重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活进行综合的研究。

关于如何研究社会史，苏联学者米罗诺夫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中提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解释历史资料，二是从一开始就借助社会学的全部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两者都能运用，可以相互结合。历史学应该借鉴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是研究当今的社会关系并侧重研究当今社会问题的。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关系，目的是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因与轨迹。这两个学科同是研究社会，但研究的框架、重点内容、方法都有所不同。社会史不是社会学史，也不是用社会学的框架去研究断代的社会史，但是可以吸取社会学中有益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照套社会学的体系，照搬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史，但在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史时，可以借鉴、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多元，是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而且比较重视统计资料、社会调查材料，而这是以往的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在社会史研究中应重视搜集、运用这些很能说明社会问题的材料。傅衣凌在《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文中谈道：“绝对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② 钱穆也认为：“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③ 社会史的研究，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采取多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简言之，社会史学方法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是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

^① 冯尔康：《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史专辑》，14页，1989。

^② 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文史哲》，1983（2）。

^③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不同学科的方法兼收并蓄，把社会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等研究手段真正地有机结合起来。

二、社会史学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近几年来，社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领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会史学方法的倡导下，历史学“不再是只有某些事实才有资格入选的领域，相反，表面看来没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举止，某家小饭店的菜单或者划分地亩的田契，一切都变成了历史……历史最终向一切语言开放了……也向十分丰富的多方面的现象和无数的事件开放了。某个年龄群体的人数的多少，某种婚姻法规，土地的结构，凡此种都成为历史的资料。多少世纪来不变动的事实同那些变动的因素一样值得检验”^①。历史研究的内容日趋丰富，研究视野日趋开阔。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也开始注意到社会史研究，有学者曾就如何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问题，阐述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并提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深化”。同时强调对于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包括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诸生活领域的反映”，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②。的确应该如此，因为“分析深刻的趋势，比分析表面变化更重要，研究集体行为比研究个人意志更重要，考察社会和经济的规范性比考察政府体制或决策更重要”^③。因此，社会史学方法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 社会史学方法注重社会结构、社会状况、社会生活、下层群众等方面，能够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

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首先就应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状况、特点及其变迁这个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只有研究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了解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诸方面的特点及变化，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中共党史研究可以借鉴社会史学方法来分析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状况，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深刻变动，某项方针政策的社会效果，等等。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共

^① F. 菲雷：《社会科学方法与“全面的历史”》，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8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1（1）。

^③ F. 菲雷：《社会科学方法与“全面的历史”》，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84页。



党史，可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历史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总体史或综合史。目前中共党史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的领域上去研究，使中共党史研究处于一个很有限的领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其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因而，我们除了要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外，还要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建设都是系统工程，而社会则是一个大系统，革命会引起社会大的变动，建设也会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变迁，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并具体分析革命和建设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推动，以便从一个相当的高度来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及教训，这无疑将大大拓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视野。

（二）社会史学方法能加深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发展，无疑都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多方面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要全面把握这些原因，就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具体分析。如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社会心理的原因，即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乃至反抗，对共产党的好感乃至拥护。过去对于“人心向背”这一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社会心理原因，只用一些笼统、模糊的话来概括，而没有具体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史的研究，分析社会上人们的心理，具体分析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国共两党的好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各阶级、阶层的具体态度如何；这种社会心理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等等。1946年11月，私立沪江大学进行过一次学生思想意识调查，参加调查的967名学生中，有490人认为中国不应同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协定，而主张同美国、苏联结盟的分别只有159人、16人；423人认为中国内战应绝对避免，表明这一时期大部分学生是主张不依附于任何大国，走独立自主道路以及反对内战的。而国民党当局对外依附美国，对内挑起内战，以致很快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的关系、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问题等各方面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这些方面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以加深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三）运用社会史学方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事社会调查

我们知道，社会史研究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社会史的每一专题的研究都需要从一个或几个具体微观区域入手，有很强的实证性。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实践中，研究者不仅能够特定的空间里“体验”历史，还能发现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原始资料。社会调查就是指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各种手段直接获取认识社会现象的各种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形成对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认识。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就是典范。毛泽东在调查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至今仍闪烁着熠熠光辉。第一是“眼睛向下”。毛泽东寻乌调查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



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高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这些各阶层的民众给了他“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①，因此他认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② 第二是“**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毛泽东认为，要真正了解社会情况，就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③。因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从个别开始，逐步扩大到一般，从大量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中总结概括出事物的一般本质，即从个别上升为一般。然后又以一般为指导，继续认识尚未研究过的个别，即从一般又到个别。如此循环往复，使认识不断深化”^④。为了弄清寻乌城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毛泽东非常巧妙地“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如盐、杂货、油、豆、酒、水货、药材、黄烟、伞、木器、豆腐等。由于进行了深入的解剖，毛泽东对寻乌城的工商业状况了如指掌，对于中国各地县级城市的状况就有了一般的了解。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农村调查时说：“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⑤

社会调查方法可从感性认识入手来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客观描述社会现象的一般状况、过程和特点，解释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与变化，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发展，在研究社会现象的基础上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在全面地考察社会状况之后才能检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与否。其中有效的办法就是考察社会真实情况，考察清楚当时的社会要求，评价历史事件。检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与否，也只有一个标准，即看其主张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是否符合社会实际要求。中共党史上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甚至现实中的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向社会请教，真正考察社会要求，就不难找出解决办法。近些年来在人民公社史研究方面取得的较大进展，很多学者就是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方式进行的。如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是一部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写成的学术专著。作者受到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的影响，以自己家乡——浙江海宁县联民村为基地。凭借乡村生活的感性体验、乡土档案与口述资料的广泛占有与学术训练基础上的理性把握，它不仅成功地描述了公社制度在一个普通农村社区内的发生、发展、衰亡乃至后续影响的全过程，而且还从理论上概括出解释公社史的“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

三、社会史学方法的局限性

当前社会史研究发展很快，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①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③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56页。

④ 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668～669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⑤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21页。



（一）研究领域日益细密化，给人以琐碎、繁杂的感觉

许多社会史学家喜欢选择典型个案进行研究，只局限于历史中的一个点，但点与面如何结合？以点能不能带面？这是学者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殊不知“特殊现象可能偶然有之，不是群像，在历史发展潮流中不占重要地位，若是过分注意他，反而迷惑读者，甚至也可能迷惑自己”^①。因此，通过个案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不宜“机械地”推广到一般中去，需要谨慎地思考和分析，以免犯以个别代替一般的错误。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论证的：任何从有限个案中归纳出的全称判断命题在性质上都不是已被证明的定理，而是可能被证伪的“有益的假说”。

（二）片面地排斥了政治史

有的社会史学家把社会史与政治史对立起来，要么研究社会史，要么研究政治史。实际上，政治史和社会史还是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往往要放到广泛的社会史范围内才能得到透彻的说明。把社会史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打通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畛域，进行政治社会史的研究，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克服当前社会史研究狭隘性的救弊之道。

第三节 口述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一、何谓口述史学方法

口述史学方法既是指史学家搜集和记录口述史料的方法，又是指史学家部分地或全部依据口头史料撰写历史著作的方法。口述史料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口述回忆，指人们回忆自己以前的经历和见闻的口述材料；二是口头传说，指那些以口碑形式流传了若干代的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

口述史学方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学方法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欧及世界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口述史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视作中外历史上悠久的口述传统的复归与重构，因为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现代口述史学方法的第一个倡导者是美国学者阿兰·内文斯（Alan Nevins，1890—1971）。1938年，内文斯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的前言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机构，它来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著名的美国人士的回忆。20世纪40年代中，在美国先后成立了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森林史协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美国早期的口述史学研究主要就是在这两大中心的主持下展开的。在美国的影响下，口述史学在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也

^①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2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发展起来。在中国，口述史学发展较缓慢，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批学者为了开展近代史研究围绕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进行过实地调查，搜集“口述资料”，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研究资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全国范围内的文史资料的搜集工作，也是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工作。当然，有些学者质疑这些工作不是专业的口述史学方法。这可谓是对“口述史学”概念的见仁见智。如果拘泥于“口述历史必须以录音为依据，是受访者与历史合作者的产物”，那么就狭隘地理解了这个方法。口述史学方法的最大作用是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者弥补其不足，而不在于是否使用了录音机。录音机、摄像机、计算机等高科技只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不使用这些工具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口述史料的搜集不符合国际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口述史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注重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与研究，与国外的口述史学机构接触频繁。很多学者开始投入到口述史学工作中来。

口述史学方法更多地表现为搜集口碑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著作，与中国现在流行的完全由别人执笔、以某人名义发表的回忆录不同，更多地保留了个人的特点和历史真实感。像唐德刚记录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就是这样的著作。还有个人自述性的口述著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已出版的有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汪文凤的《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三种；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要事口述史》；等等。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著作，特别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广大读者中也有较大影响。如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杨尚昆的《杨尚昆回忆录》以及苏维民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吴冷西的《十年论战》、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另外，还有专写一般群众和干部亲历亲闻的口述史，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就是以特定视角对历史的生动记录，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非非说周扬》，郑实、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艾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在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0年出版的《我的抗战》^①，源起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近些年对3500个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所作的采访节目，该节目耗资1.2亿元，谈起做口述历史的初衷，崔永元说是他2001年赴日本，了解到全中国搜集起的口述历史资料还不如早稻田一所大学，他深感中国对口述历史资料搜集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于是他自2002年起就开始呼吁这项工作，并组织该

^① 参见“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节目组：《我的抗战》，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节目，最后将采访文稿整理出版。当前，摆在中共党史学界面前的任务，是通过录音、录像等形式，尽快地将许多年事已高的老干部和各界重要人物的口述史料挽救下来，否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二、口述史学方法的实践细节

口述史料的价值，取决于受访者能否冷静客观地如实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和思想，还取决于访问者的能力和功力。

（一）拟订课题与计划，联络有关人物，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事先要做充分的“案头准备”：搜集和阅读大量的背景资料，熟悉对象的经历及其历史环境，使自己准备提出的问题有意义、有深度。一定要熟悉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如出生、籍贯、阅历、事功、社会关系、时事背景等。提前搞好“人际关系”，与受访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并使对方愿意敞开心扉，实话实说。“知识产权”的问题要明确，按照事先的约定，就著作权和使用权同受访者达成书面协议，以免版权纠纷。

（二）选择恰当的调查方式，掌握巧妙的采访艺术

访谈地点应该安静、不受外界干扰，让被访人心理上感觉熟悉而没有压力，一般安排访谈地点在对方家中较好，避免在公共场所进行。尽量利用录音机、录像机、照相机等科技手段。但录音必须解释清楚，征得对方同意，不得偷录。录像亦然。态度亲切坦诚、谦恭有礼。对任何人包括被访者的家人、孩子、保姆等都有适当的尊敬，能够同任何不同类型的人沟通。开场白要深思熟虑，给对方一个愉快而亲切的“第一印象”。应表明对方的经历很有价值，令人感兴趣，自己想帮助对方回忆和整理出来。从对方的健康状况、年龄、起居、家庭等“家常事”问候起比较好，一上来就急着提正题往往显得生硬、功利性太强。邵维正在谈到他为考证中共一大的情况访谈刘仁静时说：

对刘仁静的访问就很不容易了。当我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他在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我问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对此我冷静想了想，又觉得可以理解。刘老一生坎坷，几度磨难，对人对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对涉及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谨小慎微，这大概是他不愿开口的内在原因。我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我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思想上戒备少了，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我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他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他又说：“记不得了。”这难得开口的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我决心以此为突破口，追根溯源，举一反三。^①

^① 邵维正：《板凳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4）。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访谈技巧，要善于引导被访者说出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往事。首先尊重被访者，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对方的处境和立场，并应恰当地表示同情。当邵维正把查找到的有关刘仁静 1921 年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时的发言稿放在这位老人面前时，“刘老激动得两手发抖，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当时，他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也引发了许多回忆，话开始多起来。随后的几次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仅谈了建党前后的情况，还详细说起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到土耳其去见托洛茨基的过程，留下了不少难得的珍贵史料”^①。这就是比较成功的访谈。

在访谈过程中，提问应当明确而简要，表达要清晰，尽量用被访者熟悉的语言。插话更应注意简明扼要，因势利导。访谈不是对话，应让被访者多谈，甚至倾诉。不轻易插话，不要打断话题或以不同观点驳斥。如果一些当事人年纪很大，记忆肯定出现模糊，会出现几次访问前后的说法不一致的情况，这当然不能苛求，只能尽量提供一些情况启发当事人去回忆，温和恰当地指出忆述中的矛盾和时间错误，但不要当场与之辩论“是非”问题。不要喧宾夺主，自己大谈对背景的理解和对此事的看法。当被访者谈到痛苦和伤心之处时，要以同情和关怀的态度工作，插话要慎重，不要造成二度伤害。即使被访者谈走了题，或反复谈一件事情，都不要面露不耐烦或不屑于听的表情，更不能粗暴打断谈话。必须耐心倾听，在对方告一段落时再设法婉转地转移话题。如发现对方略过一些要事、要人、要点的时候，可以用虚心请教的态度问个明白，但发现对方实在不愿多讲，也不要强人所难。对于敏感问题，如重大历史秘密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仍须尊重被访者个人的权益，探问适可而止，不要强求。可以拐弯抹角地从不同角度引导对方道出实情，但对个人隐私，不要探问。

（三）树立科学的求实态度，及时整理记录访谈资料

访谈后，记录搁置久了易出差错。谈话往往是凌乱且不系统的，前后不连贯甚至有出入。把谈话内容转换成文字，花大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职官、器物或事物等方面的疑问，还要多方查证补充。还可以根据现场的观察对史料的真伪提出初步的判断。资料整理完毕后，写成初稿，送交当事人校订后，再写成定稿，送一份给当事人收存。

（四）运用口述资料

口述史学著作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口述资料汇编，不加史学家的评论。这种成果是否及何时可以公开或出版，须与当事人商定。二是运用口述史料于研究之中，把口述材料与史学家的评论合在一起，写成专著与论文。

三、口述史学方法的功用与局限

（一）口述史学方法的功用

（1）借鉴口述史学方法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找到新的视角，可以有力地促进中共党史

^① 邵维正：《板凳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4）。



研究。

口述史学是主张“自下而上地看历史”。口述史学方法在内容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军事斗争史、党的建设史和思想史等领域，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生平与思想研究。对于普通党员群众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下层民众对中共的认识的转变以及对其政策的反应，中共所领导的各项建设的社会运行等方面，则着力较少。中共党史研究，应该突出普通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反映等。目前，学界开始研究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历史、社会运动的历史，开始从社会的视角来观察历史，分析历史，所涉猎的不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有些学者不是专门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但这样的一种学术态势，恰好暗合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口述史学方法是一条重要途径。

(2) 口述史学作为创造史料的重要途径，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鲜明影响体现在对大量文献匮乏领域里的史料补充以及对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互证。

运用口述史学方法，可以为中共党史研究搜集必要的资料，使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更坚实。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其 90 多年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可谓命运多舛。有关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工作，要么是在转战各地的过程中将资料散失，要么由于一些客观条件差没有能力留下文献资料，要么是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而根本没有保存文献资料，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得大批档案被毁，很多问题的研究缺乏档案材料的支持。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 60 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是毛泽东此时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等。^① 口述史学方法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关史料的缺憾，使文献史料匮乏的某些领域的研究能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程中原撰写的《张闻天传》先后访谈 83 人。^② 从全书 1 271 条注释可见，大约 20% 的材料是从采访中获得的口述材料。他深深体会到，“离开了口述史料，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著作都是写不好的”。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料相对于党史本身的丰富程度来说是有限的。加之出于政治需要，或档案管理制度限制，文献资料不可能做到巨细无遗，也不太可能完全公开档案，至少目前不可能。而口述历史在重现过去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这种情况就迫使研究者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取材料。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上海市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长期合作，通过组织科研人员到上海各大工厂和商店调查、访问，召开座谈会，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为研究上海工运和共产党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准备了宝贵的素材。这段历史离现在还比较

① 参见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97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②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③ 程中原：《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载《扬州大学学报》，2005（2）。



近，当事人或目击者还有回忆的能力，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这样的“活历史”都将一去不复返。比如中国共产党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知青史、“文化大革命”史、改革史等重大历史题材，都是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很好选题。邵维正在回忆他考证中共一大的经过时说：

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而且身体欠佳，对他们访问带有抢救活资料的性质。访问包惠僧不算太困难，他当时任国务院参事，住在西便门机关宿舍，对来访者热情而健谈，虽然已是85岁高龄，但谈起往事滔滔不绝。我多次访问过他，交谈内容十分广泛，从他的青年时代、建党前后的活动直到晚年如何从澳门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数多了，他记住了我的名字，进入他的家门，包老就幽默地说：“老朋友又来了，今天谈什么话题？”我最后一次访问是在6月20日，当时他精神还挺好，不料12天以后，即1979年7月2日，他内脏血管突然破裂，来不及抢救，与世长辞了。对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访问收获不小，搜集到的有些内容直接用到了考证材料上，其中许多细节，增加了我对建党活动的感性知识。从访问包老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抢救活资料的重要。^①

现在中共党史研究就面临着抢救“活材料”的严峻性。早在七八十年前梁启超就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特别论述了现存之实迹及口碑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当代人应注意对现存史料之实迹及口碑史料的保存：“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②又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恍惚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③可以说，口述史料的整理和挖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比较重视的。1959年4月29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周恩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写自传，这一号召得到各级政协的响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史资料搜集项目，目的就是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所选资料大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到目前为止，已经搜集了150多辑、200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选辑。在这150多辑中，大多数是下层社

① 邵维正：《板凳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4）。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第7册，4107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4471~4472页。



会成员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现实、透视当时的社会心理、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价值。现在很多事件的口述人都不在了，展卷研读这些人的口述，更是深感材料的珍贵。这些材料现在已经进入国内外研究者的视野，通过解读他们当时独特的话语系统，使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两方面得到印证和解释。

曾有外国学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四史运动”的开展就是把普通人民的经验纳入历史和写出更接近于大众的历史著作的目标的一个体现，抢救了一批“活材料”。“60年代初的‘四史运动’就是这种要求的一种产物。……‘四史’是指家史、村史、公社史和企业史（厂史），这‘四史’是由经历过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回忆和观点写成的，使用了60年代也在美国流行的类推法。这‘四史’是群众规模的口述历史，其目的在于教育没有直接经历过革命的青壮一代，在于揭示历史上专为专业历史学忽视的、通过常规方法不能证明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和在美国的史学中一样，职业历史学家对这类历史不屑一顾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60年代的‘四史运动’收集了大量人民经历的资料。如果历史学没有‘革命’，历史学家就可能永远丧失这些资料，他们总有一天会明智地利用这些数据资料的。”^①抢救“活材料”的工作实质上是在与时间赛跑。很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年事已高，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正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人类的遗忘本能更是警醒着我们从事口述史料整理与挖掘工作的紧迫性。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也已是人到中年，随着时间的逝去，他们的记忆会变得模糊。现已出版的一些口述史著作大多出于抢救“活材料”的紧迫感。《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一书的作者汪文风已是76岁高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这本书。作为当年“童怀周”小组成员，亲历了“天安门事件”，他的回忆对于我们了解“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童怀周”小组的情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作者还参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与汪文风一起参加过“两案”审理工作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曹瑛生前曾对他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四人帮’这段历史写出来。否则，你就辜负了党、人民、中央纪委对你的培养。”^②尽管曹瑛与汪文风不是历史学家，但为人民存史，让后人了解历史真相的使命感使他们对历史心存敬畏，也意识到一种责任。如同《“大跃进”亲历记》的作者李锐所说：“如实录出这一段历史，于后世自有鉴戒的意义。自己已是望八之人，来日无多，确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赶快实现这个夙愿。”^③这些共和国要事的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更是补史证史的宝贵材料，趁着他们还健在，中共党史研究者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挖掘这些“活材料”，最大限度地弥补文本资料的不足。

①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46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② 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前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③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1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文件与档案是中共党史史料的主要来源。但档案本身的情况又是复杂的，有些需要用口述材料互证才能使用。原始档案对党史研究非常重要，但也要具体分析。尽管文献档案一旦形成，它便是客观的了，但文献史料中的主体意识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献档案都不可避免地留下其最初记录者和编订者的个人印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档案所反映的真实程度，这是无意中造成的失误，对此不应求全责备。略过此点不讲，还有一些属于个人刻意所为，即使一些官方会议记录也会存在不实之处。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都发现：由于某些高级官员害怕后世学者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有时所做记录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档案的情况可谓复杂。而中共党史研究者所面临的档案更为复杂。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在档案材料里，不实记录比比皆是。很多运动中的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于自愿，有些时候是迫于无奈，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常常有人伪造历史材料，以颠倒黑白。如记载刘少奇惨死的一些资料，很多都是伪造的。对于此种情形，人们的记忆要比文献更为确切。

所以我们要重视档案，但不能迷信档案，不要认为档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这点上，我们要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广泛运用。在考证一些“问题”档案材料时，一是尽可能多地找到文献材料进行互证，在实在缺乏文献记录的情况下，如果能查访到事件的当事人，对他进行口述访谈去查对将是一条最佳途径。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详细的口述调查，把所得材料与档案记录作一比照，一些历史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王国维考证材料时，使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互证。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讲，没有考古材料的互证，因为一切都离当下不远。对文献中的复杂情况，我们通常只能采用陈垣的“校法四例”。但是随着口述史学的兴起，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新二重证据法”，即口述材料与文献材料的互证。“当代社会史的一些理论认为，口述史的作用同样不亚于出土文物，同样可以用来与传世文献互证。”^①通过口述史学方法，发现并矫正文献记载的讹误，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学者沈志华对档案非常重视，可以说视之为食粮。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一万多件俄国解密档案。但他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曾有这样的体会：“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帮助研究者起到解读文件的作用。”^②他在研读档案时经常碰到这类的情况，如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苏联档案中的记录非常简单，只有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强加于人”，“在形式上有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等。还有一些记录让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

① 胡鸿保、定宜庄：《口述与文献的融通：满族史研究新体验》，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3）。

② 沈志华：《静下心来读档案 踏踏实实做学问》，载《历史研究》，2004（4）。



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面对这样的档案材料，如果没有别的历史材料互证的话，研究就很难进行下去。最后他还是借助了参加会议时的翻译师哲的回忆录，还有其他一些材料，才全面了解了刘少奇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对苏联进行批评的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波兰所持的态度。重视档案，但不盲信档案，对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都要搜求不同的时间和各个方面的材料加以求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他研究朝鲜战争的一部重要著作，就是综合可资利用的最新的多国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写成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回忆，能够揭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极有价值的真实细节。对于那些没有档案记载或记载不明的历史活动，这些当事人或其亲属的回忆应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3) 口述史学方法对普通民众的研究可以增强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从而有助于历史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实现。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学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具有了日益突出的地位，成为促进民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有力工具。

中共党史研究在这个方面更是重任在肩。由于中共党史就是这么一个直至现在的历史，在它延续期间发生的一些历史大事，仍然直接地、非常有力地规定或影响我们当下的大环境和我们社会当下的生存方式。“通过当代史总结出来的这些看法，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是最容易为当代人接受的匡正生活的参照系。”^① 面对着这个巨大的时代需求，中共党史研究者更应自觉地去适应广大民众的需要。但如果做一份详细的市场调查，就会发现广大民众所手不释卷的是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各种文学纪实作品。诚然，这些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但是，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是靠传闻，靠虚构和想象，编排一些史实来误导读者，而一些严肃的学术性强的中共党史著作却难以进入市场为读者接受。依靠文献史料著成的史著大多是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而口述史学的观点认为群众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主张与历史创造者直接接触，“从下而上看历史”，从而使历史研究向社会完全开放，又完全以社会为基础。口述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各类群体的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作为历史的原始资料来利用，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让当事人说话，让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用自己语言叙述历史。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史可以使普通人的言语——例如他们的叙事技巧——首次得到真正的理解。不论是课题工作，还是把直接引语变成书面历史的工作，口述史学家能够做到最重要的社会贡献，就是让普通人树立对自己言语的信心。^② 口述史学把人民创造的历史还给了人民，使参与口述历史项目的民众得以重塑自信与自尊。

另外，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有一种感情上的互动。“和通常史

① 李良玉：《进一步重视和推动对当代史的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5）。

② 参见[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学家与冷冰冰的文献所进行的交流不同的是，它能够调动语言、感情、动作，更准确地提供当时当地的氛围。”^① 口述史著作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叙述形式：形象、生动和相对真实。被访者不仅述说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大量具体、丰富的历史细节，还告诉读者更多的他们对此事的感受与认识，被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都不能不在读者的心中卷起涟漪，冷知识被一种“温热的感触”慢慢地融化了，使得读者的阅读变得像解代数习题一样，很容易就能把自己作为一个未知数代入到那段扑朔迷离的乱世纷争之中，或为当事人，或为旁观者，获得一种人生的新体验，能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成为指导自己如何生活的一种因素。

所以说，口述史学的叙述形式适应了广大民众的需要，也便利了史学家们写出形象化的历史。中共党史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启迪民众的社会功能，口述史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口述史学的出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顺应了中共党史变革的方向。寻求二者的最佳结合途径能使二者相得益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

（二）口述史学方法的局限性

口述史学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由于这一方法是建立在人们对以往情况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回忆的情况往往是难以保证准确的，这里既有因年代久远，记忆不清而出现的失实，也有回忆者因自己的立场、观点所导致的偏颇。德国学者曼海姆指出，生活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相同历史事件的人们，因所处年龄段的不同会对时代有不同的体验、感受和记忆。由此，现实中每一时刻就不再是同一时刻，而是具有不止一个侧面的立体时间（a temporal volume），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代、不同的年龄组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体验了这一时刻。这就是所谓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②，人的记忆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同一年龄段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记忆。如“文化大革命”记忆，在“大院里的孩子”看来，那或许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可对于“黑五类”及其“狗崽子”来说，那是使他们“至今犹丧魂落魄”的岁月。不能说这二者谁的叙述是真相，而谁在说谎，他们只是说出了对于自己而言的事实。这些也还不是事实的全部。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观和听的。如果不加分析地将口述材料运用于历史著作，那将导致历史著作与历史事实的背离，口述史学方法的优势、功用均将无从谈起。

第四节 比较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一、何谓比较史学方法

在当代西方史学论著中，“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与“历史比较研究”

^① 定宜庄：《关于〈最后的记忆〉一书的说明》，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② 参见[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 两个概念经常互换使用,不加区分。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不同内涵的。历史比较研究,应是指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对各种历史现象的异同及其原因进行实证的比较研究的实践。比较史学应是指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史学方法指的是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比较史学≠史学比较。史学比较主要是对史家、史著、史学思想、史学流派等史学现象的比较。如学界习惯于把彭明(1924—2008)的《五四运动史》与美国学者周策纵(1916—2007)的《五四运动史》进行比较。周策纵比彭明年长8岁,属于同一时代的学者。彭明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从事五四运动专题研究,而周策纵也同时开始五四运动的研究,并在1960年出版了英文版。从时间上说,彭明与周策纵是在同时期从事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但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学术语境,决定了二者史观与研究视角的差别,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学术认识。二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通过二者的比较,一方面可以深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可以审视彭明与周策纵五四研究的成就与各自的特点。史学比较属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比较研究的具体实践。

比较史学方法是一种古老又很有前途的研究方法。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1886—1944)被誉为“比较史学之父”,在其著作如《比较史学之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1928年)、《法国农村史》(1931年)、《封建社会》(1940年)大量地使用了比较史学方法。巴勒克拉夫指出:“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布洛赫的教导和他做出的榜样。”^①并对比较史学的前景作出预言:“如果我们把比较史学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恐怕没有什么过错。比较史学看来正在愈益引起新一代更加进步和更加勤奋的历史学家的注意。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前景,许多历史学家才充分相信历史学有机会为人类社会的研究作出真正的贡献,为社会科学增添一个不可缺少的新领域。”^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很重视比较研究方法,认为它是理解各种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提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③

比较于史学是自然内在地,自然到呼吸之于生命一样。比较贯穿于史学的全部过程,无论你选择什么题目,都逃脱不了比较。因为选择史料需要比较,历史叙述本身就是比较,而历史评价更是比较的结果。史学中的比较是必然的,绝不是你在做中外、古今等时空大跨度的研究时才需要比较。凡史学家使用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发展与变迁,甚至强弱、高低、多少等词汇之处,都是在比较。没有比较的史学是无法想象的。比较是最自然的,但却不是最简单的,相反,却是最见史学功力的。常见的比较大多是将现象分类堆砌,而没有透视出其本质。这样的比较再细致也意义不大。有影响的或有启发性的经典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70页。

② 同上书,2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著作大多是比较性的，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安德森的《从古代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等都是比较史学的典型。史学名著中的比较案例是作者功力深厚和知识丰富的一种自然流露，成功的比较一定要熟悉至少两个以上的研究领域或对象，这不是初学者类比模仿可以轻易达到的。

二、比较史学方法的实践细节

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差异性和同一性，这成为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而要认识任何事物，都必须把它和其他事物进行比较，才能真正认清这一事物的特点、特性、特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可以对中共党史不同时期的某一方面，同一时期的不同部分，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党派、人物及事件等，加以比较。比较史学方法可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广泛地加以运用，通过比较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产生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中共党史研究中常用的比较方法的形式

1. 横向比较

时间上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如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比较，中共党史与越共党史比较等，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中国国内的横向比较，如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史、中共党史与民主党派史比较等。可以通过横向比较研究找到特点、规律，也可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期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具有可比性的都可以进行比较，如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比较，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比较。

2. 纵向比较

一般是同一事物不同时间发展阶段的比较。如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比较。社会主义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共党史比较，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共党史比较。民主革命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共党史比较，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比较。纵向比较可以找出历史发展规律，可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二）比较研究方法运用的步骤

1. 比较研究要合理选择可比对象

合理选择比较对象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而确定比较对象的依据就在于其可比性，具备比较的基础。一般来说，比较对象之间既要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相似性，又必须存在一定的差异或分歧，如此才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和空间。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政策与政策等是可比的。如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国外学者曾用“航海家”与“水手长”、“理论家”与“实行家”等来形容他们二人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生活在相同的历史环境，面临相同的历史任务，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是政治上



的长期合作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文化背景、生活阅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的差异。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既有共性与相通之处，也有个性和差异之处，具备可比的基础。因此有学者曾作有《毛泽东与周恩来》。^①

2. 比较研究要科学界定研究主题

任何研究，都有其研究目的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研究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某些规律、说明某些问题或解释某些现象，没有研究目的或研究主题的比较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将毛泽东、周恩来进行比较，能够说明的问题或解释的现象较多：如通过二人的比较，可反映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性和差异、合作与分歧，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出现曲折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稳固的内在原因；通过二人的比较，可展示毛泽东、周恩来各自的理论智慧、相互关系，由此揭示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情形；通过二人的比较，可显现毛泽东、周恩来文化背景、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的差异，从而说明二人处世风格、思维方式、角色担当各有所长的原因。

3. 比较研究要科学确定可比内容

对比较对象的双方或几方，分别进行深入研究，找出异同，找出“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要揭示比较对象的共性与差异，必须通过具体内容来说明，比较内容的选择和比较范畴的确定实际上决定了比较的效果。一般而言，比较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舍弃许多细节或场景，择其最能反映研究主题的内容来说明。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书，选择了最能反映毛泽东和周恩来风格、思想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方面来比较，如政治风格、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军事思想等，每一方面单列专题，如此建构了全书的总体框架。在确定比较的具体内容时，作者又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和限定。譬如，政治思想是一个蕴涵甚广的概念，作者对毛泽东、周恩来政治思想的比较，仅选择了“革命道路论”、“政治策略论”、“反倾向斗争论”、“政治民主论”、“政治自由论”、“政治管理论”、“政治发展论”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比较，舍弃了其他相关政治思想的内容。作者强调，这种专题性比较，绝不是将毛泽东、周恩来放在同等地位的“二元比较”，而是出于理论研究逻辑性和清晰性的考虑。由于比较的内容界定准确、清晰，研究也就较为集中，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稳妥、可靠。

4. 比较研究要揭示比较对象共性或差异形成的缘由

比较研究不能满足于事实的呈现或资料的排比，而要透过现象揭示其中蕴涵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启迪。在对毛泽东、周恩来进行比较之前，作者说明了其家族背景的不同、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契合和哲学传统素养的差异，这既为二人的比较研究进行了铺垫，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人共性和差异形成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的

^① 参见胡长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共同信仰及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共同的社会责任感、文化心理、求真精神，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存在共性的重要基础。作者提出，韶山毛氏家族的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而绍兴周氏家族则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前者的“武略之美”与后者的“文事之美”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塑造了二人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同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学问与事功的结合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与毛泽东相比，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是道家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这些分析，就从家族背景和传统人生哲学影响的侧面，揭示了二人差异形成的深层原因。除此之外，作者还强调，毛泽东、周恩来思想上的一些差异，与性格、经历、知识结构有关，也与他们承担的角色和工作分工不同有关。

5. 比较研究需要作出一些基本结论或将比较结果进行提炼与升华

比较研究不仅要揭示比较对象之间的共性、差异及其缘由，而且需要做出一些总结性、概括性的基本结论，将比较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书的作者，经过比较研究，形成了不少基本的认识和判断。如作者提出，就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来说，周恩来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比毛泽东稍有逊色，但周恩来在诸多领域和方面补充、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这些结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勾勒了二人关系的全貌。

三、比较史学方法的功用与局限

（一）比较史学方法的功用

1. 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看清各种历史现象的特征和异同，使认识更加深刻

各种历史现象的差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显示出来。如同样是研究五四运动，彭明在内容安排与研究宗旨上与周策纵是不一样的。彭明首先分析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思想条件，其次详述五四运动的历史过程，最后阐释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与意义，解释了中国革命史上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它怎样引起了中国革命的转变以及由此对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而周策纵主要是分析中国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源，回答出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样的问题。其著作也在于通过具体史实来解释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转变中的重要事件，五四运动的发生主要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在论著中，他重点分析了外国因素的影响。相异的研究视角和立足点使得彭明与周策纵的五四研究鲜明地体现出不同的学术特色与成就。

2. 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历史比较方法有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等多种类型，研究者可以



冲破传统的历史编撰学的年代序列及其严格的地域、国界限制,将看上去似乎没有丝毫联系的历史现象,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对照,从而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观点。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新中国成立的论述就是放在世界范围内来比较认识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1949年10月1日的确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日子。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绝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①又如,有学者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与美国的西进运动作比较,认为美国的西进运动使美国产生了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强大和团结的国家;同样,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修建铁路、开发西部资源、加快西部发展步伐,使其接近于东部的发展水平,这是中国在21世纪崛起的关键,但是这一计划的缺点是中国西部没有美国那样的西部海洋,不过可以通过修建跨越内陆的大铁路干线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连接起来,还可以建设通信网络与外部连接。再如中印比较研究。2000年印度社会科学院和马奈克出版公司出版了由阿米达·昆都编辑的《中国与印度的不平等、人员流动和城市化比较研究》一书,就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除了在软件业方面比中国有优势之外,其他方面都与中国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贫富差距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总之,由于比较总是从某种观点出发,带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因此,比较史学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有效研究方法,是一种容易发现问题的研究方法,不作比较研究,往往不易发现问题。毛泽东1942年就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进行“古今”、“中外”的比较,称之为“古今中外法”。

3. 比较研究是撰写世界史的过程与方法

台湾学者杜维运认为:“充分采用比较方法,透过比较,将割裂的世界,变成一个融合的世界,将相去绝远的,使其距离相近,于是比较历史为世界史能否写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谈比较历史,谈世界史是空洞的。”^②他指出:“在世界和地区独立发展其历史或彼此交通未臻频繁时,唯有靠比较才能使其息息相通。”^③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唯有靠比较才能有希望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历史比较研究相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这是因为,随着旧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出现,还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推进,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互相之间的互利合作和利益冲突也空前增多,由此激起了相互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正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比较法被视为历史学国际化的主要方法。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② ③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42页。



（二）比较史学方法的局限

1. 历史观和理论体系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比较研究的内容和结论的正确与否

同样的历史比较，不同历史观影响下的主体可以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必亡”与“战必胜”的分歧，都是进行历史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2. 比较研究的对象必须具有历史可比性，没有历史可比性的事物无法进行比较

布洛赫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①因此，进行比较研究需要的基本条件为“被观察事物的某种相似”与“产生这些事物的环境之间的某种不同”^②。

3. 历史比较研究只是研究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须和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结合起来

比较研究方法既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历史研究中唯一科学的方法，不能将它绝对化、孤立化，把它和其他方法割裂开来。历史研究中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越多地与其他科学方法相结合，它的积极作用就能越多地发挥。反之，发挥积极作用就少，甚至还会产生消极作用。

4. 比较研究要不断深入，不要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要注重整体比较

两个事物、几个事物进行某一方面的比较，可能会产生片面性，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就可以克服片面性。两个事物、几个事物进行一次比较，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疏忽、失误，进行多次比较，就可以防止、纠正疏忽与失误。进行多方面、多次，甚至多方案比较，总会产生最佳的结论，从而使研究尽可能的正确、科学。要注重本质的比较。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这是最深层次的研究。研究现象，是表面、浮浅的研究。只看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名称的区别、人数的区别，算不上历史学家，能看到共产党、国民党本质的区别，才可以算入了历史学家的门。定量比较一定要向定性比较发展，才能真正发挥比较研究的积极作用。要注重经验教训的总结。任何研究只停留在就事论事上，它的价值、意义就大打折扣，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在各种形式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不能就此止步，而应“乘胜追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出经验教训。这样，才真正实现了比较研究的价值，使历史研究有益于社会。在比较研究中，往往会将一个整体拆散成许多部分，进行个案比较，在个案比较完成后，忘记了整体的比较，致使个案研究的结论上升不到整体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所以要注重整体比较研究，即使将整体拆散成个案进行比较，也要在个案比较完成以后再集合起来进行整体比较，形成有全局意义的整体比较的结论，使研究更全面深入。

^{①②} 马克·布洛赫：《比较史学之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见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10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第五节 计量史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

一、何谓计量史学方法

把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和数学应用到历史学领域，通过处理资料 and 制作数理模型等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称之为“计量史学”，也称定量史学、数量史学、历史计量学等。在西方著述中往往被称为 Quantitative Method of History 或 Clinometric。计量史学方法，从实质上说，是数学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产物。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一些数字的统计，通过记载数字说明问题，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等史书中都记载了一些统计数字。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文献中也有关于土地、人口等的统计数字。但这些统计和统计数字，只是历史研究的附属物、附属手段，还没有被当做独立的研究方法。至于认识到要将统计作为历史研究重要的方法，那是近代的事了。1922年1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作了《历史统计学》的讲演，提出了“历史统计学”的概念。他这样来定义：“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①而且又进一步说明：“严格地说，应该名为‘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②虽然他说“这个名称，是我和几位朋友杜撰的”，但他也确信历史统计学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好方法，而且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我们中国的史学家做这件事，便宜极了。因为我们纸片上的史料是丰富不过的。一切别史、杂史、文集、笔记之类且不必说，就以一部二十四史而论，真算得文献宝藏。就学校里头学历史的学生看，固然恨它‘浩如烟海’，就我们专门做史学的人看，真不能不感谢我们先辈给我们留下这大份遗产。人们只要肯在里头爬梳，什么宝贝都可以发见出来。”^③梁启超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之精髓而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是中国本土较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他所提倡的历史统计学，也就是今天计量史学的先行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数学方法迅速渗透到各门学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门学科提出了定量化、精确化的要求。计量史学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作为完整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派开始形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量史学已成为最具国际性的史学流派，在人口史、社会史、经济史和选举史等领域中甚至已成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巴勒克拉夫指出：“对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区别20世纪70年代和30年代对待历史研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④计量史学的出现代表了现代历史学不断走向

① ② ③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见《梁启超全集》，第7册，4045页。

④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39页。



科学化而努力。相比中国大陆地区，港台地区接受计量史学比较早，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80年代，大陆部分史学家认为，数学在史学中的运用是历史科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开始对计量史学方法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如认为没有数量关系的人口统计是荒谬的，研究社会问题——就业、移民、职业、地位等，要进行计量分析。但计量史学真正地为中国史学界认可还是90年代的事情，不过还没有形成计量史学的学者群。但计量史学前景良好，因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一代新人闯入了所谓的‘人文科学’领域，这一代人在知识装备上受到自然科学和科学世界观的影响，要比他们的前辈深刻得多”^①。

二、计量史学方法的实践细节

（一）搜集整理资料

全面搜集资料，按一定的顺序分类，然后放入数据库中。用计量方法处理的资料可以是本身就是用数字表示的资料，如人口记录、公私账簿等；也可以不是用数字表示的资料，但史家可将它们整理成系列而用于计量处理，如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在进行资料分类处理时，一般将数据区分为：（1）定名资料，即按照事物的名称列出其数量，以便于分类整理。（2）定序资料，即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各项事物的数量，以便进行比较。（3）区间资料，即从一个基数到最高数目间的比较关系。（4）比率资料，即不同数量之间的比率，以反映事物的大小、强弱、变化等。^②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相关社会制度的完善，“让数字说话”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极力倡导的方式，各种直接的数量资料不断增多，来源渠道多样，为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进行统计分析或构建模型

资料处理后，可制成统计表和统计图加以说明。制作统计表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1）表头标题要说明内容，包括时间、地点、内容和性质等。统计表的标题不宜过长。（2）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表格，标题前或表下应有标号，以利于检索。（3）数字单位应当标明。数字离开了单位就毫无意义，而单位的含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往往有所不同，而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古代的“斤”与当代的“斤”的分量是不等同的。统计图的形式可分为点图、长条图、面积图、线形图与统计图等，其中以长条图、面积图与线形图最为常见。与统计表相比，统计图更直观、形象和清晰。

（三）得出结论并分析结论

“统计操作仅仅是重新安排证据；除了在最层面上，它们无法回答一般性问题。对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39页。

^② 参见[英] 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8~1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于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较大解释问题，计量成果的意义不是一种数学问题，而是一种逻辑和说服力的问题。”^① 在使用数量资料时，需要了解不同数据之间的存在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程度如何，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得出结论。

三、计量史学方法的功用与局限

（一）计量史学方法的功用

1. 计量史学让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和成果趋于精确和谨慎

计量史学方法的发展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如电子计算机发展给予的强大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学科学化趋势的内在要求的必然。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② 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历史都用图表上的曲线来表示，因为总会有特殊的和无法估计的情况。但只要条件合适，就要采用自然科学的统计方法。计量史学方法集中了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的科学方法，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变为精确化。它可以使历史研究摆脱单纯的定性分析的局限，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互相补充和结合，使历史结论更加精确化。“历史学家应该不怕麻烦地做出定量判断，而不是使自己满足于印象性估计。”^③ 数字语言比起文字语言更准确。大小、多少、强弱等概念用数字表示更准确、精确。数字语言也有可计算性，比起文字语言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绝对的比较标准。数字语言有很强的通用性，不受时间、地点、语种等条件限制。总之，在可用数字语言进行描述、论证、说理的历史研究领域，运用数字语言较运用文字语言更准确、更雄辩。数学方法的严密逻辑性、严谨的研究程序决定了历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严密逻辑性和严谨的研究程序，以避免论证过程中参照系变动、标准不一或前后矛盾、偷换概念、用词失当、逻辑混乱，以致结论偏移、失误。计量分析的结论一般经过严格的论证，可以进行验证，可以重复分析。计量分析可以使定性分析有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从而避免随意性判断。比如中国工人阶级特点的判断，受压迫深就是在工作日长、工资低等数量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结论，从而使革命性强的结论有了可靠的基础。再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的结论，也是根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教育等各方面遭受的损失，根据对一批中央和国家的领导人、各级干部、各条战线杰出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分析后形成的。这些数量分析足以驳倒“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论调。计量史学方法在经济史、人口史领域采用的较多，在政治史中也可运用。如在分析党的队伍、领导机构的组成及其变化，计算各方面的成果等问题时，也都可以加以运用。现当代史中有许多问题亟待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如抗日战争研究，以抗日战争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早期的研究多注重“定性”，在抗日战争史的著述中，通常多用一些较为模糊的诸如“起了

① [英]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2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② 参见 [法]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③ [英]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218页。



决定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不可估量”、“无以计数”等语汇。其实这些概念或多或少还是隐含着量化或统计的内涵，只不过由于史学工作者出于具体考证的困难或者缺乏量化的观念，使本来可以进行定量判断的概念变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简单定性。事实上，作为一场举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从战役的规模大小、战争的投入到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等其实都是可以也是应当量化的。可喜的是，在近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量化现象随处可见，其中在三个领域最为明显：一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敌的不同战绩和贡献；二是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三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延误。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① 如有学者分析，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占国民党22次会战的41%，甚至还有过一些攻势作战，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有大的战斗496次，占整个抗战时期战斗的44%，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时期伤亡人数的43%。由此质疑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② 还有学者通过两个战场的歼敌总数的统计，去分析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数据资料显示，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余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人，几乎占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日军80万人，占60%，基本上没有歼灭伪军。从歼灭日军的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军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5.6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人），中共军队歼灭日伪军数则比国民党军队歼灭日伪军数多两倍。^③

2. 充分利用之前被忽视的材料，促进中共党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计量史学所带来史学界的史料观的变化，被称为“计量化革命”。史料观的变化促使历史学家去开拓新的史料领域，把许多从前很少或没有运用或不可能运用的史料（诸如公私账簿、物价和工资方面的史料、教区档案中有关教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记录、族谱、征兵征税记录、选举和投票记录、法庭记录、遗嘱、公私藏书目录等）发掘出来，这些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又使历史研究者在什么是史料以及怎样选择、鉴别和运用史料等问题上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可开发利用的资料日益广泛，新的研究领域逐渐被开拓，如人口史、家庭史、城镇史、医院史、工厂史、监狱史、社会结构史以及价格史、工资史等。一些原有的研究领域也产生了新的研究角度、方向，即旧领域中产生了新领域，如计量政治史、计量军事史等，从而使整个学科建设大大发展。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所写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就运用了大量数据来阐

① 参见袁成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1）。

② 参见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载《史学月刊》，1992（3）。

③ 参见张廷贵：《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载《军事历史》，1985（4）。



明解放后广东省的变化，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地展现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貌及发展规律。

3. 促使研究者在历史解释方法和表述方法等方面发生变化

电子计算机处理数字资料快，处理文字资料同样也快，是人工处理无法企及的。有学者就提出了“利用电脑提高党史研究的效率”。党史研究中的许多史料需要统计和计算。另外，还可以利用文献资料进行计量分析，如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的《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以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为素材，通过对报告中使用字词出现的频率变化的分析，以得到的数据为线索搜集关键词，以弄清中共方针政策的变化。与传统的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相比，计量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的变化来看中共十六大的特点》运用计算机数据统计功能列举了十六大报告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最突出的词”，十六大对比十二大到十五大“新出现的词”、“没出现的词”等，通过对十二大以来政治报告中词语出现频率的变化进行分析，明确了中共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存在、怎样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分析较为透彻，给国内学者带来一定的启发。他的这方面的成果还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频字词计量分析法的有效性——以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为例》、《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计量史学方法的局限性

运用研究方法都有其限度，超出这个限度，也就是它的局限性了。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对于计量史学方法的最当估价，是把它当作历史学家所拥有的许多技术和方法中的一种。在该用它的地方用它。用不着像一些史学家一样，对它抱有过的奢望；也不必像另一些史学家那样，对它过于轻蔑。”^①

1. 要认识到计量史学方法只是辅助而非核心，必须把计量方法与其他众多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切忌把计量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作用、地位绝对化。罗德里克·弗拉德指出：“定量问题补充定性问题，定量证据补充定性证据；两者无法相互取代，两者各自也不能以了解整个历史学的研究自命。……计量证据几乎肯定不会提供一个全面的答案，但是它很可以提供一部分的答案，而这部分的答案视若无睹地丢掉，既是浪费也是不负责任。”^② 因此，要对计量资料与计量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将数字用作描述性的资料，使之和叙事性描述联系在一起，视资料的特点灵活地有机地运用各种方法，才能产生科学的结论，才能使中共党史学真正成为科学。

2. 把历史的量化处理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用计量方法研究得出的数字结论，往往是现象的反映，探讨本质还须进一步分析研究。而且对于同一数字结果，因为历史观、理论体系的不同，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唐德刚

^① 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18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英] 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3页。



在《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里曾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个柏拉图式的‘研讨会’上，笔者倾听加州大学教授斯卡乐宾洛（Robert. A. Scalapino）先生的讲演。他把刘少奇、毛泽东的身家性命、事业学问都化成‘符号’，列出个代数方程式，几下一变，后边的‘等号’就把他二人的毛病‘等’出来了。听毕演讲，我才恍然大悟：大陆上十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原来就是几个ABCD在作祟。”^①柯林武德就对此警告说：“统计学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好仆人，但却是一个坏主人。”^②因为它只能对历史事实做经验主义的描述，却无法揭示事实背后的思想。如有学者质疑《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载《近代史研究》，2007（1））一文中用“民主”与“科学”两个词出现的频度来鉴定“五四精神”的不恰切之处。^③在文史领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应该特别慎重，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结论的作出仍须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

3. 任何数据的来源都要认真核查，数据的全面、真实是研究的基础

只有在数据资料正确的前提下，才能从事具有科学性、深刻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因此，在作资料搜集与量化处理工作时，要细心、耐心和专心致志。历史研究的资料是复杂的。比如有些资料遗失，有些资料残缺不全，这就无法用计量方法研究。因为资料的来源不同，同一内容记载不同，甚至相反，或者资料伪造，这会使计量方法无计可施。因为计量方法无法判断资料的真伪。如果使用错误的资料，再科学的方法也无法产生正确的结论。如日本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不认同30万这一说法。此数字主要来源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调查，根据后者的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就以“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为标题作了报道。中国学界坚持这一说法，是有足够的资料来支撑的。如孙宅巍经过考证，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经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8.5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3.6万余具，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7400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15万具。以上述数字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以及约1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确有30万人以上。^④中日双方之所以在此问题上出现分歧，正如有学者所论：“对一部分日本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典型的中国式夸张，是中国人制造的神话，是一种宣传，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可是对于另一方占压倒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后军事法庭下达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的历史判决。一部分日本人曾试图全盘否定战后联合国军方面进行的军事审判。为表示反对，中国再次确认了守护这个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

①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1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② [美]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320页。

③ 参见《王奇生的“幽默”——用统计学能鉴定“五四精神”吗？》，见 <http://800lw.net/article/html/9173.html>，2010-06-24。

④ 参见孙宅巍：《南京大屠杀》，438~44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的数字的意义。”^①

综上所述，计量方法虽并不能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所有问题，但只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亦难以反映历史的全貌，即只用计量方法绝不能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美国著名计量史学家福格尔，在回答“计量方法能否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问题时说，“我认为答案是干脆的不”。计量方法的运用要实事求是。适合用的用之，不适合用的不用。不要盲目地用，牵强附会地用，不要只图标新立异地用。尽管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但是总体来看，做得还是不够。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必须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的分析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量化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只有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才能使中共党史研究向着更加科学、更加精确的实证方向迈进。

^① 杨大庆：《南京残暴行为——建设性的对话是否可能》，见刘杰、[日]三谷博、杨大庆：《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152—15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第四章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第一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类型

史料的类型因分类标准不同，可以有多种类。依存在的形式特点可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声像史料；依照史料的性质可以分为原始史料、撰述史料、文艺史料、传抄史料；依照史料的版本可以分为原件、复制品、改制品、重版等。^① 根据史料存在的形式特点而进行的分类是通常所说的史料类型。

一、文献史料

当前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献史料，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件与档案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资料

档案是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矿企业和某些重要人物，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并经过一定的工作程序集中保管起来的文件资料。一个单位和个人在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工作中，累积了许多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反映着这个单位或个人活动的全貌。当这些文字资料还没有经过立卷手续转交给档案部门之前，一般叫做文书或文件。这些文书或文件，对这个单位或个人的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当这个单位的文书部门将一个时期或某项活动所积存的文件，经过整理和挑选编入卷宗，并移送给档案部门时，这些文书或文件便转化为档案或档案文件。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能转化成

^① 参见荣孟源：《史料与历史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档案。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有些文件对以后工作无太大查考价值，所以没有必要列入档案保存；另一方面，有些文件没有经过档案保存阶段就直接公布了，如政党和政府的宣言、声明、决议等，这种资料只能叫文件，不能称为档案。由此可以看出，文件和档案就其内容来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由于保管方式的不同，才有了文件和档案的区别。国家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中央权威部门陆续公开的文献、档案资料是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国家领导人的文选、文集、文稿、年谱和传记等。《党的文献》等刊物也有选择地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其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国家领导人的文稿和谱传，提供了许多外界接触不到的珍贵史料。比较常见的文集还有《六大以前》与《六大以来》。就中共代表大会而言，从1956年的八大至今的十七大都有文集出版。中共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决议，即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党史研究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群众团体和企业单位的文件，以及反映中共活动的其他文件等。

（二）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

报刊是报纸和期刊的总称。报刊资料非常丰富，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报刊是各阶级、政党、团体和派别发表各自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各种党报、党刊，农、工、青、妇、学术团体的刊物，部队的报刊，企业的报刊等都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质的变化点。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近代报刊迅速发展起来，代表各阶级、阶层和政治势力的报纸不断涌现，报纸数量和发行种类都大大增加。如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的报刊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国民》、《新潮》、《京报》等，这些曾经影响了五四运动的报刊，已经纷纷走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我们今天探寻前辈救亡图存脚印的史料来源。

中国共产党报刊资料非常丰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九种报名各不相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九种中共中央机关报分别是：《向导》、《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红星》、《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出版了。《向导》为周报，由陈独秀等人编辑。《向导》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破裂、第一次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的整个过程，共出版了201期。1928年11月20日，第二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在上海创刊，谢觉哉任主编。《红旗》前23期为周报，从第103期开始为三日报。1930年8月2日，《红旗》停刊，共出版了126期。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红旗日报》是第三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于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红旗日报》从创刊号开始到第161期为止，在其报头的左侧和下侧相继注明《红旗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



旗日报》从第162期开始到第182期为止，在其报头下侧注明《红旗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1931年3月8日，《红旗日报》停刊，共出版了182期。1931年3月9日，《红旗日报》改名为《红旗周报》，《红旗周报》是第四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恢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33年8月第59期开始改为半月刊，1934年3月1日终刊，共出版了64期，另有附刊13期。《红旗周报》当时不能公开发行，封面常以《实业周报》、《佛学研究》等假封面出现。第五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周以粟、瞿秋白任主编。从1933年2月7日第50期开始，《红色中华》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机关报”（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仍在刊行）。1933年6月17日，第86期《红色中华》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4年2月16日，第150期《红色中华》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1934年10月3日，第240期《红色中华》因红军开始长征而停刊。1935年11月25日，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色中华》第241期复刊。1937年1月25日，《红色中华》第324期停刊。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第325期改名为《新中华报》。第六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红星》。1931年12月11日，《红星》与《红色中华》同时创刊，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1934年10月—1935年8月），由于《红色中华》停刊，《红星》代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70多期报纸，由邓小平主编。1935年8月3日，《红星》停刊。第七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新中华报》。1937年1月29日，《新中华报》创刊，系《红色中华》改名而来。其报纸刊号延续《红色中华》为第325期。1937年9月9日，《新中华报》第390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8年12月25日，《新中华报》停刊，共出版了474期。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刷新版）创刊，期号为“刷新第一号”。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刷新版）停刊。次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刷新版）共出版了230期。第八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它是由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刷新版）和新华社电讯小报《今日新闻》合并后改版而来。1947年3月14日，解放日报社撤出延安，迁移到瓦窑堡。1947年3月15日至27日，《解放日报》在瓦窑堡出版共计13期。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第九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1949年8月1日）。1948年6月15日，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为代中共中央机关报。1949年3月15日，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由河北省平山县迁移到北平市出版。1949年8月1日，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由代中共中央机关报转为正式的中共中央机



关报。1949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期号，延续了中中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7月31日的期号，为第408号。^①此外，还有各大区中央机关报，如《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东北日报》、《大众日报》等。毛泽东指出，“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②。在90多年的奋斗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办好党报，通过其揭示真理、宣传主张、动员民众、推动革命、指导工作，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还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如《中央日报》。1927年初，为巩固其反共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得到中央大权后，立即以“中央”自居整合国民党各派系的报刊。他以“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将汪派控制的《中央日报》从武汉迁往南京，并在《中央日报》复刊时指定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傖兼任社长，派CC派人士赖琤接任总编，实际控制了汪派的《中央日报》。在吞并了汪派《民国日报》和CC派《京报》之后，最终使《中央日报》坐上了国民党系统报纸的第一把交椅。南京复刊的《中央日报》以“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完全成为蒋介石集团的舆论工具。毛泽东曾指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③

报刊是社会时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镜子，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又对它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说过：“出版的根源意义是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分析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报刊一般都连续发行几十年，折射着其间社会变迁的长期轨迹。同时，报刊集中提供时事、政治、评论、经济、外交、体育、文艺等多种信息，能从多个方面反映社会状况。行政当局的有关指示、法规、文件、政令等，除内部下发者外大多通过报刊公布，报刊也是发表个人文稿的重要场所。报刊资料，尤其报纸非常重视报道的及时和准确，所以它有真实性。但是新闻报道因其采访加工的因素，当然有不全面、不客观、不准确甚至完全不正确的情况。与此同时，报刊通常受政治的制约，其主办者或编辑记者的倾向性与被采访报道的那些当事人的观点不会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完全站在敌对立场上。由于这些原因，作为史料又有不真实性。这一点通常表现在对某些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的报道片面、失实，甚至拒绝报道、歪曲宣传、造谣诽谤等方面。这些情况的存在，需要我们在运用报刊资料时要重视考实这一环节，找到多种报刊资料相互印证。

美国学者周策纵在研究五四运动时，就以报刊为主体资料，通读五四时期的报刊，“至少曾把1915年到1923年八九年间的报刊，直接间接，多多少少检阅过六七百种”^④，目的在于“大量引用当时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资料，希望能让当时的人和事，自

^① 参见卢文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历史沿革》，载《新闻战线》，2008（1）。

^② 毛泽东：《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5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③ 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1页。

^④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己替自己说话”^①。

中共党史学者邵维正在考证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时，就借助了当时上海报刊界的新闻报道：

几乎所有有关回忆都说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但又都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直接的记载难以找到，就只能用间接事件来推断。当事人回忆，一大会场受到搜查的第二天黎明，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孔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对考证一大日期还是有用的，查清孔案时间就可以间接证明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不可能登报，而孔案之类的社会新闻则是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逐日翻阅上海的几家报纸，果然都有详细报道，明确记载着孔案发生在7月31日清晨，由此证明一大会场受到侵扰是在7月30日，无疑这就是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有了这个日期，就可以举一反三：向前推算，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一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②

（三）历史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笔记等

与前两类文献史料相比，历史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笔记等不属于“公共写作”，特别是日记，往往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个人对每天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有选择的记录。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写日记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的出版^③，也可以到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更有《林伯渠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谢觉哉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陈赓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等大批日记的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因此，就文献的数量来说，日记文献数量巨大，尚未发现的、分散的、未印行的还有大量的留存于世。日记文献作为文献宝库中一种珍稀的史学资源，其内容的真实性、保密性以及形式的灵活性、选材的广泛性使日记文献在历史研究的史料利用上有着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实在有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必要。如《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用命牵农田、魂系庄稼的平凡轶事，用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记载了一个中国普通农民所经历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风云，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又如蒋介石从1917年开

①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6页。

② 邵维正：《板凳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4）。

③ 参见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始记日记，直到去世前的1972年，50多年间几乎没有中断过。蒋介石的日记被其家属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前胡佛研究所已整理好并公开的为1917年到1945年的日记。在详读过胡佛研究所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后，学者杨天石作出这样的评价：《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填补蒋介石研究中的空白”，而且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厘清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重要转折点”，都会有重要的作用。即以他个人的研究来说，《蒋介石日记》也协助他修正了过去的若干看法。^①日记最重要的价值是可以作为考订史实、补正历史的重要依据。作为最纯粹的私人写作，日记反映了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而这些恰恰是正式的官方史书中所缺乏的内容。《季米特洛夫日记》披露了1936年8月至1945年8月间国共两党领导人与苏联、共产国际的来往文电，季米特洛夫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等内容，有助于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中的若干重大事件，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当然，与其他文献一样，也有些日记是在记主在世时就准备公开出版的，因此在撰写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公开发表的可能性，其中的记述难免有矫饰和虚假的因素。但就文献史料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而言，学界普遍认为，一般情况下，评传不如回忆录，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

中共领袖和其他著名人物的往来书信，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史料。这些书信往往涉及某些重大的政治活动或其他重要问题，其中记载着双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态度。近些年来，较注意书信的编辑出版，如《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薄一波书信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等陆续出版。其中《薄一波书信集》收入薄一波1939—2005年书信452封（包括以书信形式出现的电报、批示、报告等），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反映了中共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与实践过程。这些书信是从现已发现的1000多封书信中选出的，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主要来自中央档案馆，各有关省市、部委档案馆，收入本集的书信除因篇幅原因作了个别删节、对明显笔误作了订正外，均保持原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各地与各部门出版的地方史志、年鉴等

地方志的编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无不备载”是中国地方志的编撰原则，举凡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地理、气象灾异、户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俗风情、名胜古迹、方言艺文、人物、奇闻轶事、神话传说、地方文献等均予以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都特别重视修志工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是领导、指导全国修志工作的中央机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台湾地区外，已全部建立了

^① 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省级地方志编委会及办公室。绝大多数市(含地、州、盟)、县(含县级市、区、旗)也都建立了修志机构并已纳入各级政府工作序列,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级机构。这种自上而下的修志机构的建立,为持续开展地方志工作奠定了基础。新编地方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详备的地情、国情载体,是进行地方史研究的取材之资。新编地方志的编撰在沿袭传统修志体例“记、志、传、图、表、录”的基础上,略有变动,是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传、附录五部分组成,卷首加序和凡例,卷末附跋或修志始末、附录。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专志为纬,形成总体基本结构。因此,地方志和地方史的关系极为密切。但细加比较、分析,两者毕竟有所不同。就记述内容而言“志详史略”;以记述方法而言“志横史纵”;以记述时间而言“志近史远”;以利用资料而言“志繁史简”。其表现形式可概括为:一是内容上,一般史书不如地方志内容广泛、全面,史书侧重于历史的纵向叙述,志书则在统合古今的基础上侧重于横断面的展开。二是编撰形式上,一般史书多侧重于论述历史发展规律,强调对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分析,是学术性较强的著作,而方志则是以地命名、以地域为中心的地情资料性著述,一般无须直接评论功过是非,不能以论代史,也不能就实论虚,要求把作者的观点和倾向性,寓于史料的记述之中。三是资料与作者上,史记过去,其记载主要依靠史料,辅以考古调查、发掘和采访,而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和文书档案。地方史的撰写一般由史学工作者承担,而地方志则需要方志工作者与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史学工作者、地学工作者等的密切合作。地方性是方志在空间方面的显著特征,地方特点是方志的生命,一部好的方志,必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梁启超指出: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前人作史,专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这是不全面的。“如欲彻底地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普通说中国如何如何,不过政治中心的状况,不是全国一致的状况,所以有作分地专史之必要。”^① 史志学家瞿宣颖在志例中也说:“方志者,专史之必要,地方之史而已。集无数地方区域而成国家,每一地方区域各有其发展之序。发展之序不同,故一国之中民风之文野不同,民生之荣枯不同,民德之刚柔不同……故欲了解国家与民族桀然万殊之习性情状,必自了解各地方之史始。”^② 地方志保存了丰富的自然、社会历史资料。梁启超曾强调,地方志的史料乃是“所谓良史者”吐弃的原料,故可“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③。章学诚曾说:志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要做到对史补、参、详、续,使地方志成为一方之“百科全书”,需要有广泛的资料来源。地方志是以资料取胜,就更要为后人保存能反映真实面貌的宝贵资料。

年鉴,是由某一机构汇集一年内社会各方面或某一部门的各种事实和统计资料,编辑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4810页。

② 瞿宣颖:《志例丛话》,载《东方杂志》,1934,31(1)。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4581页。



成册，供研究历史或某些问题使用的出版物，以记述事实与收录大量统计资料为特点，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年鉴大体可分为综合性年鉴和专业性年鉴、地区性年鉴等。综合性年鉴如百科年鉴、统计年鉴等；专业性年鉴多为部门或专题性年鉴，如历史年鉴、文艺年鉴、人口年鉴等。地区性年鉴是以地域为范围分门别类摘录各行各业的发展概况。通过年鉴，可查找近年来国际国内时事，各部门各行业的进展及各学科各专业的研究动态；可查找政府颁布的重要法规文献和逐年可比的统计数据资料。

（五）海外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

近几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迅速，全世界目前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名学者，正在利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先进手段对中共党史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在众多国家中，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大都公开出版了库存资料目录索引，被称为世界各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资料基地。

美国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众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费正清创设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美国有关中共党史的重要刊物有《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亚洲历史杂志》、《新中国》等。美国翻译出版的S. R. 施拉姆编《毛泽东革命理论文献（1912—1949）》等，影响较大。美国多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达4亿册以上。重点收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哈佛大学藏中文资料近40万册。重点收藏中共党史资料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几乎搜集了20世纪中各国所出的全部重要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托派、陕甘宁边区、左联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此外，该图书馆还藏有大量中国旧报刊，据称有全套《申报》和《民国日报》的缩微胶卷。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不仅有中文藏书25万册，还有中国报纸、书刊、文献的缩微胶片2045卷。

日本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几乎可以同美国并驾齐驱。在中共党史专著和参考资料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同美国难分伯仲。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是海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备材料。日本近年来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资料。号称亚洲文献宝库的东洋文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作为最主要对象的专门图书馆兼研究所，其巨大的馆藏绝大部分是中国资料。中国研究所图书馆2万册藏书基本上都是研究现代中国的论著，其中大量的中国调查资料更为世界著名，如《农村问题与农村调查》、《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变化调查》、《中国现代文化调查》等。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资料，如多种《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日中问题重要关系资料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解放区婚姻法资料》、《李大钊文编目录》等。

苏联对中国的研究开展得较早，机构较完备。195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与太平洋研究所合并组成新的东方学研究所，其中的中国部是苏联科学院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1956年10月，又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并于1958



年创办了《苏联中国学》杂志。后来，这些科研机构不断重组。当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影响较大。俄罗斯拥有完整的共产国际文献，同时也存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史文献，如中共历届重要会议文件及各种出版物等。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等国的档案开放，俄罗斯出版了内容丰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对研究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英国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历史较长，近年来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英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两个中心是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和利兹大学中国学中心，前者发行的《中国季刊》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刊物，由著名史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拉夸尔^①创办并主编多年。其他国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一般起步较晚，但发展却普遍比较迅速。所以有学者称中共党史研究为当代世界的“显学”。

海外学界也都出版了不少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论著。译成中文且有些规模的，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石仲泉主持下，出版了十册。我们要密切关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最新动态，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价，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力度。

（六）专著与论文

专著与论文属于二手文献史料性质，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恰到好处地运用二手史料也是治史的基本功。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国内二手文献史料增长很快，每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面对此前发表的大量研究论著。治学要创新，研究要避免重复，就要很好地搜集与利用二手文献。但由于二手文献数量巨大，其质量也有高下之分，因此，在搜集这类资料时力求精审。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地位得到空前凸显，甚至有学者要建立中共党史文献学这样专门的学问，这是因为文字的记录最为清晰准确，人们最容易理解、传承。要强调的，文献史料是重要的，但不等于资料的全部，也不是绝对准确。

二、实物史料

中共党史研究的实物史料，一类是革命文物，如石刻、标语、壁画、布告、匾牌、印章、衣服用品、武器、旧址等。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文物大部分已经入藏，少数不能移动的文物和旧址留在原地加以保护。对于这些革命文物，可以通过参观展览馆得见其珍品和

^① 罗德里克·麦克拉夸尔是当代西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英裔美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著称于世，国内学界对其成果多有译介，如[英]罗德里克·麦克拉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英]罗德里克·麦克拉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1958—1960）》，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美]罗德里克·麦克拉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美]罗德里克·麦克拉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目前世界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杂志《中国季刊》，是1960年3月麦克拉夸尔在伦敦创办起来的。



复制品，也可以通过书籍和图片了解其史料。如果条件允许，应到革命旧址和原地作调查，通过实地调查，增长历史知识，搜集可能新发现的文物或史料。另一类是旧政权、剥削阶级的文物和一般文物，如匾牌、印章、武器、刑具、产契、钱钞、衣服用品等。这一类的实物史料也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史料除了部分作为反面材料已被收藏外，大部分这类文物尚未得到重视和搜集。这些实物史料绝大多数是传世的文物，出土文物甚少。实物史料直观、可靠，可印证、充实、纠正文献史料。但在用作史料之前，也要进行鉴定，一是需要鉴别它的真伪，二是需要鉴别它的年代。一般而言，革命文物历时不久，传世过程中转手的次数不多，私人收藏家甚少，作伪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在搜集文物时，有的没有及时查清来历，有的文物的年代和史料价值不能断定。又由于文物的搜集和收藏单位大多数为展览馆、纪念馆，其任务主要是展出，因此文物的复制品较多，复制品虽然近真，但不是原物，其史料价值要比原物低得多。有时，一些展览馆或纪念馆为了展览的需要，还要创制一些展品以加强展览效果，这种展品既非实物，又非以实物为本的复制品，运用这类实物资料时，须加以鉴定。

三、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又称口碑史料或活史料，为当事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中国学者在界定口述历史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二是视口述历史为在口述史料基础上进而提升到研究层面的东西。口述历史概念分歧的背后，隐藏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差异。口述历史等同于口述史料吗？多数学者持否定意见，并主张将两者严格区分开来。有人指出：“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① 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自己以口述的语言风格写下的文字性东西，以及别人为当事人的口述所作的记录。如果是他人所记，不应该是进行过大改造、加工的东西，而应尽量符合口述内容的原态。若是经由执笔者加进了从语言形式到内容的过多加工和研究性创造成分，就成了包含口述史料而又有别于单纯口述史料的口述历史著述。这样的著述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成果。因此，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有所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它本身已经包含对文献的查询。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而这种加工，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文献

^① 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见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1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进行了筛选。界定了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两个概念，便会很清楚地看到，现在通常谈论的所谓口述历史，多局限于口述史料层面，并未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

回忆录常被学界列入口述史料之列。回忆录有几种类型。一是当事人对某种亲身经历回忆；二是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三是局外人对某种事件或事件中人的回忆。同一回忆录可能兼具几种性质。比如甲的回忆录叙述了他在某次事件中的经历，但有部分内容涉及此次事件中的乙，那么，对甲而言所述经历属于一类回忆录，对乙而言，则属于二类回忆录。回忆录的根本特性是追忆，因此不准确是难以避免的。应当特别重视前两类回忆录，因为它能提供大量具体情节，这是其他史料无法取代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发刊词》说：“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来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因此，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价。我们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闻见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反映出来……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的，是亲身经历过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具有真实性是对回忆录的基本要求。

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学界出版了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回忆录：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撰写的回忆录；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等等。这些回忆录的陆续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宝贵材料。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对中国学者对回忆录的重视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偏重回忆录，他主张，构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首先应对回忆录进行一番彻底清算。其中，一些看法是较为偏颇的，如“1949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镜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①，他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依据回忆录推演的“史实”，与事实不符。^②为了“照射出这些回忆录到底有多大的价

①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432~4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② 对此问题的辨析可参见萧超然的《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载《百年潮》，2001（7）），此不赘述。



值”，于是他在该书的第四章以较大的篇幅探讨了有关中共一大出席者人数的一般见解的变化以及董必武回忆录的产生经过，以证明了他所说的回忆录有相互继承和层积的问题。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回忆录作为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尽管可能有种种问题，包括石川禎浩先生所说的相互继承和层积的问题，但仍有它的价值，关键是如何运用，把回忆录同回忆录互相对照和比较，把回忆录和第一手资料互相对照和比较，这样运用有什么不可以呢？其实，石川禎浩先生这本书中引用回忆录证明他的观点的比例并不小，包括引用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有些还被当作关键性的证据，石川禎浩先生所说的和所做的不一致呀！”^①

四、声像史料

声像史料包括照片、招贴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影片拷贝、录音磁带、唱片、幻灯片、录音带、光盘、缩微胶片等。有关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这类资料也极为丰富，可分为以下四种：

纪录性声像，即完整记录某件事、某次讲话、某台戏曲或某首歌曲等的录音带、纪录片、唱片、光盘等。如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的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②

文献性声像，即专门复制的成套文献资料。纪录性声像和文献性声像价值等同于文献。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周恩来外交风云》、《邓小平口述历史》等也有很高的价值。

新闻性声像，即对某人某事的新闻报道，例如中央电视台存档的新闻联播资料，价值等同于新闻。

宣传性声像，即为系统宣传而制作的专题片、采访集，价值介于文献、新闻、回忆录之间。

声像史料反映的历史生动而真实，蕴涵信息量之大，应引起中共党史研究者的重视。但這些以声像形式出现的资料，因为许多是非正式出版物或非卖品，一般图书馆收藏较少，即使收藏，或未编目，或在编目上另成体系，查找不易，不利用。

第二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

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都是从搜集史料开始的。搜集史料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这

^① 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载《百年潮》，2006（6）。

^② 参见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97页。



是因为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且散乱而无系统，这如同矿石一样，埋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需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去寻找它，搜集它。史料搜集工作是长期的工作、经常的工作，也是艰苦的工作。

一、搜集史料的顺序与原则

搜集史料的顺序，一般是先基本史料后增广史料，先普通史料后特别史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研究一段历史或一个历史问题，为了给这项研究工作打基础而准备搜集的史料就是基本史料。陈垣在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时，下决心要把元朝也里可温教研究清楚。在动手撰写前，他先把210卷、200多万字的《元史》全部阅读了一遍，其中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先在书上作出标志，然后全部录出，加以研究。先搞明白这些基本史料，再参阅其他有关书籍，再动手撰写。他认为这是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不能怕麻烦。掌握的资料如不详尽，便得不出确当的结论来。^①

研究中共党史，基本史料应包括党的历次重要会议的决议、中央文件档案、党的领袖的重要著作等。增广史料是指基本史料以外的各种史料。在掌握基本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所掌握史料的数量，还要不断扩大史料的范围，努力发掘新的材料。如为研究某一历史事件，就需要搜集与此事有关的社会经济史料，以此作为对此历史事件研究的背景资料。普通史料也称常见史料，凡流传下来的现成的史料、经过初步整理的史料、见之于史学著作中的史料都属于普通史料。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凡是公开出版的党的文件、党的领袖和历史人物的著作、经过他人搜集编选出版的资料书、影印的报刊资料等都可以看作普通史料。基本史料一般都是普通史料，只有少数得之不易的珍贵史料例外。但不是所有的普通史料都可以列为基本史料，因为普通史料范围广、数量大，基本史料只能取其中最重要的东西。中共党史研究者除了要经常地、不断地积累大量普通史料之外，在一定时间，还要选择专门研究课题，从事特别史料的搜集。特别史料，一般是非常见史料，是为了专门研究而寻找的史料。一般书籍中和一般场合不容易见到的史料，或藏在大量的一般书籍中不能轻易辑出的史料都可称为特别史料。由于不易得到，所以也叫做珍贵史料。搜集这种史料，要特别花费时间和精力，会碰到许多实际困难。

有着卓著成就的史学家无不在搜集史料方面下工夫，柴德赓在回忆陈垣的学识时说：“陈先生写文章，首先是搜集材料，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章。主要材料不到手，更不能动手。”^②陈垣在研究佛教史时，“除去参考教外典籍外，把嘉兴藏、大正藏和后来印行的磧砂藏都先摸清楚，对其中有关佛教史的部分翻阅一遍，把准备用的材料抄录下来。这几部书都是卷帙浩繁，不是少时间能够阅完的，尤其是嘉兴藏贮存的地

^① 参见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36页。

^② 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36页。



方，多年无人进入，潮湿阴暗，尘土积封，蚊虫很多。为了预防疾病，每天都是吃了奎宁去闷藏的”^①。那时陈垣已是50多岁，正是凭着这种刻苦精神，治学才取得如此成就。

因此，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还要把握一些原则。一是在所要研究的课题范围内，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取有关的历史证据，切忌浅尝辄止，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二是对于搜集史料的品种、类别，不要有门户之见，以丰富多样为佳，切忌画地为牢，要有广收博采的精神。陈垣主张借用“竭泽而渔”这句话的精神去做，竭泽而渔，对于捕鱼，当然是“岂不获得，而晚年无鱼”，但是研究问题搜集资料，必要力求完备，资料搜集得充分，对问题的各个方面才能考虑得周到，比较有深度，得出的结论才比较真实而可靠。怎样才能搜集得比较充分就要依靠“勤”和“博”了。^②

二、搜集史料的基本方法

搜集史料，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克服困难的精神以及耐心和细心，还要有各种方法。在这方面，前人为我们总结了许多。

（一）利用检索工具书寻求史料

陈垣认为，资料的搜集是问题研究的开始，资料搜集的过程就是问题研究的过程。搜集资料，要懂得目录学，懂目录学才能懂得一个问题的过去和现在，才能开阔自己的眼界，不然，搜集资料也是无从下手的。^③ 陈垣治学就是从目录入手而走上成功之路的，曾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④。所以，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要读的书目，后来他要求学生也要由目录入手，希望每个人都有把钥匙。目录学著作包括目录、索引、辞典、年鉴、图书、类书、文摘、百科全书等，如《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八十年来之史学书目》、《全国报刊索引》等。图书目录的功能，就是综合群书，类居部次，考镜源流，条贯学术，或者是记载书籍的名称、作者、卷帙、出版年月，或者是叙述书籍的主要内容和提要，有些还简要地介绍书籍的版本、作者的生平等内容。人们一查书目，就知道了书籍的所在，明白了书籍的内容、作者生平以及该书的各种版本情况。于是，图书目录就为我们搜集史料提供了一个途径，熟悉书目、利用书目，就成为我们搜集史料的一种方法。在选定研究方向或题目之后，首先检阅前人关于本题类似的或相近的课题范围内搜集和利用史料的情况，弄清楚前人已经收集和利用了哪些史料，可以供我们进

^① 刘乃和：《“书屋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37页。

^② ^③ 参见杨殿珣：《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④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86页。



一步搜集和利用的史料还有哪些，大致在什么地方或设想有哪些特别史料可供发掘和利用，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根据这些了解和设想，运用史科学、目录学的知识，订一个搜集史料的计划。现在的图书目录和图书资料索引有多种编排形式，但仍以分类为主。以类分，就可以按类找。历史是类，中国近现代史也是类，下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人物等类，有的还按人物、事件、团体、报刊等分类。再往下还可分为若干小类，如经济史可分工业史、农业史、财政金融史等，往下还可以细分。中国现代史划分各个时期，各个时期按上述方法分类，类就分得更明细。类分得越细，越能接近我们需要的特别史料。

（二）逐书寻求史料

书目，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书上大体有些什么史料，按书目来寻找史料，仍不免要一本本查，一本本找，逐书逐页地阅读搜集。不过，逐书逐页地阅读搜集，还应该注意史事本身的线索，借助史事本身的发展关系，来作为我们寻找史料的一种线索。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一个训练查找材料的方法即“练习注意”：

初学读书的人，看见许多书，要想都记得，都能作材料，实在很不容易。某先辈云：“不会读书，书面是平的；会读书，字句都浮起来了。”如何才能使书中字浮凸起来？惟一的方法，就是训练注意。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那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办得到，无论读到什么书，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样办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于练习。最初的方法，顶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范围，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亦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前面所述读书贵勤于抄录，如果看不出注意点，埋头瞎抄，那岂不是白抄了吗？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间，煞费功夫，非有特别训练不可。^①

启功在回忆老师陈垣治学之道时说：

我曾向老师问起：“您能知道哪里有哪方面的材料，好比能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居然跳出鱼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逐渐知道老师有深厚的知识，不管多么大部头的书，他总要逐一过目。好比对于地理、地质、水道、动物等调查档案都曾过目的人，哪里有伏流，哪里有鱼，总会掌握线索的。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曾说说“唐三藏不稀奇，我有四藏”，这些“大块文章”老师都曾阅览过吗？我脑中时常泛起这种疑问。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知道里边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并且有什么用处。即带着人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比较而知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首要的，但仅仅查目录，怎能知道哪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都曾一一过目、心中有数的。^①

先辈的经验告诉我们，史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搜集到的，而逐书寻求史料是史料搜集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

（三）根据引注寻求史料

任何史书论文，都难免要引用他人的材料，而且一般都要在文本和注释中说明它的来历，这样，我们可以以引文和注文为线索来寻找原书，在原书中，我们又会发现许多资料，这样，原先仅仅是一二条资料，慢慢就积累起来。这就要求多读研究性的论著论文，从前人或他人的著作中“顺藤摸瓜”去爬梳史料。

（四）按类抄录卡片和笔记

1. 做卡片

老一代的史学工作者都比较习惯使用卡片来搜集资料。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一生博览群书，方法是做资料卡片。他在阅读书籍、报刊时看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资料，就随手将它抄录在卡片上。他主张勤读、勤抄，光是有关《明史》的卡片就有20万张之多。使用卡片搜集资料，易于分类、易于保存、易于查找，并且可分可合，可随时另行组合。卡片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使用统一印制的卡片。一个问题通常写在一张卡片上，内容太多时也可以写在几张卡片上。当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要不要做卡片，可根据各人习惯，不必有死板规定。特别是电脑普及以后，使用卡片的学者渐渐少了，但读书时随手摘录资料的传统却是每一位学人要继续保持的。

2. 做笔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阅读书报杂志时，搞调查研究时，要随身带笔和纸，随时记下所需资料的内容，或有关的感想体会、理论观点等。古人云：“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无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②在做笔记摘抄资料时，最好空出纸面面积的1/3，以供书写对有关摘录内容的理解、评价和体会。无论是用卡片搜集资料，还是摘录资料，都必须注明出处。如果是著作，则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发行年月，如果是报纸，则要注明作者、篇名、版次、报纸名称、发行年月日，如果是杂志，则要注明作者、篇名、杂志名称、卷（期）号、页码等，以便在引用时查找出处。陈垣在指导学生时

^① 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诞生百年纪念》，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99~100页。

^②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30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反复强调说，写笔记的方式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条。这种方式始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盛于顾亭林的《日知录》。^①彭明在回忆治学经验时也谈道：“范老（文澜）强调读书一定要做笔记，他认为读书不做笔记，等于没读。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在实践过程中体会到确属至理名言。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别人谈起某个问题或某个材料的时候，自己恍惚也曾看过（因为确曾看过），但一深究，出于何经？据于何典？便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也查不出来了。这就是没做笔记的缘故。徐老（特立）谈自己的读书经验：‘不动笔墨不看书。’又有所谓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不如摘录的说法，其意思都是强调要手勤，做笔记。”^②随时记录下平时的一些心得体会非常重要，因为“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逼处得之”。读书看报，凡即景即情有所触动感想，都要即时记下来。由于它们非刻意为之，更多带有灵感的性质，比苦思冥想所得更能直达事物本质。也正因为它的灵感性质，如不随时记录，转瞬即逝。这些笔记不同于做论文，可长可短，形式不拘，但积累多了，便可成就鸿篇巨帙。

（五）通过社会调查搜集史料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获得第一手的感性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需要在当今社会找到答案。中共党史研究开展社会调查是必要可行的，也有着深厚的研究资源和优势。一是中共党史发展中的一些历史要素仍然在当下发生着作用，追溯历史的线索直接而丰富。二是重大历史的见证人、亲历者还在，他们能够提供诸如回忆、口述形式的历史研究素材。三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调查手段的多样化促使调查工作更为系统、科学和便捷，社会调查的科学性能够得到更为直接和多方面多渠道的检验。

调查的重点在于搜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的创新，中共党史研究向社会挖掘资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社会调查是通过社情民意来认识和反映中共党史的重要途径。可就社会生产的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调查，或就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调查，获取宝贵资料。毛泽东特别注重社会调查，最著名的就是《寻乌调查》。这份长篇调查材料，共五章，它囊括了寻乌的地理环境和交通邮政，商业经营项目和市场状况，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以及在土地斗争中关于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等财产分配政策等方面。通过寻乌调查，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农村，掌握了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中的土地分配情况，也了解了城市情况，特别是城市中的商业情况，从而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社会调查就是要深入社会，去把握社会的变迁、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历史的总体面貌；深入民众，尤其是访谈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

^① 参见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58—159页。

^② 彭明：《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见《彭明文存》，52页。



者，去把握民众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的认知程度。依社会历史调查的结果，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的变化规律与特点，判断社会历史的性质与本质特征。将社会历史调查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既有利于认识中共党史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有利于认识中共党史发展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丰富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以求把中共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社会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进而丰富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而且能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可资比较的对象。如对中共党史中的政策研究、制度研究，通过社会历史调查来研究相应的社会历史，就能够在社会效益的意义上了解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实际效能如何，其变革的社会原因又是怎样的。因为这些政策和制度总是要作用于相应社会领域，并对社会发生影响的。

彭明在写作《五四运动史》的过程中，曾深感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他认为，今天的人们不可能重新参加五四运动的实践了，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却应该对历史的遗迹进行必要的考察，搜访一些口述史料，可以补史证史，还可以增加一些真实感受。因此，他每读到一段文字资料时，总要尽可能地到发生这些事件的地方去走访。在写山东问题时，曾亲自到青岛考察了历史沿革和地形的外貌，并请教了研究青岛史的专家。在写到东交民巷、赵家楼胡同、北大红楼、北大法科、杨昌济寓所、三眼井、《新青年》编辑部、“新世界”游艺场、陶然亭慈惠庵等地方时，都要到那里去观察、访问。他多次走访《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故居、北京大学当时各科的旧址、毛泽东两次来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并按5月4日当日游行的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力图尽可能地把握几十年前发生的真情实况。通过实地考察，彭明纠正书本上或传闻上的一些谬误。如《新青年》编者当年曾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新世界”就是前门外的劝业场，但经过实地的访问调查，发现不对了，不是劝业场，而是珠市口西香厂路口的一座楼房（原为一小学，现已拆除）。当年北京的“新世界”，类似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他通过两次访问（第一次承一位小学教师接待，第二次承小学的一位老工友接待，这位老工友是五四当年经常出入“新世界”的一位梨园世家子弟），并参考了当年报纸上的“新世界”游艺场的广告，了解了当年“新世界”的全貌。这样，再来读高一涵的那篇和陈独秀一起在“新世界”散发传单经过的回忆，就活灵活现、生动逼真，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①彭明在《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一文中，对资料搜集有详细的阐述，其资料来源有五个方面，分别为报刊资料、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实地考察。

（六）“网上功夫”

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把众多的原始资料、档案、历史文献、著作和刊物制作成电子版，发布在因特网（internet）上，除了发布详尽的书目、篇目外，发布

^① 参见彭明：《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见《彭明文存》，49～51页。



全文而且带全文检索的电子图书馆越来越多，使得研究者搜集史料空前地省时省工。只要打开 www.google.com（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搜索引擎，即可搜索西文资料，又能搜索中文资料）或 www.baidu.com（当今最强大中文搜索引擎，也能搜索西文资料），无论你按学科、专业分类搜索，按主题词搜索或是按书名、刊名、作者搜索，数秒钟之内就会有丰硕的收获。只要你登上因特网，就会真切地体验到你确实登上了“信息高速公路”，甚至登上了“信息空中巴士”，散布在全球各地的信息资料库藏，任你搜索，有的可以免费享用，有的须付费享用。你可以充分体验到先辈们难以想象的生在信息时代的幸运。中国期刊网（CNKI 知识网络服务平台）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等等；发布中共中央与国家时政要闻的人民网、新华网以及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各级档案馆档案信息网，人民数据库包括《人民日报》（电子版）等重要资料；一些学科专业门户网站如当代中国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中共党史研究网，等等。这些网上资源对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搜集史料需要下一定的工夫，鲁迅有段话说得好：“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之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①史料是历史学家的粮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影响广泛的史学论著无不以史料完备见长。石川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书后所附的参考资料和文献部分长达 83 页，而附在各章后的小字号注释也有 78 页。作者搜集了日、中、俄、美等国的大量资料，有当时的报刊、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多国学者的相关文章，更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档案，中共中央档案馆藏档案，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罗斯现代史资料保存中心）资料，俄罗斯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以及私人收藏文献等第一手史料。尤其是作者还首次披露了一些原来无人利用的档案史料，如远东书记处的俄文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和《远东人民》。作者对这一时期文献资料的搜集，可以说达到了“穷搜史料”的地步。这也是该书赢得学界赞誉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校勘

一、校勘的必要性

所谓校勘，即校对勘误，古称“校讎”，主要是对文献史料根据不同版本比较文字异

^①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25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同，纠正错讹，恢复文献的本来面目。陈垣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学也。”^① 中共党史文献校勘，是指将同一中共党史文献的不同版本相互比勘，如手稿本与印刷本比勘，初版本与修订版本比勘，手稿本中的初稿、修订稿、定稿等的比勘及与各种印刷本的比勘，油印本、打印本与铅印本、正式出版本的比勘，等等。

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后的特殊环境造成中共文献资料在流通、保管中存在着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异常险恶的工作环境，不仅极大地限制了文献资料的正常保存、整理和利用，而且造成了印刷质量差，传抄过程中发生的错、漏、衍、讹等情况，从而影响了党史文献资料的准确性。这种后果已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以及其他专题汇编中的部分文献和文章的原件中反映出来。这些文件虽经编者进行了若干订正，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种情况可以提醒中共党史工作者，在准备使用这部分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时，必须而且应该对其进行科学的校勘、鉴别，方可无误。^②

众所周知，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大部分是各种文件和重要文献，这些史料的汇编都是根据原件或原件的照片、影印件排印的，排印时一般经过仔细校对，错字很少，特别是中共中央出版机构编印的各种文件汇编和选集，国家出版单位编印的各种文集，几乎没有错字或错字很少。但正是因为现代印刷术的进步，文件和书籍都可以随时翻印，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文件有些可能不是根据原件或原件的照片排印的，其底本可能是一种翻印件或抄件，排印时校对的疏忽，导致这样的文件汇编可能有错字，其中一部分可能错字较多。在翻印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的情况，如把“卢沟桥事变”写成“芦沟桥事变”就曾出现在一些文献里。

古代学者把校勘视为读书的第一步基础工作。清代王鸣盛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③ 不校书，读的书就有错误，读错误之书，不如不读书。不校书，就不能读书，就是读，也枉费精力、时间。张之洞说“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读本，事倍功半”^④，亦是此意。足见先人对校勘的重视。毛泽东一生论著丰厚，在他的文稿中，有一些他亲笔写的关于文稿校对的信和更正的启事。如1938年，有一次他把一篇文章改定付印时，写信交代郭化若同志：“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并特别提出：“注意标点符号，不能弄错一个。”重要的文章，他不仅嘱托有关同志认真校对，还常常亲自反复校阅。1938年6月27日，《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他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的同志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1938年11月8日，他将在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② 参见郭军丽：《党史文献学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2）。

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④ 《清》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党的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稿修改好付印，写信嘱咐徐冰同志：“请你们校第一第二次，我校第三第四次。”1949年4月25日，《北平解放报》登载他的《五四运动》一文，多出四个字，脱漏两个字。他当天就为《北平解放报》编辑部写了“更正表”，一一更正过来，并附信说“请予登载为盼”。正由于毛泽东对待文稿的写作与校印精益求精，他的大量著述才能以那么精确、严谨、优美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①

毛泽东还曾就改正错字问题对报刊编辑谈话说：“办报和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作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② 处理史料就要有这种精神。史学大家侯外庐的严谨精神也为今天的学人树立了典范。他在翻译《资本论》时，第一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的注释第八十三，马克思引用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所录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折。德文版《资本论》所示这位官员的译名为 Wan-Mao-in。他认为自己的清史知识不够，为此专门“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先生，崔先生愿意和我一起查资料，最后才确定，马克思提到的 Wan-Mao-in，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王茂荫和 Wan-Mao-in 音同，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我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 Wan-Mao-in 即王茂荫无疑”^③。若有如此谨慎的治学态度，在当前学界曾被一度引为笑谈的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事件也就不会出现。^④

随着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工作也日益受到重视。校勘中共党史文献，不仅是一种文献整理工作，也是对文献的一种研究工作。比如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文献互相校勘以后，发现文字上的异同，就要去研究为什么会有异同，研究哪个版本为优、为精。这样，通过校勘，不仅可以作一些文字上的校正工作，也推动了对版本的研究。如果不同版本的文献互相校勘以后，发现内容上的异同，就要去研究为什么会有内容上的异同，是文献制作者的修改，还是他人的篡改，为什么要修改，为什么要篡改，背景如何，这就促进了对文献改动情况的研究。如果是文献制作者的修改，可以通过修改的内容，研究文献制作者思想、认识的变化。总之，通过校勘，可以发现文献的讹误，从而订正之，恢复文献的真实面貌，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正确、可靠的文献资料，从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① 参见杨胜群：《严谨精细一丝不苟——毛泽东同志亲自校对文稿和写更正启事的几个事例》，载《红旗》，1983（19）。

^②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31~32页。

^④ 参见高山杉：《“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载《东方早报》，2009-06-07。



二、校勘的主要内容

中共党史文献校勘的主要内容是校文字方面的错误。文字出现错误的情况有以下几种：“错、脱、衍、并、倒”。手稿有笔误、有别字；抄件或印件有抄错或排错，也有笔误和错别字。随着电脑的普及，各种输入法所造成的电脑打字的错误情况也愈来愈复杂。校勘工作最常遇到的是错字，而最难发现又最难校正的也是错字。错字的存在不仅影响着词句通顺，有的还影响着史料内容，歪曲历史，必须校正。在党史文献中，形似而误的错字较多，如“已、己、巳”，又如“戊、戌、戍”经常混淆。1942年版毛泽东《农村调查》中就出现了一些抄错或排印错的地名，如“湖江面”错为“湖口面”、“泗网”错为“泗纲”、“三标”错为“三桥”等。^① 字音相似也容易出现很多错字。有时是作者疏忽笔误所致，如“伏、服”、“长、常”等常见混淆错误。但也有些是方言所误，如在1942年版毛泽东《农村调查》中有关才溪乡的一个地名，写的是“章文”，实为“彰云”，因为在当地方言中，“障”同“章”，“文”同“云”，读音相近。诸如此类的还有“洋坊村”误为“杨坊村”、“三坑”误为“山坑”、“曾坑”误为“增康”等。^②

另外，还要校标点、校照片与视听文献等。

中国目前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1951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的基础之上，于1995年加以修订后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其规定：“常用的标点符号有16种，分点号和标号两大类。点号的作用在于点断，主要表示说话时的停顿和语气。点号又分为句末点号和句内点号。句末点号用在句末，有句号、问号、叹号3种，表示句末的停顿，同时表示句子的语气。句内点号用在句内，有逗号、顿号、分号、冒号4种，表示句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标号的作用在于标明，主要标明语句的性质和作用。常用的标号有9种，即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和专名号。”标点的好坏，对于理解正文，有时候非常关键。文献原件有标点的，校勘标点正误。文献原件没有标点，整理过程中加了标点的，校勘整理件标点的正误。

校照片有没有改动。照片本应是原始影像记载，但由于种种因素，照片在流传过程中做假、改动的情况较常见，出现所谓的“伪照片”。如“文化大革命”时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影像资料。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原《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公开撰文《我四十年前造过假照片——为维护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和“最高指示”的完整而造假》，承认自己有过造假的经历，他说：当年自己“当记者很无奈”，如“面对自己拍摄的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新闻照片，却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标准’进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达标准，就不能通过审稿关，更甭想见报了”。那时突出政治是原则性任务，有欠缺的照片就不能见报。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样既适应了政治需要，又体现‘忠不忠见行动’的精神”。他拍摄的

^{①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辑记事》，见《编辑杂谈》，第3集，7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著名“摄影作品”《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就只能是“作品”了，即“依照当时宣传方面的要求，这张照片的画面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其一，照片前面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时，高举的拳头正巧重叠在后面的毛泽东像上，这种‘挥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行为。其二，照片中人们所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木制镜框镶着的，用黑白胶卷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变成‘黑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敢给毛泽东像‘加黑框’，该当何罪？其三，照片画面里人们高举的‘最高指示’语录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两个字，被前面挥舞的小彩旗遮挡了，仔细一看成了‘文化革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边的‘女’字，变成了个‘西’字。如果这样见报，起码也会被定为‘恶毒篡改最高指示’。像这样的新闻照片，是不可能见报的。如果不留神儿见报了，必定会招来红卫兵包围报社，兴师问罪。怎么办？要想见报就得加工修改”。他还回忆说：“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干摄影记者这一行的人逐渐适应了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新闻照片进行加工的一套程序。这套加工修改的过程并不复杂：用黑白颜色的水粉调制成适当的色调，在照片上涂抹描绘，先涂抹掉那些影响画面完整的不该有的影像，诸如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的拳头、遮挡标语牌的三角小红旗，再把毛泽东画像上的衣服画出来，还要把那个‘黑’相框抹涂成白色的宽边，再把标语牌上不完整的字写上去。用毛笔在照片上描来画去，一直修改到满意为止。”^①（见图4—1）



图4—1 照片修改前后

还有的照片被以讹传讹，混淆莫辨。唐宝林曾多次撰文指出陈独秀与彭述之的一张合

^① 散木：《“文革”中的“伪照片”举隅》，载《历史学家茶座》，2008（4）。



影照被误传颠倒之事（见图4—2）。^①



图4—2 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右）

这张双人照，左为陈独秀，右为彭述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谁是陈独秀，谁是彭述之？几十年来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少人搞错。在此过程中，尽管唐宝林曾多次写论文与写信纠正，这张张冠李戴的“陈独秀”照片，还是被广泛地讹传开来。以讹传讹，直至今日。如1965年，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在他的巨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编首的照片“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之一部”及“中共之五代首领”中，就把当年《社会新闻》截取的这张彭述之照片，又两次作为“陈独秀”赫然刊出。1977年5月，台湾最大的近、现代史资料及研究杂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封里刊登的陈独秀各个时期的照片中，也出现了这张彭述之的照片。1982年2月，中国学术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载有四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的大型精装本著作《斯诺眼中的中国》第68页，把右边半张照片单独列出，说其是“陈独秀”。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实电视剧《中流砥柱》第六集，就把这张彭述之的照片作为“陈独秀”介绍给观众。1996年台湾出版的大陆著名学者王观泉撰写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封底也印了这张讹传的照片。以后不久筹建的“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宣传纪念画册上，用的也是这张彭述之的照片。1997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登辛平的《陈独秀秘书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一文时，又一次把这张彭述之的照片放大，作为“陈独秀”刊出。199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幼狮文化书系”中，在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汪澍白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114页上，上端标注“陈独秀提倡个性自由”字样的插图，也是彭述之的照片。几十年来，那张

^① 参见唐宝林：《一张以讹传讹的陈独秀照片》，载《湘潮》，2007（11）；唐宝林：《莫再把彭述之照片错当作陈独秀》，载《炎黄春秋》，1997（5）。



双人照中的彭述之多次被讹传为“陈独秀”，但真正的陈独秀照片也没闲着，1991年出现在当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型豪华本《中国共产党70年图集》第164页上时，被误为“彭述之”。

唐宝林分析了出现这些错误的源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独秀因主编《热潮》杂志，发表猛烈抨击日本侵华及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宣言和传单，于1932年10月15日，与彭述之等人一起，被国民党政府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及“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接着被押解到南京，暂押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此事轰动全国，国民党报纸以“悬赏万金缉拿”的“共党首领陈独秀被捕获”，大肆宣传。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第四版上，就注释了这张双人照片，旁边用明白的文字写道：“共产党陈独秀、彭述之解送江宁地方法院，在候审室摄影。左为陈独秀，右为彭述之。时陈、彭态度，均颇从容，二人皆着灰色棉布长袍，黄皮鞋，棕色布裤，头戴青灰色半旧呢帽。陈面容憔悴，两鬓已斑。彭双目赤红，眼疾颇重……”此后，11月1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在《时人汇志》专栏中正确地截取了左边半张照片，介绍了陈独秀的简历。可是，国民党社会调查科（中统局前身）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不知出于工作上的疏忽，还是故意丑化陈的形象，却截取了右边半张彭述之的照片，作为“陈独秀”刊出，介绍说“囹圄中之共产党取消派领袖陈独秀仲甫氏”（《社会新闻》第1卷第12期，1932年11月6日）。于是，这张彭述之的照片，就作为“陈独秀”的照片讹传下来。

在校勘照片的过程中，如果发现照片被改动，查考其原因，写入校勘记中。尽可能找到未改动的照片，即以未改动者取代已改动者。另外，还要校勘照片说明文字、内容的正误，发现错误，改正之。彩色照片，还可校色彩的真假及其程度，发现失真，写入校勘记中。

校视听文献的内容有没有改动、剪辑。发现改动、剪辑，查考其原因，写入校勘记中。校文字记录稿、文字整理稿与视听文献的异同。发现有异，应以视听文献为准，改正文字记录稿、文字整理稿。

三、校勘的基本方法

关于校勘的方法，陈垣的《校勘学释例》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通称为“校法四例”，这里结合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践举例说明。

（一）对校法

校勘中最简单、稳当的方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其旁”，以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相互校对。此法目的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以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①中共党史文献中，

^① 参见陈垣：《校勘学释例》，11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同一文献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情况不少。如毛泽东的文章、著作，同一文章、著作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的达数百种，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单行本 260 余种。其中，汉文本 170 种，少数民族文本 20 余种，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外文本 50 多种和盲文本 1 种”^①。要校勘毛泽东的某一论著，首先就要将这论著的不同版本搜集一下，相互校勘之。如通过校勘，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存在几个不同的文本。1925 年 12 月 1 日，该文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 4 期上发表。次年 2 月《中国农民》第 2 期全文转载，3 月，《中国青年》第 116、117 期连载了该文，同时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1942 年，在对《中国青年》中的文本进行了重大修改后，收入《六大以前》，由于误以为《中国青年》中的文本为最早文本，所以将该文的发表时间注为 1926 年 3 月。修改后的文本，无论观点、风格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长度也由 6 000 字减少到 3 000 余字，删去了原文中的所有数据和表格，原文中保留下来的仅千余字，且多为一般性的叙述，实际上进行了重新写作。1951 年，在进一步修改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这样就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文本。原文开头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延安时期进一步修改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勘，对该文本的真面貌就会有清楚的了解，可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几种文本之不同，反映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现在流行的文本实际形成于延安时期，而非 20 世纪 20 年代。^②

由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早期中共书籍与报刊中也存在着同书异名、异书同名的情况，应算是该书的别本。对于这些文献，只要一比勘就可知其面目。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用《大乘起信论》的书名发行流通；《论持久战》曾用《文史通义》、《中国事变解决的根本途径》等书名发行流通。用真本《大乘起信论》、《文史通义》校，即可知其“非”。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校，即可知其“是”。

（二）本校法

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校，选择异同处，进行比较判定，以求知其中谬误之处。此法在未得到祖本或别本之前，最适宜采用。“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辄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③同一文献中的内容，或前、后文互校，或正文、目录、注释、题解互校，也可以校正某些错误。在没有得到文献不同版本以前，本校是一种

^① 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册，257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国内外研究者对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情况作了许多具体细致的研究，对若干著作的版本比较研究也有了一些成绩，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专著主要有：施金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等等。

^② 参见王建国：《不同文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比较》，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4）。

^③ 陈垣：《校勘学释例》，119 页。



必要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编辑时，采用本校法，校正了不少的讹误。如，《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该会议1941年11月6日开幕，11月21日闭幕。《毛泽东选集》第1版署该文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而该文的一开头就说：“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说明是开幕会上的讲话，而不是闭幕会上的讲话。所以《毛泽东选集》第2版署时间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①

（三）他校法

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②同一文献不同版本互校，没发现什么问题，不同文献中的相同内容互校却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校正一些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版编辑时采用他校法，校正了不少讹误。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版有一句说第一次反“围剿”，“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此文1937年5月的油印本及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单行本均同此义，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说，第一次反“围剿”，第一仗是1930年12月30日龙冈战斗，第二仗是1931年1月3日东韶战斗。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的《战史》，谈第一次“围剿”的起讫日期，也说是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东方杂志》当时记载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及其失败，也是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于是《毛泽东选集》第2版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改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③

（四）理校法

理校法，即推理校勘法，根据书文的体例和遣词造句的特色，根据上下文并联系当时各种历史发展的背景和线索，运用逻辑思维对书的内容加以校勘的一种方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鹵莽炎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④此法“只敢用之于最显而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理校需要勇气，需要踏实精神，同时理校难度大，必须谨慎从事。这对校勘者的学识有很高的要求，是最高级也是最难运用的一种方法。

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性，一些文献史料的形成也不过几十年，我们可以用遗存实

^① 参见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19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② 陈垣：《校勘学释例》，120页。

^③ 参见周一平：《关于中共党史校勘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1）。

^④ 陈垣：《校勘学释例》，121—122页。



物来校文献。《毛泽东选集》第2版编辑时，有些地方就用实物校文献。如《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版提到“黄伯韬兵团”，而有很多文献“黄伯韬”作“黄百韬”。后来发现淮海战役中黄毙命后，在战场上收缴到的黄的军装上佩戴的胸章，胸章上写“黄百韬，5941，三十七年度用，戡字第一号”。这胸章自然是黄的名字的有力证据。于是《毛泽东选集》第2版将“黄伯韬”改为“黄百韬”。^①此外，《孰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的两处“黄伯韬”，也改为“黄百韬”。^②此外，我们也可以实地考察的结果校文献，很多文献中记载不清的问题可以通过实地考察验证。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过程中，发现当年毛泽东在编辑《农村调查》时，处于战争环境，一些调查材料不能核实，书中难免有一些错漏。为查缺补漏，他们学习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沿着毛泽东当年进行农村调查的足迹，访问了位于赣江两岸武夷山区的寻乌、兴国、吉安、吉水、上杭等县市，向35个单位和14户家庭作了调查，召开了8次座谈会，并作了多次个别访问。这次实地考察历时51天，行程近5000里，总共核对了800多处，搜集和整理了3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③在此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关于人名与地名的核实与订正工作。在原文档中，由于查核不清，出现“×某”的字样，这一次他们做了修正。对于《兴国调查》中有一个乡的地名，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有两种写法：“侯迺”和“候迺”。他们在南昌查阅了江西省测绘局保存的30年代的兴国县地图，还在兴国县城做了调查，发现这个地名也有写作“猴迺”的。后来他们又到当地察看和调查，在一位老红军的家里，请几位老人开了一次座谈会。据他们说，那里地处丘陵地带，过去交通闭塞，山路狭隘，常有猴子出没在窄小的山路上，故称“猴迺”。这样，就将正文中的“侯迺”和“候迺”订正为“猴迺”。^④这说明，有些以文献校文献搞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去核实验证。

实事求是搜集文献的各种版本，搜集的版本越多越好。不能根据主观判断、个人的偏爱来评定优劣，要通过校勘来判定版本的优劣、主次。在校勘过程中发现异同之处，要做一些查考，查考的内容要多、范围要广，多查资料，多请教专家。对于不能判断是非之处，存疑俟考。对于诸说并存之情况，可以将诸说都做一介绍，并说明尚不能判断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查考。校勘不仅要求做到订正文献资料中原有的错误，而且应该在编撰、利用史料时不再发生新的错误。因为作为历史资料，发生任何方面的错误，都会歪曲历史的真实。如，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21页上的《〈劳动者〉发刊词》，其中有一句“……财主是享福快活的，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的是锦绣绛罗，食的是山珍海味”错”。在这段话中，海字之后加了一明显

① 参见周一平：《关于中共党史校勘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1）。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辑记事》，见《编辑杂谈》，第3集，74~75页。

③ 参见上书，78~79页。



错别字更正号，号中写了一个“味”字。这是编者说明原文把“山珍海味”错写成了“山珍海错”，故此加以更正。其实不然，《〈劳动者〉发刊词》原文之“山珍海错”一词并没有用错。“海错”是指种类繁多的海中产物，后来人们习惯地称为“山珍海味”。编者认为这是个错字，并将“错”字改成了“味”字，这就弄巧成拙了。1979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直接把原文中的“错”字去掉，代之以“味”字。试想再过若干年后，假如《劳动者》杂志佚失了，研究者直接引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上的发刊词，就以讹传讹了。^①

第四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编辑

中共党史史料的编辑始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中共中央编辑了《两条路线》、《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文献集。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办公厅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宣传部陆续编辑了活页式《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部分党校、高校还编印了一些供内部使用的党史、革命史资料集，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内部也编印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等。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两个回忆录系列。还有一些与中共党史研究有关的现代史资料汇编，如“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等等。所有这些，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的基本格局。“文化大革命”后，中共党史资料编辑工作陷入停顿。1980年以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中共党史资料编辑工作活跃起来，一般分为两类，即史料汇编与史料长编。下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党史史料编辑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史料汇编

史料汇编即按性质分门别类地整理史料，可分为综合性史料汇编与专题史料汇编。综合性史料汇编包括类书、丛书等。选列如下：

《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① 参见郭军丽：《党史文献学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2）。



《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1947）》，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未公开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

《西安事变资料》（“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第1、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王健英编，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百团大战史料》（“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何理、王瑞清、刘威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2；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4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6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8、9、10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1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收录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共3年多的文件，是历史转折时期高层决策的重要历史文本。此后，编辑出版党的文件成为一项常态性工作，迄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推出从《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到《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六套文献集。这六套文献集，连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构成了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文献大型系列。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文集的整理和公布，打开了崭新的局面。由只整理、公布毛泽东一人的，到整理、公布党的领导集体的，由只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延伸到“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并日趋丰富和完整。如毛泽东的著作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主要著作集有《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年谱》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专题性著作，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邓小平军事文集》等也陆续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大型史料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7册），收录了从1921年建党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55年的党的文献，总计2500余万字，为研究者广泛采用，迄今仍是必备史料书。

二、史料长编

史料长编即按照史料时间先后顺序汇编成编。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一般是大事记长编与人物年谱长编，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大事记长编的形式，就是按年月日的系统整理史料，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一个历史时期作大事记长编，也可以选择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件作大事记长编。长编的编写可以在史料大体齐备以后，一次完成，然后再修改补充，也可以把一个大事记长编分成若干段落，分段完成，然后再修改合编。目前，中共党史大事记是党史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担负着存史、修史的重要使命。各级党史部门形成了大事记征编制度，系统全面准确地反映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情况，以利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与编撰。

年谱是人物传记的一种形式，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如果记事详明可言，不仅可以作为了解其人其事的主要依据，也是研究谱主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可贵材料。年谱长编是年谱成书以前的半成品，也可以独立成书。年谱能保存较多史料，可把年谱长编作为整理史料的一种形式。因为年谱长编篇幅大，资料可以照录原文或仅加删节，不必改写，又能详细注明出处，可以为今后的科研和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就中共党史学界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共党史人物年谱几乎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局面出现了改变，中共党史人物年谱经历了从无到有日渐增多的过程，这体现了社会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巨大进步。中共党史人物年谱按照谱主身份分类，有政治人物、军事人物、学者和文学艺术家等。中共党史人物首先是政治人物，但他们有不同的知识背景，革命工作重心和主要战斗领域也不一样，因此年谱内容各具特色，政治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年谱内容重在谱主的政治生涯，军事人物如朱德、彭德怀等的年谱重在谱主的军事生涯、战争经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文学艺术家如冯雪峰、郭沫若等，他们的年谱结合革命经历主要罗列谱主的文学创作、学术发展等思想进路。当然，对于在多个领域都有重要表现的中共党史人物也有专题年谱编撰，如关于毛泽东就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和《毛泽东经济年谱》，邓小平则有《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以及《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等。中共党史官方机构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各地方中共党史研究室等机构，它们在中共党史人物年谱编撰中起了很大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方机构编撰年谱选列如下：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增补修订后于200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分3卷再版）；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力平、马芷荪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逢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005年修订再版）；

《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刘少奇年谱（1898—1969）》，刘崇文、陈绍畴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张闻天年谱（1935—1938）》，张培森主编、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张闻天年谱（1900—1976）》，张培森主编、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陈云年谱（1905—1995）》，朱佳木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冷溶、汪作玲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科学技术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陈丕显年谱（1916—1995）》，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还有中共党史研究者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年谱，例如：

《瞿秋白年谱》，周永祥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瞿秋白年谱长编》，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张国焘年谱及言论》，盛仁学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王明年谱》，周国全、郭德宏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张大雷年谱》，刘玉珊等主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彭雪枫年谱》，冯文纲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张云逸年谱》，李晓光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恽代英年谱》，李良明、钟镇涛主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于2011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这两部文献，与2010年出版的《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思想年编系列。



《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形式，通过翔实的历史文献和当代文献，系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这两部文献合在一起，形成了反映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大事记系列。

和一般中共党史研究者编撰相比，官方党史机构编撰年谱采取集体组织、分工协作撰写的方式。编撰年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资料搜集工作非要数年之久不能完成，中共党史上的重要领导人因为频繁的政治活动，生平资料极为丰富，要想尽量收齐收全，集体协作的确是非常好的方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年谱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很好地完成应当归功于集体力量。相比之下，中共党史研究者个人编撰年谱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绝大多数研究者是在研究某个党史人物数年乃至十数年，不断积累资料，发表大量成果以后，最后才做年谱编撰工作的，如徐则浩研究王稼祥，先后出版了《王稼祥研究论集》和《王稼祥传》等著作，数年后再有《王稼祥年谱》的出版。

事实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党史权威部门在编订党和国家领导人年谱时是带有公布档案文献以订正历史史实的目的的。这些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活动记载都形成档案资料保存在档案馆，其中有的尚未解密，一般研究者无法得阅，有的已经解密，学者也很难做到全面检阅。官方党史机构的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党史上尚未解密的档案，在编订领导人年谱时通过集体力量全面查阅档案，编订的年谱史料价值就很高。如《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出版说明”明确该年谱的编撰是大量使用和发表档案材料，去澄清一些出版物中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的失实记载，目的很明确。总之，我们应充分重视年谱的史料价值。

对于个体研究者来说，在积累了大量的史料以后，采取哪种形式对史料进行编辑，一般根据课题的情况来自由编订，可以专题内容来进行分类编辑，做成史料汇编，也可以时间顺序来编辑，做成史料长编。

第五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考证

一、考证的必要性

考证又称考据，在广集史料的基础上，辨别史料形成的时间、地点、作者、来源，分析史料记载的确切含义、价值、真实程度和记载人的可信程度。“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① 史料的伪误从根本上决定了考证的必要性。因为“无论作任何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①。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②如果“史学家自诩识见宏远，不屑于琐碎的史料考证，是虚置自己于空中楼阁之上。没有卓越的史学家，不将考证史料，视作分内之事”^③。

史料产生伪误的情况比较复杂，有记录时的讹误，也有流传中的讹误，甚至还存在着大量有意作伪的史料。各种类型的史料都可能存在着伪误，即便真实性是回忆录的基本特性，也很难避免差误。吴玉章曾说过：“人们的记忆是可能发生差误的。关于一件事情，几个人的回忆就往往不一致。这固然可能是各人记住一方面，但事隔多年，也可能有人把事情记错了。因此，对于回忆录资料和对文字资料一样，也应加以分析，因为其中有可靠的，也有不可靠甚至完全错误的。”^④美国学者周策纵在研究五四运动时曾深有体会，他说：“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的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特别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非初料所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重畸轻，或无中生有，或抹杀事实，或夸张减料，抹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我看过许多当下和后来的报道或回忆，也认识接触过许多当时的人物，自然大多数是善意者、诚实人，可是多不免‘前后异辞’。而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采用当时的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却不得不审慎怀疑。”^⑤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曾对中共党史学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的研究上提出批评道：“以中国为主，世界上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数量非常多，以成立史为对象的专著有二十多部，至于发表文章则达两千五百多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中共成立史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具体人物的行踪和几乎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都得到了考证。如果以研究工作的劳动效率观之，对中共成立史这一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幕所投入的研究量之大，是不同寻常的。既然已经有了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还要再写这部书呢？那是因为这些研究并没有弄清中共成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或者说，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比如，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40页。

③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168页。

④ 吴玉章：《在武汉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光明日报》，1980-10-20。

⑤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0-11页。



的各种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共产党、革命局等）到底是何种组织？何时成立？相互间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目前还仅是根据回忆录等进行各种猜测。因为每一个事件都应经过研究考证，在描述中共成立史的时候，更必须加以细致的、有时是琐碎的甄别。”^①但“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②。他的意图是“通过本书颇为正规而认真的研究，给每每自我封闭的中共党史研究以良好的刺激”^③。石川祯浩的批评虽有其偏颇之处，但也点出了当前中共党史学界存在的不重视考证的弊病。的确如此，学界有些研究者鄙薄考证，以为不需要也不应该对已“定论”的观点和史实进行必要的考证，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而习惯于以某种“定论”作为其“治学”依据。

其实，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叙事中，不少陈陈相因的说法是需要考实的。有学者指出，在写开国盛事的各种历史特写、纪实文学之中，乃至出现在一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之中，常常这样记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实际上，这在历史细节上是不完全准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告的？“准确地说，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的。在时间上，有这样一个过程：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开幕词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名言而为全中国人所铭记。开幕词中就有：‘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九月二十九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起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就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九月三十日通过的会议《宣言》，郑重地写道：‘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一天的闭幕式中，朱德致闭幕词，说：‘我们全体一致，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史称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按开国大典的程序，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升国旗，同时奏《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然后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中又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业已集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④显然毛泽东没有在开国大典上说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是在9月21日，即开国大典之前10天的政协会议上说的。而且在政协开幕会上说的，原话是“占人类总

①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6—7页。

② 同上书，432页。

③ 同上书，434页。

④ 龚育之：《开国盛事的三个细节》，见《党史札记》，17—18页。



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不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那样两句话，就历史细节来说，当然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就历史实质来说呢，这种描写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事的几个情节浓缩到一个场景上来了。”^①但是历史著作还是需要忠于历史事实，包括它的细节。而且“除了时间和场合的细节以外，还有一个细节的出入，就是语言的细节。毛泽东说的究竟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还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人民政协开幕词中的原话，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篇讲话时，给原本没有另外标题的开幕词拟了一个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中，这一篇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的，也用了这样的标题。这样做标题，准确不准确？不够准确，因为这不是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的原话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民’。原话的说法有它的深刻含义，强调的是民族立场，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这在开幕词同一段的另一句原话中得到印证。那句原话是：‘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负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新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收了这篇开幕词，也给另外拟了标题，新拟的标题用的是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代替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所拟的那个标题”^②。一件大事，两句名言，长期相传的说法都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共党史学亦是实证科学，离开实证，离开历史真实面貌，再高妙的理论观点也只能束之高阁。我们应该在实证方面，下更大力气，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注入活力。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若干事实的问题做了辨伪，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二、考证的分类与范畴

考证一般分为外形考证与内容考证两类形式。外形考证简称外考证（external criticism），主要是考证史料的来源、产生时代、地点和制作人等方面的内容。也有学者将版本的鉴别与校勘、辨伪等工作归属外考证的范畴。就方法论而言，校勘实质上就是考证，西方学术界对二者没有名目的区分。内容考证简称内考证（internal criticism），主要是考证史料记载的确切含义、价值、真实程度和记载人的可信程度等方面的内容。

考证史料的制作人是谁，属于外考证的范围，但史料记载人的可信程度决定了史料本身的真实程度，则属于内考证的范畴。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较为常见。很多中共党史文献和著述，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不仅日期未标定，而且有的作者未署姓名，有的是用笔名、别号、化名，还有一些是出于同姓同名人物之手笔，不弄清这些作者的真实姓名、身份，就会对中共党史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如1932年《红旗周报》第32期署名“仲”的《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是一篇总结工人罢工斗争经验教训的好材料。

① 龚育之：《开国盛事的三个细节》，见《党史札记》，18页。

② 同上书，19页。



但“仲”到底是谁，中共党史学界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仲丹（张浩），一说是仲甫（陈独秀），还有的认为是仲篪（刘少奇），对此，马济彬根据兵工厂的所在地以及这几个人当时活动的地点，并考查了文章的思想观点、行文的语言习惯等，最后确认是刘少奇曾用笔名仲篪所写。现在这篇文章被收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一书中。^①再如，曾经担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的袁振英与曾任《劳动周刊》编辑的李震瀛，都用“震瀛”的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故此常有人把二者混同。《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发表的肖姓的考证文章，对二人的活动情况以及文章的写作特点等作了研究比较，指出袁振英主要是发表译著，而且时间是在建党以前，李震瀛则主要发表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时间都是在建党以后。这个情况，对于区别二人的著作以及研究他们的革命活动很有参考价值。

因此，对大量佚名文章，或有名无姓，或用笔名、代名、化名以及同姓名作者的考证工作是中共党史文献考证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名本来就较为复杂，一个人除了名以外，还有字、号。而中共党史人名因为经历了地下状态也就更复杂，很多人的笔名、化名都有多个，有的在国外生活过，还有外国名。下面列举毛泽东与陈独秀曾用过的名字，以说明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名字的复杂状况。

毛泽东用过的字号、笔名、别名、化名就有很多，选列如下：润之：字。一作润芝。早年蔡和森等同志和他通信时常以此相称。亦缀作笔名，见署于《天问》、《向导》等刊物。润：笔名，润芝的简署。早年撰文署用，如于《政治周报》撰《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等文。泽东：早年撰文常缀作笔名，以《湘江评论》为较多。其次在《向导》周报撰写论文也时有见署。二十八画生：笔名。1915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写《征友启事》首见署用，并和纵宇一郎（罗章龙早年别名）互相酬答诗篇。1917年在《新青年》3卷2期发表《体育之研究》亦署此名。石山：笔名。1923年7月，于《前锋》第1期发表《省宪下之湖南》署名。后又见于《政治周报》4期，撰《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子任：笔名。1925—1926年，在《政治周报》撰文署用，发表有《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篇，分载于2、3、4各期。泳芝、允溢：笔名或别名。马任、赵东、李得胜、事任：化名。毛奇：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同学们对他的尊称外号。^②

陈独秀的笔名、化名也有很多，选列如下：庆同：家谱名。另有名庆国。干生：原名。考科举和留学日本时均以此名行，从事新文化运动时改名独秀（约在1914年冬）。重甫：初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赴日留学时用，自填学生表格“名陈干生，字重甫”。仲甫：后字。撰著曾署陈仲甫。陈仲：又名。撰文见署于《国粹学报》、《甲寅》杂志诸刊，发表有《说文引伸义考》、《爱国心与自觉》等文。仲山：别号。简署“仲”。《时

^① 参见马济彬：《对一署名“仲”的文章的考证》，载《党史资料通讯》，1987（4）。

^② 参见陈玉堂：《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19—20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5。



事新报》副刊《学灯》有署名“仲”者文章，如《学界的败类》（1919年），是否陈笔，待查考。仲子：别号。亦署熙洲仲子。早期《东方杂志》载有陈仲子署名文章，待考。由己：别号。撰文常署，见之早年的《国民日报》、《警钟日报》、《政艺通报》等报刊。发表有《哭汪希颜》、《赠王微伯东游》、《哭何梅士》等诗文。陈由己：别号。于《苏报》、《民国日报》等撰文署名，发表有《安徽爱国会演说》等。此外，与苏子谷（苏曼殊）合译《惨世界》亦署名陈由己。实庵：号。简署“实”。为《向导》周报写“寸铁”栏短文常署。独秀：常用作笔名。见于《甲寅》、《新青年》、《向导》周报等刊。独秀山民：别号。因家乡有独秀山，故号。曾于《甲寅》杂志1卷4期，发表《〈双桢记〉叙》署用。秀：笔名。《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外交失败声中的怪现象》署名。按：此文疑是陈独秀写，待再考。山民：别署。三爱：笔名。多用于1904—1905出版的《安徽俗话报》撰写通俗短论署名，前后发表不同题材文章四五十篇。其中第11期上发表的《论戏曲》一文，后在《新小说》杂志第14期上再次刊载。只眼：笔名。常于《每周评论》撰文署用。发表有《我的国内和平意见》、《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评论之评论：孔教研究》，等等。顽石：笔名。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曾创办过一个《热潮》周刊，撰文署名顽石，他在辛亥革命期间撰文亦曾署名顽石，如于《时事新报月刊》（1911年第1号）、《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第1号）、《中国实业杂志》（1913年第7期），先后发表有《女学之必要》、《禁米出口问题》、《信浓丸中逢涛痕君赋此以呈》等诗文。撒翁：笔名。大革命失败后，于《布尔塞维克》杂志专写“寸铁”之类短文，发表有《不进则退》、《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等百数十篇。另外还有一些为掩护身份而用的化名，如王坦甫、高坦甫、看云楼等。还有英文笔名CC，编著《英文教科书》署名，191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又见署于《甲寅》杂志，发表《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英文笔名T.S.，见于《共产党》月刊第5期和《新青年》7卷2期，发表《告劳动》和《人口论底学说变迁》等。^①

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涉及很多外国人物，这又增加了人名的复杂性。如恩格斯，有的文献作“安格尔斯”、“安克思”。列宁，有的文献上作“里宁”、“李宁”等。又如维经斯基，他的名字在中共党史文献中有多种汉译法：魏金斯基、威金斯基、维丁斯基、威经斯基、维丁司克、魏琴斯克等。还有中国名字吴廷康，但有时书写作伍廷康、吴庭康。^② 这些外国人名，不下工夫研究、查考，也容易出差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方面的考证是卓有成效的。陈玉堂《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1985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由张静如等编著的《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这两部著作对研究现代史、党史人物的笔名、别名来说是很好的工具书。

^① 参见陈玉堂：《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89—90页。

^② 参见上书，190页。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还有一种情况必须下大力气进行考证。史料是真实的，但该史料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却不一定是真实的，史料制作人出于某些需要，故意作伪。如八七会议是在汉口召开的，可是当时为了迷惑敌人，避免破坏和损失，一些文件故意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信以为真，拿来就用，可能就会产生史料运用的“硬伤”。

胡绳曾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谈话时，特别强调要搞清一些基本的史实：“二大宣言是苏联人写的还是中国人写的？共产国际有些人来中国，他们来干什么的？有些会议文件是不是他们写的？二大宣言有些话与陈独秀的文章吻合。这个事情要搞清楚。我们知道共产国际派代表团参加了一些会议。国民党一大是他们包办的。我们党的‘八七’会议的文件也是共产国际参加起草的。四中全会更彻底是共产国际搞的了，文件是外国人写的。这个要鉴别一下，看看是什么人的笔迹，查一查文件上有没有记载。”^① 这些问题属于中共党史上的基本问题，是需要下大力气来做实的。

三、考证的基本方法

关于考证的方法，前辈史家多有积累。梁启超就根据自己的治史经验，提出了十二种方法^②：

- (1)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 (2) 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今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 (3) 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 (4) 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 (5)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 (6)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部分伪。
- (7)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 (8)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 (9)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 (10) 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作伪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 (11) 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 (12) 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

^① 胡乔木：《党史应拿出权威性的材料，要有些新东西》（1987年6月12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52～253页。

^②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第7册，4131～4133页。



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以上十二法，举孤证、互证、他证、反证、理证等，基本概括了如何辨伪考证的各方面内容，值得今人认真借鉴。陈垣擅长历史考证，他的惯常经验是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稀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对史料的占有，他提倡“竭泽而渔”，意思是不要漏掉一条材料。^① 所以他的文章“使人感触最深的是无一语虚设，每考证一人一事最重年代时间，每举一书必罗众本，详考各本同异，定夺是非，从中发现问题。所论穷原竟委，如剥笋，如抽茧，无不从根本中来，示人以规范”^②。以下结合中共党史史料的考证状况来具体论述考证的基本方法。

（一）孤证，“孤证不立”

孤证，即单个孤立存在的、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的史料。史学研究在论断问题时要提供多方例证，持之有故，追本溯源，而非轻率独断，言之方能成理。梁启超总结顾炎武的治学之道，除“贵创”、“致用”外，就是他研究时的“博证”。梁启超推崇朴学家说：“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③ 在学术研究中，孤证通常难以服从，以孤证而执定论是学术独断。清代朴学强调信而有证、孤证不立，戴震说研究要达到“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其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④。对孤立的史料不能轻易相信。中共党史界对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一直众说纷纭，也是缺乏能够互证的史料所致，大致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说等观点。黄修荣在对相关史料考证后，认为8月5日闭幕的可能性最大。理由是7月31日过于仓促，来不及准备。8月1日午后五时许，嘉兴南湖狂风大作，避暑游船被风吹覆四五艘，溺毙三人。而王会悟回忆，闭幕之日五六点钟时“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其他代表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及湖中风波，可见会议进行时未遇狂风。由此可以判断，8月1日闭幕说不能成立。8月1日因风灾南湖船覆人亡，次日应在善后，王会悟来租船不可能不闻其事，能否租到船亦成疑问。故8月2日闭幕说亦难成立。而王相箴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订》一文中，通过对几位一大参加者回忆的分析，特别是对一大代表陈公博行止的排查，确定会议在8月3日前已结束。而7月31日因来不及，8月1日风起南湖时代表们并没有在船上开会，斯穆尔斯基的信并没有说

^① 参见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诞生百年纪念》，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99页。

^② 周祖谟：《怀念一代宗师履庵先生》，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161~162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1~1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④ 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见《戴东原集》，第2卷，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月5日开南湖会议，而会议确是在南湖的船上闭幕的，因此他断定，一大闭幕日期为8月2日。

但也有无证不信之说，这是讲对史料要持辩证的态度，是说任何史料都不能轻易否定，亦即孤立的史料也可以相信。为什么孤证不信呢？因为任何社会活动总要涉及方方面面，涉及许多人和事，如果是孤证，那么，仅此一说别无佐证，很难确认。为什么无证不信呢？因为史料肯定是某种历史过程的遗留，因此很可能事出有因，即使查无实据，也不应轻易排除。在利用史料的时候，对于孤证，正确的方法是不可轻信，不可不用。两者统一的前提是分清是什么性质的孤证，关于什么问题的孤证，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孤证。在排除了明显伪证的前提下，可以大胆利用，但在下结论时，应注意留有余地。

（二）互证

互证即指利用不同类型的材料互相印证，包括文证、人证、物证。除了利用来源不同的文献材料互相比较以外，还指可以包括请本人、其他当事者、亲属核实的人证，用实物来考证，等等。

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旨在改变中共成立史研究偏重回忆录的研究方法”，“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①，在此过程中，他查明了一系列我们所不了解的史料，如，1920年8月，闻名遐迩的《新青年》杂志改刊，但其封面图案竟是取材于美国社会党的党徽，而理论来源则出自美国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主办的《苏维埃·俄罗斯》。1920年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译自欧美的社会主义刊物、文献的文章也占了很大比重，封面设计与英国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党刊（*The Communist*）极为相似。

对“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辨伪，陈云作为重要的当事者提供了有力的见证。“文化大革命”时期，由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特务机关编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曾被江青用来作为攻击周恩来的炮弹。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中共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中共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中共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国民党当局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1931年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又在1932年2月间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

^① [日]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433页。



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那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对这一阴谋毫无所闻。但中共江苏省委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印发传单，临时中央通过在报上发表“给伍豪先生的复信”等办法，对此给予了及时揭露。中央特别行动科用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紧急启事，说他早已停止使用“伍豪”这个名字，凡用“伍豪”之名刊登启事者均属假冒，从而间接对所谓的“伍豪启事”进行了辟谣。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又以此大做文章，周恩来当即给予驳斥，指出其纯系敌人伪造。但他对当年地下党进行辟谣的情况也说得很不清楚，便打电话向陈云。陈云那时虽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但已离开中央特别行动科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因此只知道这是敌人造谣，并不清楚辟谣的具体经过，而且过去也没有把这个假启事当回事。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江青以此攻击周恩来的企图未能得逞。1972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那时他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他与康生同志，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他说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他又专门写了一个书面发言以再次证实“伍豪启事”是国民党的阴谋。会后，中央就此问题发了文件，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根据陈云的意见，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一文，并附了大量历史材料，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伍豪启事”完全出自敌人之手。^①

互证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反映同一史实的来源不同的史料。同一类型的材料可以互证，不同类型的材料也可以互证。

一般来说，同类资料具有连续性，某件事情某报可能有连续报道，或者几家报纸都有报道，某事的诸涉事者都有回忆录或都有记忆，档案中有关于某事的系列文件等，这就为它们的互相证明提供了可能。我们就可以以回忆录证明回忆录，以报刊资料证明报刊资料，以档案资料证明档案资料，而且档案中的系列材料还能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互相印证，提供更准确的答案。如考证中共一大的参加人方面，不少回忆录都是可以印证的。包惠僧提供了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是否可信呢？不少出席一大的人都回忆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因此，包惠僧的回忆录就有价值。还有，关于陈公博参加中共一大的问题，有回忆录说，陈公博参加过中共一大，但由于旅社内隔壁房间发生凶案，所以偕妻离沪，最后一天会议没有参加。这个说法是否可靠？经查上海当时报纸，确系事实，不仅证明了回忆录的可信，并且为考定一大结束的时间增加了依据。陈公博在其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提出一个材料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人

^① 参见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讲党史》，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4）。



数是12人。但概观各种回忆录，出席中共一大的都应该是13人。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对这一说法进行考证，也解释了目前关于一大代表人数资料的矛盾之处。他认为，中共党史学界由于对包惠僧参加会议的资格解释不同或对何叔衡是否参加会议的认定不同，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问题出现了12人和13人之争。但他认为“包惠僧是指派代表”、“何叔衡未出席大会”的说法都理由不足。作者认为日本学者蜂屋亮子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一文中提出了观点有说服力。蜂屋亮子提出由于陈公博中途离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就把他排除在外，而且陈公博在硕士论文中也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而且陈公博也有可能记错数字。这可视为一说。

不同类型的材料能够互相印证就更有说服力，可利用报刊资料证明回忆录或档案，利用档案证明报刊或回忆录，利用档案、报刊、回忆录证明其他资料。彭明在研究五四运动史时，比较重视当时的报刊资料，但他认为：“报刊资料是重要的历史资料，但并非都是可靠的资料，因它总带有一定的宣传性质。由于各自的立场、角度、动机和时机的不同，报道混乱以致失真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还得靠档案资料才能解决问题。如5月4日当天游行人数问题，李大钊在北大的任教时间问题，等等，都是靠档案资料才弄清楚的。”^①又如，“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这件事，许多参加者都回忆说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宅时，曹汝霖事先闻讯逃跑了。但是曹汝霖却回忆说他没有跑，他说：‘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屋（箱子间），‘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当学生‘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曹本人的这段回忆，应该说是实情。学生没有找到曹，因此估计他事先逃跑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合事实的。由此可见，我们对一切资料，都要具体分析，进行由此及彼的比较研究，来判断事实的真相”^②。

（三）旁证或他证

旁证或他证，即利用本书以外的资料作为依据，对某一史事加以他证或补证，达到考订史事的目的。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如果一个历史论断只有一项证据支持，而没有旁证，则该项论断不能成立。

为论证俘获蒋介石的时间，杨奎松查证一些参加捉蒋行动将士的回忆录，蒋介石的警卫、贴身侍卫以及蒋介石本人的《西安半月记》等，认为蒋介石被找到的时间是在上午7点半以后。孙铭九（张学良卫队营二营营长）、王玉璜（卫队营一营营长）均回忆，攻击华清池行动结束后天已渐明，蒋介石尚未找到。“直到天色即将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物了”，部队才大举搜山。蒋介石贴身侍卫蒋孝镇事变后不久说，当他和蒋介石逃出华清池

^① 彭明：《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见《彭明文存》，49页。

^② 同上书，54页。



登上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熹微”，而后搜山部队几次经过二人藏身之地均未发现。^①他又遍查关于部队行动时间大大提前的说法，大都出自几十年后事变亲历者的回忆。如卢广绩、宋文梅、赵寿山、常国宾、王玉瓚、唐君尧等事变当事人的回忆，均说事变发生于凌晨四五点钟左右。^②但是研究者如果不重视事变发生当时的文献和事变刚刚发生后一些当事人的记述，便会轻信那些事隔几十年的回忆，作出错误的判断。卫士蒋尧祥当时在华清池蒋介石寝室外担任警卫。他在事变后由西安返回南京即向上峰写出书面报告，称：当日上午6点至8点，他与卫士翁自勉为蒋介石寝室外卫兵。“当事变发生时，系六时二十分左右。初闻汽车开动之声，未几啪啪之枪声破空而起”^③。他奉命跑到下面查看，见到东北军冲入华清池院内。可知，东北军攻击华清池的时间当在6点以后，而非在此之前。蒋孝镇说他和蒋介石爬到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熹微”。从华清池后墙越出，爬到蒋介石藏身处，距离约一华里左右。那么短的距离，又急于逃命，虽天黑无路，行动不快，但总不至于要爬两三个小时才到。事实是：事变发生时是早6点多，蒋介石与卫士翻墙越出，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爬到骊山半山腰，这时7点多“天正黎明，晨光熹微”。蒋介石当时的证述，也可印证上述情况。蒋在事变后不久出版的《西安半月记》按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事变过程的亲身经历。其成文故可断定已经过事后修润加工，但其基础仍为蒋当时之日记应为不虚，其记述之一般经过因无损于蒋本人形象则无须捏造，加上此作为事变后即行发表之文件，自然要比其他当事人几十年后的回忆更为可信。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他凌晨5点半听到行辕大门前有枪声，这时他已完成床上运动，正在披衣。根据蒋介石的侍从官们介绍，蒋介石向有早起习惯，且极为守时，晚年通常在凌晨6点之前即起床。由此可证《西安半月记》所说时间之可信。蒋介石所记时间与前述蒋尧祥所记时间前后虽相差一小时，但相同者均在6点前后。^④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还说，他从华清池出来，行约半小时，藏身在骊山东隅半山腰一岩穴内，直到天已渐明尚未见有搜山行动，至天大亮约9时许始见东北军四出搜索，很快被发现送往西安。

（四）反证

反证即举出有力的反证，以判断是非。梁启超把反证法形象地比喻为“以矛陷盾”。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中以注释的形式对刘鼎自述发表时间进行了缜密考证：

可以看到的刘鼎谈论这一情况的资料分别有两件，一件是刘鼎《谈西安事变》，一件是张魁堂根据刘鼎70年代末自己记述的西安事变追记笔记所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在这两次谈话和记述中，刘鼎自己关于这一情况的说法就大有出

^① 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3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② 参见上书，315~316页。

^③ 参见上书，318页。

^④ 参见上书，317~318页。



入。在谈话中，刘鼎肯定地说，张学良是在12月12日零时告诉他要发动事变的消息的，他当时即赶回去给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在笔记中，刘却说，张学良告诉他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的报，“凌晨2点多，彭绍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略去这里的12点（零点）和12点已过这个细节不论，上述两种说法中仍有相当的矛盾。其一，谈话中刘鼎提到的发报机是自己的，故有回去发报和发现没有电池一说，而笔记中所提到的发报机则是在张学良处，因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停电和没有电池要自己去买电池一说。但同时，笔记中的说法又自相矛盾，因其所说“彭绍坤接通了中共中央的电台”指的又是自己的发报机和报务员，并不是在张学良处。后面更明确讲：“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似乎张学良自己并无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张学良的电报都是通过刘鼎发的。显然，这完全不合事实。其二，讲话中讲得很肯定，即强调张学良告诉他之后，因没有电池，他专门由金家巷跑到南院门去买电池，回来时蒋介石已被抓到了。这一来一回花了多少时间呢？也就是说，当他将张学良告诉他的消息发出去的时候是凌晨几点钟呢？据他在谈话中讲，蒋抓到时是“天已大亮，8点多钟”。即是说，他零点得到消息，因没有电池，从金家巷跑到南院门去买电池，来回用了将近8个小时之久，回来时蒋已抓到，天已大亮。而在笔记中，他却告诉人们说，他并没有去买电池，因此零点以后得到消息，即开始发报，接通中共中央电台时是深夜2点多（《西安事变简史》则进一步肯定其为“2点30分”），此时自然尚未抓到蒋介石。此两说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事实其实很清楚，张学良和刘鼎当时各有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张用不着通过刘的电台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的决定。张之所以通知刘鼎此一消息，只是因为刘鼎这时还是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员，有必要在正式行动之时将此消息通知刘鼎，这并非是非张自己不能通报而需要通过刘鼎来通报的缘故。同样，既然张学良自己有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他也绝不会在正式行动5个小时以前即通知刘鼎，让刘鼎先发报，而自己反而要等到四五时再发报。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与刘鼎均与中共中央有约定的通报时间，刘鼎回忆所称的种种时间，都不是约定的通报时间，在他所回忆的零点、半夜2点多或其他时间，事实上是不可能通报的。^①

根据以上分析，《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一书认定，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完全是在张学良、杨虎城预定的计划和指挥之下实施的。在东北军和十七

^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320页。



路军各部队开始分别向预定目标运动之后，即凌晨5时左右，张学良首先用自己的“双台”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的消息，同时也通知了刘鼎，刘鼎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用自己的“坤台”向中共中央报告。之后，各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并在清晨6点左右开始突击。

（五）理证

理证即以学理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梁启超又称之为“高度的推论法”，主要是正确运用逻辑推理，达到考证出史实真伪的目的。

对于西安事变爆发的确切时间，有学者认为，张学良与杨虎城事先规定的统一行动时间是12月12日凌晨6点，而部队实际行动时间远比规定时间提前两三个小时之多，这个说法在学界流传很广。如，张魁堂著《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明确认为，“3点40分，扣蒋部队进入华清池，二道门卫兵抵抗，被击倒……战斗不到半小时即行结束”^①。蒋介石越墙逃出，经部队搜索从骊山半山腰虎啸石后将蒋找到，“这时不到5点钟”^②。其主要根据是后来发表的当天凌晨张学良（化名李毅）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发报时间署为“文寅”。“文寅”即发电时间代号，“文”为12日，“寅”为凌晨3点到5点。此电既然拍发时间为3点到5点之间，又有“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字样，人们自可由此得出结论：部队行动时间最晚不超过清晨4点，俘蒋时间必在5点结束。

但是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一书中指出，仅凭此电还不足以断定张发电时蒋已被俘获，他层层推理，指出：“难道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张学良当时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算，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行动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即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能成功？很明显，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恐怕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点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③他指出以下几点，一是根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测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存在着一种误解，发报时间与部队攻击时间是两码事。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电台约定的守听时间是一日三次：凌晨5点、下午1点、晚上9点。因此，张学良凌晨5点发电只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对即将成功的事变预作通报而已，而非表示事变已经取得成功。“文寅”电的那个“寅”在此只能认定是凌晨5点。二是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遥，又栖身于石穴草庵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用去相当时间，再上山四处搜寻隐匿的蒋介石，亦需用去相当时间。山中无路，夜色漆黑，部队不是用很少时间就可

^① 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17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同上书，181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312页。



以发现蒋的藏身之处的。三是当时参加捉蒋行动的东北军也都清楚地记得，攻击行动结束后，天已渐明，蒋介石仍没找到。四是刘鼎 12 日同样于凌晨 5 点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意图俘虏”即尚未成为现实，可证张学良的“文寅”电只是预报罢了。当天找到蒋介石后及晚上 9 点，张学良再电中共中央称：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可证捉蒋部队统一行动时间是张杨事先确定的清晨 6 点，凌晨 5 点发报时，部队行动刚刚开始。电报所说已将蒋介石等全部俘虏，是强调事变发动一切顺利。故此电可以理解为，除蒋介石外，全部中央人员都是在清晨 6 点的统一行动中被俘的。因此，杨奎松认为：完全可以推断并没有所谓预定 12 日 6 点共同行动，而实际行动时间意外提前情况存在。^①

文献的考证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单一的考证方法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数的文献考证，需要综合使用多种方法。如陈铁健对《多余的话》真伪的考证就是通过多种方法验定的。

《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临终前的遗作，问世以来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其间充满晦涩、悲观、消沉的语句，令人倍感困惑。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初，约 30 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等，大抵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国民党方面篡改过的。臧克家在 1950 年曾撰写《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一文，认为瞿秋白在狱中所写诗词等“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它们对于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侮辱！这些东西决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它是敌人埋伏的暗箭，向一个他死后的‘敌人’射击”。文中还提到“杜静、萧三两同志在《瞿秋白同志传》（见《烈士传》四十七页）上说：‘……在秋白死难以后，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各报所发表者，多非原稿，有些信札文件，显系敌人所伪造，故意投寄各报，以中伤秋白同志……’”^②《人民日报》同日同版还刊出杨之华的来信，赞同臧克家的意见，认为“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等等，蒋匪的爪牙从新闻记者的手中抢回去，说是未经审阅的东西不准拿出去。所谓‘审阅’，就是不准暴露真实的事实，为要侮辱共产党人不屈的气节而修改秋白在狱中的作品”，就是因为秋白拒绝了挑拨离间的劝降手段，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修改了秋白在狱中的作品，并发表在反动报纸上。^③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也曾认为《多余的话》是假的。他说：“《多余的话》，我在延安时，就从国民党的报刊上看见了。李克农同志曾问过我，有人要把《多余的话》的真迹卖给我们，我们买不买？我当时说，这是国民党用来瓦解我们党的，因此决定不买。”对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及狱中诗，否定是瞿秋白所作的理由大都是从敌对斗争的一般特点上，确定敌人的篡改。

① 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謎》，312～317页。

② 臧克家：《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载《人民日报》，1950—07—18。

③ 参见《杨之华同志来信》，载《人民日报》，1950—07—18。



《多余的话》到底是不是瞿秋白的遗作，为此陈铁健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和调查，认为确为瞿秋白的手迹：“《多余的话》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①陈铁健主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瞿秋白从被俘到被认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瞿秋白，一直在用一些虚假的信息迷惑敌人，并未说出实情半句，借以保护中国共产党，直至最后临终之际完成遗作《多余的话》。尽管这篇文章流露出消沉的情绪，不像一革命的英勇烈士所为，但结合瞿秋白一生的际遇及当时的环境，加之其自身的性格特点，写出这样略带消极语句的文章也情有可原。这是从瞿秋白自身和文的一致性以及经历、个性发展上加以说明的。陈铁健通过查阅中央档案馆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瞿秋白案复查组访问宋希镛谈话记录等大量文献史料、档案史料，对瞿秋白就义后《多余的话》进行跟踪调查。经当时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在瞿秋白就义前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和劝降的宋希镛确认，《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遗作，并未有丝毫改动。对于宋希镛的介绍，陈铁健持肯定意见。他认为：就三十六师大小军官和文职人员，包括中统派来劝降的特工们的文化层次和政治头脑看，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篡改”瞿秋白文章的水平，更不要说可能理解《多余的话》那种凄清伤感、坦荡无忌情怀的深意。^②对于《多余的话》原稿用纸的细节问题，陈铁健也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考证。陈铁健认为根据当时《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于1935年6月4日到三十六师监押所访问瞿秋白所记载，《多余的话》写在一个“黑面本英文练习本”上，这与杨之华在她所写的《回忆秋白》中提到的“黑漆布面本”不谋而合、互相印证。证明当时是有可能瞿秋白把包含着他对妻子情意的黑面本一直带在身边，并把临终的遗作写在上面，寄托对妻子的至爱深情，并期望日后妻子能最终得到《多余的话》的原稿，看到他的最终遗言。

尽管许多人对《多余的话》持怀疑态度，但有两个人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丁玲和周恩来。为了支持自己的论据，陈铁健对这两个人物的有关史料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丁玲说：“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③她是从对瞿秋白为人的了解以及瞿秋白的语言及个性来推断并得出肯定性看法的，由于丁玲和瞿秋白及其第一位妻子王剑虹之间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丁玲对瞿秋白熟悉程度也非其他人所能及，因此，她的话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另外，通过对陆定一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的考证，周恩来也自云看过《多余的话》的真迹得到证实。^④

① 陈铁健：《瞿秋白传》，484页。

② 参见瞿秋白著、陈铁健导读：《多余的话》，15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

③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见《忆秋白》，1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 参见瞿秋白著、陈铁健导读：《多余的话》，19页。



第六节 中共党史史料的运用

了解中共党史史料的类型，以及如何搜集、编辑、校勘、考证史料等是史学研究中最为基础但也是最初级的工作，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还无法提出创造性的观点，如同有了大量的建筑材料不等于建成了房子，还须了解中共党史史料的运用原则以及应注意的技巧。

一、中共党史档案的公布与运用

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档案极其重要，是中共党史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胡乔木在1979年5月曾就《周恩来文集》的编辑问题做了“档案要为党史研究服务”的批示：“我认为这些历史文件只要：经过一定负责机构提出请求并经过审批；经过严格的登记、保存手续，限定阅读、使用范围，并规定严格的保密制度，是可以并应该借阅的。否则党的重要文件如何编辑，党史如何研究？”^①他还认为：“党史上的秘密，经过一定时间，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减少，这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的共同规律。”^②

中央档案机构收集的是全国性的史料，地方档案机构收集的是地区性的史料。以档案馆而言，档案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档案馆3987所，国家综合档案馆有馆藏档案17602万卷（件），多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档案。1986年、1987年国家先后颁布《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确定了县、市档案馆收藏所属立档单位形成的已满10年和20年的档案应分别送交国家档案馆和有关档案馆的规定，收集工作大有进展。中央档案馆以及政府各部门即收集大量新中国成立后重要档案文件。北京档案馆收集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较为完整。据1996年统计，共有179全宗、236391卷，还有录音、录像、影片、照片，率先编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2册，堪称此项工作典范。各省市档案馆亦编有新中国成立后文献选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国家档案局1991年第28号文件限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

^{①②} 胡乔木：《档案要为党史研究服务》（1979年5月26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9页。



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其他延期开放的档案，共20类，最重要的有7类：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作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涉及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政治历史评价、工作和生活，开放会影响其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涉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秘密关系的档案；涉及领土、边界敏感的档案；涉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档案；涉及国内行政区划划分问题的档案；涉及司法、组织部的有关调查资料的档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但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一些党史期刊也在陆续整理公布重要的档案资料。如《百年潮》2001年第12期刊登的《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共9件，弥补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缺漏，对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建立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2~5期连续登载《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介绍了1929年10月至1930年1月的7件档案，对研究共产国际和“立三路线”的关系有重要价值。

如何使用档案问题与看待档案公布问题对中共党史研究来说也至关重要。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不能期望等档案完全解密后再来做研究。事实上这不可能。在现实处境下，中共党史工作者不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档案利用标准，同时学界也不能要求他们的学术工作要广泛地运用档案材料，而是要评判他们的学术研究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就足够了。当然，随着一些档案材料的公布，可能会与自己的一些历史判断不符的情况，也不用求全责备，因为任何历史认识都会存在局限性，只要个人的努力能够为中共党史研究贡献一己之见，有利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他们的学术贡献就应当得到承认和理解。

另外，还须提及的是，要充分利用地方档案。所谓地方档案，包括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地方档案完全可以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学者沈志华在研究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时，就充分利用了吉林、辽宁、福建、内蒙古和新疆等地的档案馆，这几个档案馆保存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从聘请专家的程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等，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资料非常齐全。此外，作者还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京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案馆（室），也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在充分利用这些档案材料的基础上，作



者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基本状况、政策变化以及他们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这些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给予了积极指导和帮助，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给中国人，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后来由于中苏分歧的影响，导致在华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①

民间档案在近些年也开始被重视起来，有学者指出：

民间档案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补官方档案之缺失，避官方规定之限制。官方档案当然有丰富的收藏，但是再丰富也不可能搜罗无遗。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工作人员参加，只有李锐奉彭真之命做了记录，这个记录就成了这两次常委会唯一的文献史料，极具史料价值。1978年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为起草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亲拟提纲，手稿保存在于光远手里，成为考察这个讲话稿形成过程的重要史料。这两个材料都不收藏于官方档案，典型地说明民间收藏对官方档案的补充作用。除了记载高层活动的文献，民间档案更主要的内容，在于记载社会层面的生活，从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到职业生涯、命运遭遇。这个方面的文献恐怕不在官方档案收藏的视野，民间收藏却相当丰富具体细腻，可以为研究社会和民众提供大量具体的史料。在目前官方档案制度限制较多的情况下，研究者假如能把目光转向民间档案的利用，将会打开中共历史、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②

还有一些海外档案的解密，我们应多加以重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密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沈志华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最终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80年历史的认识。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密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在中国方面不开放的条件下，苏联解密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沈志华利用苏联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撰写了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还撰有《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史学界过去对陈独秀诸多的不公正的评价，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传统观念和政治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源于史料

^① 参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1）；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2）。

^② 韩刚：《民间档案和实证研究》，载《北京党史》，2005（4）。



方面的限制。近十多年来，唐宝林等学者在陈独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得益于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的公布。唐宝林正是通过对这批档案的充分利用，提出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无法独立自主地对大革命进行领导、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原则上没有错的新观点，并揭示出陈独秀曾就大革命领导权问题与国民党展开争夺等事实。^①

二、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

史料不等于历史，把搜集整理好的史料放在一起不会自动变成历史，只有史家从分散的零碎的史料中发现了其内在的联系，按照史事本身的逻辑而将它们组织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历史的面目才有可能呈现。在此过程中，作者占有的史料可能就会变成论著中的引文，成为论证的依据。但这是作者深入理解、反复甄选的智慧结晶。在运用史料时，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一）谨慎核查，运用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两个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②因此，选择史料要有精审的态度。努力精选史料，尽量淘汰无关紧要的或事实不准的史料，必须尽可能地使用核心史料和关键史料。所谓核心史料就是最贴近历史活动当时过程的史料，它是说明历史真相的直接证据。如，要研究某次会议，会议记录、会议报告、会议决议、其他有关文件以及与会人员的信件日记和经过考实的回忆，就是核心史料。所谓关键史料就是反映历史活动关键环节的史料。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关节点，常常是各种社会力量、各种客观因素、各种偶然机会所共同酝酿而构成的一种必然趋势的临界点。这种临界点能否得到揭示或说明，代表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平。不同的问题需要说明的关键是不同的。如，要研究战争，那么军事战略的决定、战役的目标及其实施过程中的重大措施与阶段性成果就是关键。要研究经济，那么，有关社会经济的基本动态、有关经济政策、技术指标、宏观与微观的经济成就就是关键。所以，在选择史料的时候，要善于按照不同问题，选择最接近历史的关键史料。白寿彝曾评价陈垣：“他研究一个问题，总是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材料，严于取舍。两万多字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是由三尺多厚的稿本中提炼而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只

^① 参见唐宝林：《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上）——制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掩盖或伪造的种种事件》，见《陈独秀研究动态》，上册，382页，安庆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印，2006。

^②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8卷，364页。



用原来搜集的材料的一千多条，而不用者竟有一万多条。”^①如果掌握了大量的材料，而取舍不当，同样写不出高质量的论文，要能对自己所占有的材料忍痛割爱，做到“明知爱惜终须割，但得流传不在多”，舍得放弃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太密切的材料，因为学术成果能否流传于世，不在于篇幅的长短。

（二）认真推敲，发掘材料多方面的价值

要善于发掘材料多方面的价值，探讨其尽可能多的使用环境。以对一段材料的解析为例来说明。农民侯永禄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坚持不懈地记录了他和村民们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从他的笔下我们可以捕捉到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如，1940年腊月十三，侯永禄在日记里写道：“我家里有三十多亩地，兵粮、差款样样按地亩的多少摊派。有人劝我们把地卖一些，母亲还是舍不得卖掉，便把地当给张有粮十九亩。每亩当价二斗麦，共当回三石八斗麦。”^②这一段材料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农民的土地制度私有化问题；二是在1940年中国农村存在着具体的土地交易市场，存在着买卖、典当等多种交易手段；三是由于农民拥有土地私人产权，当时的中国农民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土地交易，换取必要的食品，解决起码的生存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由此也可以推论当年虽战火连年，民不聊生，但中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拥有土地。对于所占有的资料，都要从具体的事、情、理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地推敲分析，发掘其多方面的价值。史学研究贵在史料，贵在实证，而不是坐而论道，从具体的史料来说明，但要善于发现史料多方面的使用环境，把史料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三）实事求是，不要忽略反面史料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都特别留意与自己观点相一致的史料，注重运用支持自己观点的史料，对于与自己观点不相一致的史料则容易忽略。这是史家大忌。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观点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③。事实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不全面掌握史料而轻下断语，往往会因一条重要史料的遗漏而置人于尴尬之境。对于与自己观点不相一致的史料，一定不要遗漏，或者有意识地放过，而应特别重视对这些史料的搜集。如果反面史料足够多，且足以推翻自己的原有观点，那么就on应该实事求是做出新的结论，推翻自己的观点也在所不惜；如果反面史料不足以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史料也必须进入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去，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对这些反面史料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能回避它。凡是有严谨治学精神的学者都有此体会：“不但随时勇于修正自己的意见与结论，对于别人的反面意见尤要容忍，若人家证据确凿，优于自己的证据，更当决然放弃

① 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5页。

② 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③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33页。



自己的意见，公开接受人家的意见。死抱着自己的看法，作无谓论辩，只见其胸襟狭隘而已。”^①

（四）注意史料语境，切忌断章取义

每一条史料都有其产生的语境，如果脱离了原有的语境去理解运用史料，就可能曲解史料原意，因此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能“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断章取义，孤立地取其中的一段或一句的意思，出现与原意不符的引用。如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的很多论断存在着曲解的成分：“当田中为日本大战期间的侵华罪行道歉时，毛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流传，很多人迷惑不解，学界亦颇多议论。毛泽东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但要分析其谈话的语境，理解其真实的含义。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谈话时，曾说道：“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起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②在同时期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诸如“感谢”敌人、“感谢”对手之类的话。虽然他每次的谈话不尽相同，但基本的意思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当我们的好教员”^③。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同参加在朝鲜平壤召开的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论及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就又谈道：“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④。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习惯。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如，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向参加中共八大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代表介绍中国共产党认识农民的历程时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疯狂反对新中国，其国务卿杜勒斯反华的调门很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与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就称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并说要“感谢”他；杜勒斯“这不是一

①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37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460～46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③ 同上书，535页。

④ 同上书，534～535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132～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①。诸如此类的话，毛泽东还有很多。诙谐、幽默，甚至含有嘲讽、挖苦的意思，但话意明确。了解了毛泽东的话意所指及语言特点，才能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感谢日本侵略”及类似话的真实含义，否则就会发生曲解原意的错误。^②

（五）取材要精，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的史料

史学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史料的质量，而高质量的史料则为原始史料，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的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原始史料，亦称第一手资料，现在我们使用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作者亲自搜集的资料，如访谈、档案、其他文字或实物等。二是已出版的原始资料，如文件集、年鉴、文（选、全）集、年谱等。三是其他未被引用过的文字或实物史料。这些原始资料价值较高。第二手资料指学术作品已使用过的资料，文章、著作、学位论文等作品中的资料。第二手资料已经被他人“断章取义”，包含引用者的主观理解，其客观性、完整性、真实性等都大打折扣。应该以使用第一手资料为主，尽量不使用第二手资料。陈垣当年对学生在史源学方面的训练非常严格，牟润孙曾回忆道：“先师教学生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两段材料确不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册府元龟》等书，也不能通过。”^③ 老一代史家严谨的学风可见一斑。顾炎武把运用原始材料与摘引他人材料分别喻为“采铜于山”与“买旧钱充铸”，此中可见治学境界之优劣。但当下学界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有学者指出：“史学界存在一股不正之风，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拒绝在反映历史事实的原始资料上下苦功，到写文章时现找几条二手、三手的资料点缀一下，于是便放言高论，好像煞有介事。其实，不论犹可，愈论愈加深混乱，离开历史真实愈来愈远。人们戏称这种学风为‘回锅肉史学’，因为它不过是在别人的成果上再加点佐料，回一下锅而已。”^④

（六）信而有据，避免“硬伤”的出现

什么是“硬伤”？即史料错误是不可回护的。史料如果不准确，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史料是被杜撰出来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就存在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的教科书、历史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356页。

^② 参见李东朗：《毛泽东关于日本侵略一个表述之真意》，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1）。

^③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86页。

^④ 韦庆远：《利用明清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体会》，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博物馆与官方宣传部门公布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不能保持一致，竟成为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理由之一。科学性的标准之一就是客观性，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者选择或运用的史料十分可靠，如果没有事实依据凭空立论，必然牵强附会，猜测臆说，欺弄后人。顾颉刚曾说过：“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查，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烂，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楼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①笛卡尔也告诫人们说：“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地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②

（七）透解史料，但反对过度阐释

解释史料时要防止两种弊端，一是“滞”，一是“诬”。“滞”就是死板，就是就事论事，看不到史料以外的东西，看不出它们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不见史料内蕴的鲜活思想，这样的史料就是死的；“诬”就是“不实”、“伪”、“假”，它有两种情形，一是对史料的解释随心所欲，二是解释史料时死搬硬套某种理论，对史料削足适履，让史料硬性曲就某种理论图式。运用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时，一定要注意其限度，因为外来理论的“根”在外国，其应用没有绝对的普适性，要视其与研究史料的吻合度而应用。

综上，史料的运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清代正统学术特色时概括出了十点规则：“一、凡立一文，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槟。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例。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删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质朴简洁，最忌‘言有枝叶’。”^③今天看来，这些规则仍然没有过时。冯友兰论史料的运用时，总结了“全”、“真”、“透”、“精”四个字，可谓高屋建瓴，一语中的。那就是搜集史料，求“全”；审查史料，求“真”；理解史料，求“透”；选择史料，求“精”。^④陈垣常说，判断要审慎。

① 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词》，载《史学季刊》，1940，1（1）。

②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3085～308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④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学史》，见《三松堂全集》，312～31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研究讨论一事，如果证据不充足时，决不可妄下断语。还要把“未见”和“未有”分别清楚，不能将“未见”误为“未有”，论证史事“说其有易，说其无难”，有些事情没有真实广博的证据，没有考实，放言高论，往往出问题。^① 前辈史家的这些宝贵经验非常值得认真吸取。

^① 参见周祖谟：《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162页。



第五章

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问题

第一节 历史编撰的基本理论与编撰形式

一、历史编撰的理论探讨

历史编撰是史学发展的载体，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论著才能表现出来。白寿彝论述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①

关于历史编撰的理论探讨，可以区分为史体和史例两种形式。史体，是指史书的体裁，即史著的编写形式和外在表现形态，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之类。史例，指史著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编写技巧，如断限、标目、编次之类。白寿彝提出，在历史编纂问题上尤应注意两点：“一点是要注意到内容和形式间的关系。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可能有一种比较更好的表现形式。在编纂史书时，当然以采用更好的形式为宜。又一点是，形式是为了体现内容，内容不当因迁就形式而对自身有所损害。同时，形式也应有自身的完整性，也应该适当地保持一个相当完整的形象。这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必须妥为处理。”^② 编撰史书不讲求形式的恰当和体例的合理、完整，妨碍著者对所记载内容的表达，对于读者则增加阅读的困难，或缺乏兴趣，因而不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同上书，24页。



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这些都需要通过理论上的探讨,以及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史书的编撰过程中,还应讲求“编”与“著”的区别。“编”是指将前人或其他人发现的资料或研究成果,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加以编次,包括线索的改变、结构的调整、内容的增删等。而“著”则是在整理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观点、阐发见解、创立学说等。孔子曾自称“述而不作”,其“述”与“作”的概念与今天的“编”与“著”的内涵基本相同。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两个概念,第一次把史料性的记录和创造性撰述相区别,与我们所说的“编”与“著”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相同的。章学诚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①“编”的内涵在于“智”,即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方”是要求作者必须讲究一定的体例;“著”的内涵在于“神”,即阐发思想上的远见卓识,而“圆”则要求作者能对各种体例运用自如,大胆创新。“方以智”与“圆而神”是对史著“编”与“著”的很高要求。区别“编”与“著”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现在学界有些著作,编著不分,鱼目混珠,明明是史料的整理与编辑,却名之为“著”。当然,“编”与“著”有时难以分开,故有“编著”性质的史著,“著”中带“编”,“编”中有“著”,任何史著也不能不借用前人编辑的史料,但总是可以从主要方面判断出它们在编撰上的性质的。

二、史著编撰的主要形式与创新发展

中国史学在其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史著编撰形式。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将之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共10种;其中正史再分为官史、别史两类,如此细分,共得23类。当代学界归类总结史著体裁为: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典志体(政书体)、学案体、方志体(地方志)、演义体、史论体、章节体等。其中最主要的编撰形式有三种,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大体裁。史著编撰形式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学家主要从某一角度认识和叙述历史。编年体以时间先后为其认识和叙述的角度,纪传体主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纪事本末体则主要以事件为中心。三种体裁的存在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长处。

编年体是按时间顺序记述史事。其优点为,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其缺点是,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现在出版的大事记、大事年表、人物年表年谱之类的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如中国

^①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辑的《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系列等。《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逐年叙述自1949年至2004年55年间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采用纲目体，分年设卷，逐日记述新中国历史上方方面面的大事，至今已出版1949年卷至1955年卷。纲目体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编年体的记事原则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纲”是主题，“目”是叙事，编者心中有数，读者一目了然。此书以纲文、目文、文献、注释、图片、附录六种形式（体例）相互配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裨于读者对所叙史事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范围和容量，使史事更加全面、丰富，实现了编年体史书编撰体裁的成功创新。

纪传体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其优点为，可以更多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人物的全貌。其局限是，难以清楚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用纪传体写人物列传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成立20多年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配合党史、军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重点开展了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编撰工作，先后为党的领袖人物、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党的同盟者与国际友人等1300多人立传，《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共发行220多万册，这套丛书收录人物传记之多，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是古今纪传体史书所罕见的，它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壮丽历史画卷，成为第一部纪传体中共党史。^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它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全会审查解决一批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英明举措的启迪与鼓舞下建立起来的。其宗旨就是撰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并确定编写出版10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1983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10卷时，新华社就在当年6月28日和11月27日的对外新闻稿中写道：“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里，尚未发现系统的纪传体史书，《中共党史人物传》集数百人物传记于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丛书的出版与发行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近几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活动更加活跃，研究、编撰的广度和深度有新的扩展。除中共党史人物及名人传记大量出版外，还有许多“口述历史”、“回忆录”及亲属子女写的长辈“传记”问世，优秀传记作品不断涌现，许多传记图书成为畅销书。

^① 参见郑洪泉：《略论第一部传记体中国共产党史——读〈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载《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较之编年体党史著作，中共党史人物传记能够多方面、多角度、深层次而且鲜活生动地反映历史的发展进程。一般中共党史著作所叙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宏观。但在传记体党史著作中，就可以比较具体地描述一些人物活动与具体场景，提供更多的细节，展示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同一时期但在不同地方共同革命的许多具体资料。如《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提供了党的各地区组织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从在四川开展工作的党史人物恽代英、萧楚女的传记中，了解四川地区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史。一般通史性质的党史著作，不太可能给党的地方组织的发展状况留下篇幅。然而，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往往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对地区党史的发展状况的了解，将会使人们对整个革命历史的进程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大事为中心，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优点是，克服纪传体一事多出和编年体一事多时的缺点。其不足是容易忽略同时代史事之间的横向联系，难以理清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宁可主编有《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一书，他论述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的作用及其改造时指出：史书的基本任务是记事。“人们的诸多历史活动中，历史事件最为瞩目。”“尤其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使那些在长时期里仿佛停滞甚至静止的历史进程突然加速或者倒退，或者发生重大的曲折，也使那看似平淡不显眼的历史进程陡然发生急剧的变化，发出耀眼的闪光。它们往往是历史诸多方面运动的综合集中的反映，是历史深层变化的界标与契机。”而“这些明显的、短期的、凸现的历史事件，多属政治（包括军事）方面”。这正是纪事本末体史书作为传统史书主要体裁之一，并着重记载政治、军事大事的原因。“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已不仅限于历史事件，而是扩展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时段，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也不仅仅简单地限于‘垂戒立训’，而主要是经过对历史的认识，了解历史的趋势、历史的规律，以便更自觉地、更科学地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由于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扩展与深化，而会更加体味到历史事件在人们全部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使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所由形成、演变和结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由他主编的《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一书，即选择从远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历史事件1216件予以记载，要求做到“首尾毕具，过程清晰完整，尽量详明”。^①

这三大体裁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其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为人物立传记，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纪传体史书里的本纪，基本上就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记事的，但里面也有纪事本末体。比如《左传》记晋文公在外流亡的经过，就是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史书，是把历史上的大事区别为若干子目，在某一个子目里把这件大事有首有尾地记下来，每一子目都独立成篇。但这种史书也必须按年月日来排比历史的事实，而且里边也不能不有传记性质的记

^① 参见宁可主编：《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序，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述。因此，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的形式来说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且“这三种体裁也是不断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编年体的史书《春秋》和《竹书纪年》，只有简单的事目。《左传》、《前汉纪》、《后汉纪》，就有很大的发展。《资治通鉴》就有更大的发展。《资治通鉴》这部书是有极丰富的内容的，它按年月记述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还记述了各种议论。对于没有确切年月可考的史事，它也作了适当的处理。《资治通鉴》和《春秋》、《竹书纪年》，都是编年体，但彼此之间相差悬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以外，又写了《资治通鉴目录》，这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纲，但究竟是另外一部可以独立的书。到了南宋出现了《资治通鉴纲目》，对于一件史事的记载，有纲，又有目，这是编年体史书的又一形式”^①。

白寿彝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构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大型工程，经过20年的艰巨努力，《中国通史》全书12卷、22册于1999年4月全部出版，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和体裁的新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1981年即曾以精练的语言，概括要用“新综合体”来撰写史书的指导思想，说：“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只是一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②1989年，《中国通史》导论卷出版，总主编白寿彝在书中专设了一章阐述史书体裁的继承、改造和创新，阐明“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这一总的著述宗旨。他构想通史著作应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具体论述每一部分设置的意义、基本内容和要求，对这部规模宏伟的著作的编撰形式作出了清晰的规划。

以“序说”置于全卷之首，开宗明义。序说的基本内容包括：一是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考证。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应从大量的资料中挑选出重要的部分来论述。二是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应说明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两项是说明研究工作的依据，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年青一代的研究工作提供基础。三是说明撰述要旨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

“综述”，是各卷的主干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吸收了纪传体、编年体及

①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52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3）。



近代以来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发展。综述部分的主要任务是：一是要紧紧抓住每一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的变化比较显著，会作较多论述，且能显示历史演进的线索，但应结合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关系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二是时间的观念要鲜明，首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期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此外，综述部分还要对历史的疆域，写出大致的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只点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在典志部分去写。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他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在撰写上比原有的各种体裁方便得多。

“典志”的任务，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典志的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典志部分的主要内容，从总结旧史的志目并以新的观点考察，可包含如下各门类：一是地理，包括行政区划、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交通的道路等。二是民族。把民族立为专篇，有关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三是社会经济，包括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四是政治制度，包括官制、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五是军事制度。六是法律。七是礼俗，包括民间习俗。八是中外关系。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要紧的：一是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二是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发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发展的关系。各卷典志的篇目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反映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特点而有特别的篇目。

“传记”，既要写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我们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生活的时代，还要有通史的见识，把人物放在时代发展中来写，才能写好。

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互相配合，就能够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比起近几十年来流行的章节体，这种新综合体明显地便于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能更进一步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恰当地运用这种综合体裁，把通史写好，还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吸收司马迁、杜佑“通古今之变”的长处，还要吸收郑樵、马端临“会通”各种知识和文献的长处。在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要透过历史现象提示出历史的本质。要求做到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不要将通史变成断代史的拼凑，在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每一时



期历史各方面关系的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①

白寿彝关于新综合体的构想，是在自觉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基础上气魄宏大的创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新综合体在形式上吸收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加以改造，并且糅合了章节体及西方近代大型历史著作的优点而加以发展，而在内容上则与旧史有本质的不同。历史编撰的重大创新本来是由于历史学家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层次而引发的；反过来，这一重大创新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内容，开辟了新的前景。

第二节 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原则与基本步骤

一、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原则

（一）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应遵循贵在创新原则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②章学诚认为，“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③，达到历史编撰的最高境界。一句话，贵在创新。中共党史研究也应如此，但事实上党史学界每年编撰出版的大量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的少之又少，重复劳动现象非常严重。曾有学者指出：“任何一门学问，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要不断求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唯独中共党史研究有些例外。大同小异的内容，大同小异的资料，十年前是它，五年前是它，拿到今天，题目变变照样发。许多人不爱看党史文章，写得八股不八股不论，缺少新意是最大的问题。”^④造成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很多。一是中共党史有关的政治性的纪念活动最多，在每年某一人物或事件的纪念活动中，都会有大批论文或专著发表或出版。逢整五周年或整十周年时，更是隆重纪念。各地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团体、人员都会围绕着一个题目在做，观点雷同的“千篇一律”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是为纪念而作，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也减弱了其学术性。二是研究主体缺乏自觉的创新意识。历史编撰的旨趣，体现了史家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对历史研究目标的想法，他们对历史研究主题的选择，对体裁、体例等表述方式的选择，无不与此有关。有着自觉创新意识的史家，一般能够遵循科学的研究路径和具有相应的识识，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提出新问题，并

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310～3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464页。

③ 同上书，470～471页。

④ 杨奎松：《学术研究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见 <http://www.a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3174>。2010-04-22。



在研究结论上有所创新。这就要求党史研究工作者对于自身要有严格的要求。卢奇安评价修昔底德道：“他分清了好史家和劣史家的界限；史家的作品应该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目前沽名钓誉；他们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同令人哗众取宠。他以实用来衡量历史作品，他规定了英明历史家所应树立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历史可能重演的话，往事不忘便是今事之师。”^①“好史家”是把“信史留给后人”，“劣史家”是“为目前沽名钓誉”。只有克服了浮躁的、平庸的风气，创新的风气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扬。一方面，踏踏实实地读书，建造雄厚的学术积累，包括资料的积累、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积累；另一方面要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前沿有清晰的认识，在了解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和契机。打好这两方面的基本功，才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研究主体自觉的创新意识是与其德、才、学、识分不开的。

学术创新类型繁多，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创新上，还包括思想创新、问题创新、观点创新、材料创新、方法创新、视点创新等。现以笔者审阅的最近几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为例来具体论述一下创新的思路与内容。本科生尽管没有太多的学术积累，但他们年少气盛，没有思想羁绊，虽然论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幼稚之处，但他们中的佼佼者却极具创新意识。一是研究对象的创新，选定一个现实生活中刚刚出现的现象或问题，这一现象或问题对学界来说近乎思想盲点，还没有人注意。对它的研究从模式、方法到视点都无从参考借鉴。做这种类型的研究者，不仅对现实生活充满热情和关心，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思想敏感性。如1996级毕业论文《邓小平时代的大众政治心理研究》。这种研究如果言之有理，论证扎实而深入，并且把问题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就会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有的同学经过深思熟虑和艰苦的资料搜集、查证，发现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人物、观点或话题），如2000级毕业论文《乡土信任与村民自治——以“问题村”为参照的分析》。二是思想创新，是指自己根据社会历史或现实发展状况独立入思，提出一个观点或理论主张，并对之进行演绎推导或实证分析，这类研究者对社会乃至人类发展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凭自身的感悟力把时代、社会的发展与问题和学术的发展与问题联系起来。如2005级毕业论文《浅析中共党员标准的历史演变》等。还有的同学对许多人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对象提出前所未有的认识，如2001级毕业论文《笔锋上的儒法之辩——对“文革”时期“批孔”政治宣传的历史考察》等。三是问题创新，是指在撰写过程中始终有着较强的问题意识。问题创新的类型有多种：可以是新对象新问题，也可以是老对象新问题，还可以把问题作为对象，在老问题中生出新问题来。2000级毕业论文《关于毛泽东“人民民主观”的几个问题》一文就是研究老对象，但生发了新问题。四是观点创新，有的属于新问题新观点，还有的属于老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如2003级毕业论文《试析陈独秀、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上的分歧》等。五

^① [古希腊] 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2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是方法创新，是直接移植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如1999级毕业论文《制造神话的年代——以传播学的视角初探“大跃进”期间农业浮夸风报道的成因》。还有的同学是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用图表法对研究对象图示与说明，如2006级毕业论文《浅析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日报〉的粮食报道》等。六是材料创新，是指在资料的运用上，越来越重视一手资料（档案文献）的挖掘，进行新的资料整合，寻找发掘被人遗忘、不为人知的材料，或虽有人知道却未为人注意、未见有人使用的材料，然而根据自身对材料价值与意义的理解进行分析、评价与判断，提出新见解。如2000级毕业论文《浅议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与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和平、合理解决之对策》等。七是观点创新，是指这一类论文所选择的对象以及运用的方法都不新鲜，但研究者所从事的角度却是以前同类研究中较少关注的，所以写出来仍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有些研究对象已经有了十分丰富的成果，要有所创新和突破难度很大，进行全面分析时很难不重复已有的认识。这时就要变换论题切入的角度，以特定解释视角为研究切入点，重新组织和构建材料，对问题的阐释才会有创新之见。如1999级毕业论文《“文革”语言的文化表征——解读“文革”时期十篇元旦社论》等。创新的类型多种多样，但不管何种类型的创新，都需要才、学、识、德的历练，在此基础上培育创新思维。

（二）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在如何看待中共党史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仍存在不少误区。学界人士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与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那么它永远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而当前中共党史学界所存在的一些深具政治宣传色彩的研究成果也为这些责难提供了口实。追溯既往，学术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区分，学术研究不可能享受相当大的、不受政治统治思想影响的自由和自主性，所以才会出现中共党史学史上的“以论代史”时代。这里面就有个态度和方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性、现实性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无数的研究实践证明，对学术而言，意识形态有些负面影响，但也有积极推动学术的一面。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论：“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科学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①的确如此。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即是有力的证明，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需要对欲彰显和遮蔽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了解，而学术研究的客观、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或借鉴。所以，促进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转换，不但不会削弱中共党史所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反而会使这种功能更为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促进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提高其学术水平。”^②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政治性与现实性很强的历史

①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153页。

② 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学科，研究主体无论自觉与否，他的研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现实政治相联系。但是如果研究主体没有客观、严谨的态度，不能将研究对象充分客体化，就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那么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意识形态本身一旦成为研究对象，应该对之抱以客观的态度，把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学术研究一定要严守自身的路数家法，不能“曲学阿世”，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帮闲。史学研究的“家法”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它可以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把学术成果拿到社会中去应用，或以之改造社会，那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事。再退一步说，学术真的要服务于政治，也绝不是唱几句高调和颂歌，多用几个赞颂之词，而是从学理层面为其寻找合法性，从根基上维护它；学术文章中的高调口号充其量是一些政治谰词。学术上的真马克思主义是在研究中运用其方法和理念，而不是字里行间都充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方法，不言“主义”，而“主义”尽在其中矣！

（三）中共党史研究的编撰应坚持实事求是的作史原则

在中外史学史上，人们历来反对“曲笔”作史，倡导“直书”精神。这就是说，史家记述历史、撰写历史要实事求是。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上，就是要强调材料与理论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历史文献、历史事实，要考证确实，同时还要求尽量全面地占有材料；另一方面，要在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认真分析，得出合理的结论。二者缺一不可。没有经过考实的、充分的材料，谈不上历史研究；而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其研究结论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中共党史研究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①。

二、中共党史论著的编撰步骤

（一）选择课题

选择课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关键性环节，是研究工作的实际起点。选题时，一般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即该课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必要性即是权衡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选题的必要性也就是选题的意义，具体地说就是为什么要研究。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针对学术研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也就是该课题首先要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其次要基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选择学科最前沿或最具有生长能力的前沿课题。有学者曾谈道：“做研究工作首先要碰到的就是选题问题。我认为在一般情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1页。



况下，应该选择所攻学科的根题，也就是关键性的有生长能力的课题。”^①即所选课题要有利于学科的发展，能够进入史学主流；同时又有利于个人的学术发展，所选题目是一个可以不断生发拓展的题目，使自己的研究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连贯性，能产生系列的成果。

对于学生来说，一般来讲，选题的路子不外以下几种：一是从读书、听课中发现课题。读书有得才写文章，每一个优秀的学者都是饱学之士，大都是通过读书来发现课题的。二是从旁人论文中受到启发，发现问题。三是从社会需要和现实生活寻找现实意义较强的题目。四是还有从导师那里拿题目。初学者在找题目时也有其有利条件。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家顾颉刚回忆自己在初进学问界的时候，曾说：“我自己知道，我是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不免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为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炼，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永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外，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还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②也有学者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问题而引发著书立说的志愿。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以全新的视角，用实证性研究的方法，对中共创建的历史进行了一番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被誉为“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③，影响很大。关于创作此书的起因，他在该书“后记”中说得很明白，是源于他在1988年的一次现代史演习课上所犯的错误，他将“渊泉”当成了李大钊的笔名而遭质疑，“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博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博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④，于是他开始考察中国马克思主

① 邵荣芬：《我和音韵学研究》，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二编上册，75页，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

②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自序，80—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③ 占善钦：《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4）。

④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427—428页。石川祯浩由考证“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入手，开始走上中共成立史的研究，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叙述并不准确。实际上西安市委党校的杨纪元早在1987年10月的《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第10期发表的《“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中，就已经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而是陈博生（陈博贤，字博生）。原文如下：“近年来，有的党史工作者在探索李大钊的笔名时，曾经提出‘渊泉’可能是李大钊的笔名问题。……1987年5月，笔者就‘渊泉’的笔名问题，写信请教了当时的几位老者。没过多天，笔者惊喜地收到梁漱溟教授一个十分明确的回复。1987年6月9日，梁培宽同志代笔写信说：据家父记忆，‘渊泉’姓陈，名博生，福建人，为《晨报》一负责人。……于是，史学工作者探索多年的笔名‘渊泉’者，终于弄清了。为此，我们应当感谢梁漱溟教授，并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在石川祯浩还没投身于中共成立史研究之前，中国学界已经考证出“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只是不为石川祯浩所了解，但由此引发了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撰写，颇耐人寻味。



义与日本的关系，旁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从此走上了研究中共成立史之路，最终成就了这部特色独具的专著。

初步选定题目之后，还要考虑该题目完成的可能性，即个人的资料准备、知识结构状况、时间与精力，等等。有时题目虽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如果不可行，也是做不下去的。史料作为历史遗留物必然是不完备的，它不可能记载过去的一切，而且由于各时代的关注点不一样，每个时期的历史记载内容也大相迥异。因此，这些代代相传的史料尽管很丰富，但对于今人而言，还是缺憾甚多。梁启超曾慨叹：“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①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来说，史料情况则更为复杂。其中档案解密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就极为明显。最近几年，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与苏联公布了大批档案有着极大的关系。

另外，还要考虑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否胜任该课题的研究，有的课题很有价值，但如果需要专门的知识技能，超出了自己的驾驭能力，也只能割爱。对于初做研究的学生来讲，一般提倡“小题大做”。选题对象的范围越小，研究者越容易把握，越容易发现问题，或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把问题和研究引向深入。胡塞尔说做研究“不要大票子，要小零钱”，胡适要求学者学会“‘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②，讲的是一个道理。此外，还可以“旧题新做”，清代学者云：作文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意即写文章，以善于避开别人写过的题材为能耐，又以善于更新别人写过的题材为能耐。但欲“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③。总之，要在前人或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二）决定体裁体例

作文须先明体。很多学者在倡导继承传统体裁的优点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如国家投入巨资的清史纂修工程，力图借鉴传统纪传体而采用“新综合体”。但当今的史学著述，除了一些人物年谱、综合年鉴的编著沿用编年体外，大多是章节体专著和专题论文。掌握章节体与论文体的文体特征与写作规范，是史学著述的基础。

（三）搜集资料

搜集资料的第一步是检索和搜集相关文献的书目，编制一份比较完整的专题书目。依据书目，系统地检索所需要的文献，阅读文献，从中选取有用的材料，并摘录成可用的专题资料汇编。资料的摘录过程就是一个阅读的过程，把不相关的部分排除在外，将可能有用的材料以一定的分类保存下来，作为撰写的准备。搜集资料要从阅读研究性文献入手，而不能一开始就翻阅原始材料。首先从阅读代表性论著入手来了解课题研究状况，研究寻

① 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74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② 胡适：《〈吴淞月刊〉发刊词》，见《胡适全集》，第3卷，70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③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125页。



绎突破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亦可顺藤摸瓜，根据作者引证的线索去逐渐汇集材料。通过阅读研究性文献，对课题的内涵与边界有了初步的了解，建立一个粗略的知识空间，转而去查阅原始文献，对原始文献的理解会更准确，也易于在浩繁的原始文献中发现课题所需要的材料。要学会及时了解本专业最新的研究成果与信息，对专业杂志或专门的论文集要用心浏览，学术会议综述往往能够提供本专业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了解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有学者曾写道：“在利用档案之前，最好先能初步熟悉有关本专题的图书文献及前人、今人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本专题研究的重点、难点、疑点和薄弱点，做到心中有数。”^①此论实为经验之谈！

（四）编写纲目

为避免写作过程中的枝蔓丛生，跑题现象，在写作之前，大致要拟好提纲。提纲的内容一般围绕问题的提出、主体论述以及结论编排，主要是对写作思路的预设。以什么样的逻辑顺序来安排组织史料。胡华曾谈过他的治史心得：“拟好题目后，先要构思一个提纲，也就是文章（或书）的结构；分几个部分，每部分又分几个问题，几个论点，论证的层次。提纲拟好后，再按提纲开列参考书目，按各本书中涉及的材料的多和重要性，排列参考书的次序。然后逐一看参考书，按提纲内容，摘抄材料，写下心得。把参考书上要用的材料都摘抄好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看法也按提纲和问题记述下了，准备工作初步完成了，然后才可以动笔写作。写一篇文章或著作的一节，要集中时间来写，一气呵成，力求连贯。准备工作要做得充分，阅读和抄写材料要花去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想酝酿，也是反复琢磨、思索打腹稿的过程，准备的时间花得多些，考虑得成熟些，动笔写作时就顺利，可以较快地写出。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文章的主题思想没有酝酿明确，边想边写边查参考书，越写越乱，文章就会难产或流产。”^②因此，编写提纲与搜集史料是撰写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五）撰写初稿

如前所述，现代史学论著的撰述不外两种方式，即专著与论文。专著和论文在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学术专著一般包括导言（绪论）、正文（本文）和结语（结论），正文又分为若干章，一章又分成若干节。论文亦包括导言（绪论）、正文（本论）与结语（结论）三部分。

导言是在尽量全面梳理学术史成果的基础上，要将自己解决问题的立场、角度和结论鲜明地提出来，要简明扼要，切中要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导言的主要内容包括学术史梳理，以在此基础上明确自己要探讨的方向和重点。研究一个专题，在了解研究状况时最好要有较宽的涵盖面，不能只看与专题直接相关的论著，也不能仅仅留意最近几年的情况，范围要大一些，年限要长一点。还要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治学要创新，就必

① 韦庆远：《利用明清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体会》，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127页。

② 胡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见《胡华文集》，195页。



须很好地利用第二手文献。任何学者的研究都存在局限，都只是解决有限的问题。学术是在不断地证伪中进步的。因此，学术史的梳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所有后来的研究都是在建立在前贤相关研究基础上的。因而，深入细致地梳理前贤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超出窠臼，避免剽袭，避免重复性研究，而且可以获得学术的灵感，发掘新的议题。所以，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是有别于他人即超越前人的，通过学术史梳理，还可以凸显自己研究的学术地位。此外，前贤的相关研究本身也已经构成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研究的价值。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要求立论沉稳、材料扎实、论证严谨、分析透彻、表达明晰。立论沉稳，指立论要有分寸，又有分量，而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或随口乱说一气，结果漏洞百出，处处给人以攻击的把柄。材料扎实，是指研究者引用的材料要丰富、翔实，只有在材料极其丰富的情况下，研究者在援引例证时才能做到旁征博引、游刃有余、细致入微。还要使材料与观点之间成为有机的状态，结合得天衣无缝，能够有力地支撑论点。论证严谨是指研究者的分析不仅条分缕析、层次清楚，而且在论证时采用多方观照、立体架构、层层推进的方式，逻辑上无可挑剔。分析透彻，指论文分析除了清晰明白，还要把道理讲彻底，不能语焉不详或蜻蜓点水。

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以简洁的语言，将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阐述一遍，在论证的过程中，要对个人观点进行理论提升，理论就是对事实性质和特征的抽象，脱离具体事物而自主独立存在的本质和实体，其形态构成要素就是概念、范畴、命题。如果对现象或事实只是描述分析，而没有概括和推断，科学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进行概括。在理论提升的基础上，还可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较，说明自己研究工作的意义，而且还要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以示该项研究的重要性。

（六）修改定稿

这是撰写学术论文应重视的环节。修改涉及论文的方方面面，从措辞到文章的论点。胡华特别强调：“文章写好后再看看，修改加工。求得文字通达、简练，句子要短些，避免冗长的句子。文章内容，要求观点明确，层次分明，论证的逻辑性强。力求做到‘事信言文’，就是文章内容严谨，事实准确可信，言必有据；文字通顺而有一定的文采。”^①最基础的工作是对论点与细节进行推敲，对文字与结构进行润饰调整，对引文与数据要进行核对等。

“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是学界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卓有成就的学者无不重视对文章的修改，梁启超的治学之道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多改”。正如古训所云，“学为文章，先谋师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著名史学家陈垣就经常把写好的文章请

^① 胡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见《胡华文集》，195页。



人看，不急于发表，听取他人的修改意见，这也成了学术界的佳话。他的学生们对陈垣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记忆非常深刻，多年后回忆起来都不约而同地述说着老师对他们的影响。牟润孙回忆在励耘书屋师从陈垣问学时的情景说：“先师要我作学术研究，但一再告诫我不可乱发表文章。说：‘写学术文章，不可不力求慎重，对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成熟，就拿出来发表，将来极可能有悔其少作之感。’这话确有至理。”^①柴德赓在《陈垣的学识》中也回忆道，陈垣常说“写了一篇文章，一定要请人看看，要给三种人看：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②，这三类人中，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水平相当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启功也谈道，先生还认为，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③赵光贤也回忆说：“先生又教导我们说，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文章写出来，放在抽屉里，一二年，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学术性文章没有时间性，多放些时间，过后拿出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如果觉得不满意，需要修改，说明你有进步；如果经过几年时间，没有发现什么不妥，那说明你这篇文章可能站得住，然后再发表，或请师友们看看，提提意见，然后发表。文章不要怕改，甚至重写都可以，字句也要仔细推敲，一字不妥，不能放过。”^④陈垣的“好”、“小好”、“大好”之说在学界也广为流传。他说：“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就大好。”^⑤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是改的。他认为，至少这问题讲得不清楚，别人看了有疑问，那就得改。“他的稿子总是一改再改，一般总要四稿定下来。”^⑥他最喜欢搜集学者的草稿，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在他家的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每当他的学生看得发生兴趣时，他便提出问题说：“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⑦陈垣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个标点，认真真地推敲每一个字，其治学精神之严谨深深地影响了后学。

对于初学者来说，修改文章还有一诀窍，那就是清代学者姚鼎所言，“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一般来说，文章必须读熟了，才知道它的好妙，因为读熟了之后，哪里好、哪里需要修改，自然就能看清楚。反复阅读、反复修改是成就好文章的前提。

核查引文是初稿完成后要做的较重要的工作。陈垣曾不止一次提到要深深记取《史讳举例》的教训。他的《史讳举例》是为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而作的，仓促成书，有些材

①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85页。

② 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39页。

③ 参见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诞生百年纪念》，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96页。

④ 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59页。

⑤⑥ 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39页。

⑦ 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诞生百年纪念》，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96页。



料就是转引于钱氏，未及细检原书，不免有些错处。该书木刻雕版时，虽有所发现，但已不及改刻，因此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印时，他让学生将全书引文一一校对。他说：“以钱氏之精，尚且错简、脱落、谬误甚多，用其他人的引文，就更应亲自动手、勤奋查找了，这是省不得的。”^①

专著与论文的撰写是对史学工作者德、才、学、识的全面检验；立论动机体现的是德，文辞体现的是才，材料与论证体现的是学，见解深浅体现的是识。而德、才、学、识的培养仍需范文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一是要长期地坐冷板凳下苦功夫；二是要有扎实严谨的科学态度。为了研究陈独秀，唐宝林“放弃一切休闲、娱乐时间，像一个苦行僧，在史料、研究、撰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②。石川祯浩也自陈为写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整整坐了十年的冷板凳”^③。学术研究不是讨巧的事，不能好高骛远，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踏踏实实地去做，工夫下到，则“收获”自会尽在囊中矣。

第三节 中共党史论著的学术规范与撰写技巧

一、断限、标目与编次

（一）断限，即起迄年代

研究任何一个选题，研究目标要具体，一是要落在某个特定的对象上，还要注意其时间范围，范围不能大，一大就容易落空，而且很难把握。研究对象一定要“小”，小到具体而微，要学会研究聚焦。题目太大，时间范围过宽，研究面或问题就越大，深度和广度都难以驾驭。这样做起来有两个方面的不便：一是容易流于空泛，大而化之；二是工作量很大，时间和材料等条件是否相济也没有保证。

（二）标目

标目即标出选题的名称。文章或章节的题目都要注意其精妙，古人云“题妙可以庇诗”，意即题目精妙，甚至有时可以遮蔽正文的不足之处。

1. 标目的内容

选题名称越短越好，最长不超过25字，可以体现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甚至观点。一般来说，恰切的题目应能充分体现以下内容：一是新观点。如“‘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与双重角色”、“‘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值得商榷”。二是新材料。如“20

^① 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43页。

^② 唐宝林：《求真集·唐宝林卷》，1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③ [日]石川祯浩：《我怎样写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载《百年潮》，2001（7）。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支部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三是新方法。如“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

2. 标目的一般形式

在形式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体现创新内容的叙述式，中间加冒号、顿号。如“奠基：新中国头 30 年的建设成就”、“嬗变·危机·应对”。二是主副标题结合式。如“试析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评苏联政府的‘逼债’说”。三是用肯定、否定、疑问句式阐明要论述内容的问题式。如“中共党史学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汪精卫是死于上海吗”、“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对外开放是怎样开始的”，等等。

文章标题，要尽量少加标点，一般可以不加标点。特别是标题的末尾一般不加标点。

3. 标目的序号

文中标题一般要加数学序号。序号的表示方式一般为：第一级：一、二、三……第二级：（一）、（二）、（三）……第三级：1、2、3……第四级：（1）、（2）、（3）……第五级：1）、2）、3）……

（三）编次

编次即编辑撰次，是指怎样安排各部分内容。一般是按照时间关系或逻辑因果关系来进行。按照时间关系来编次，就是依据历史发展的先后、事情的经过来谋篇布局，注重纵的方面的阐述。按照逻辑因果关系编次可按照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路径，或者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来进行；也可分门别类，按照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进行，注重横的方面的叙述。

但在实际的撰著过程中，有时需要两种形式的交叉与融合。如研究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时，既要注意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关系，又要注意它们与前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的承继关系，以及对后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影响。史著的编次，不仅是形式的排比，更多的体现了作者的观点与史识，既要写出历史的“本然”，又要阐明历史的“所以然”。对“本然”的叙述一般是以时间关系来编次，对“所以然”的概括则是依据其内在联系来安排了。

二、引用、注释与附录

（一）引用

1. 引用的基本形式

引用是史学著述的基本要求，分为两种形式：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也称为明引与暗引。明引有以下几种情况：引作主要的论据；征引一般不常用的或新发现的历史资料；征引他人论著中的主要论点原文；考证文章中逐条排比分析的资料。暗引有以下几种情况：常识



性的叙事或阐述；征引他人观点而引文过长，可自由增删，以撮其要，但这种情况须注明出处；直接吸收他人成果融入自己的论证中，可从自己的角度增删，但须注明借鉴之处。

征引史料时，注意进行必要的文字技术处理，以便使自己的论著保持整体文风一致。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对史料进行必要的文字技术处理，绝非改动史料的文字。史料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不允许随便改动。但是史料中的文字总是带有过去时代的文体、语言风格和叙事习惯，这些文字大段夹在你的论著之中，不利于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路，读起来也会令人感到别扭和晦涩，因此，在引用时可以围绕自己所说明的问题进行节选，以避免那些难懂的文字、累赘的陈述和与当今文风过于不一致的语言。节选可以在一大段中节用一小段，几行中节用一行或一句中节用部分文字。原则上，应尽可能避免整段整段地征引史料。

2. 引用要遵循基本的伦理规则

一是引用以必要为限，摒弃宗教或准宗教式宣传的引用。在学术写作的过程中，应当在各个环节遵循学者的职业伦理，应体现学术独立和学者尊严，需要对学术研究事业心存虔敬，抵御曲学阿世、将研究作为迎奉权贵手段的不良风气，恪守学术引用的本位，摒弃宗教或准宗教式宣传的引用。引用应以必要为限，引用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吹捧权贵。另外，还要注意他人文字与作者本人文字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引用，尤其是过度引用某一个特定作者，势必令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读原著呢？”当然，对于研究对象特定于某种文献或只能依赖某种文献的写作者，这种“专项”引用便是不得已之事。总之，所谓过量引用与其说是量的问题，不如说是必要性的问题。

二是引用必须尊重作者原意，不可断章取义。学术引用无论是作为正面立论的依据，还是作为反面批评的对象，都应当尊重被引者的原意，不可曲解引文，移的就矢，以逞己意。以尊重作者原意的心态来进行引用，减少无谓的误读曲解。

三是引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作，需要对于此前研究尤其是一些主要观点的发轫、重述或修正过程有清晰的把握。否则，张冠李戴，不仅歪曲了学术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可能使得相关思想学说本身在辗转之间受到歪曲。其实，对于思想或学术谱系的认真梳理，清楚地区别原创与转述，正是一个研究者的基本功，通过引文，写作者的这种基本功是否扎实往往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①

四是引用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并提供与文献相关的准确信息。清代学者陈澧指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笃实之道矣。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之也。”依赖了别人的工作，就要遵循诚实原则，加以引注，无论是对于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文献，还是别的学者的著

^① 参见贺卫方：《学术引用伦理十诫》，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518.html>，2011-03-26。



作，都应该如此。引用时的作伪常常表现为注释中的出处信息的虚假，如掩盖转引，标注为直接引用。另外，近年来一些作者引用译著时喜欢引中文版却标注原文版。将转引标注为直引，将自译著的引文标注为来自原著，不仅是不诚实的表现，而且也是对被转引作品作者以及译者劳动的不尊重。

另外，对于经典著作的引用也要注意版本问题。文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般以近十余年来中央编译局重译的中文新版本为准。他们的著作凡收入新版选集的，均按新版选集引用。新版选集没有收入的著作，按新版全集引用。新版全集也没有的可按旧版引用。以前出版的马、恩、列著作选集、部分全集和单行本均不应再引用。引用《毛泽东选集》也应以20世纪90年代的新版本为准。

（二）注释

1. 注释的基本要求

注释是史著内部结构中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学术论著必须有规范完整的注释。对于注释，大家了解的通常的两种情况是明引史料要全部作注，某些暗引史料也须作注，如直接吸收他人观点融入文章之中的地方，应注明借鉴之处，以免抄袭之嫌。注明出处是注释的主要内容，也是注释的主要功能。但除了出处性注释外，还存在说明性注释与释义性注释等多项内容。如更正史料原文，应注明版本根据；对与所引史料相冲突的资料，应注明取舍的理由；对某一问题争论较多而引用一种观点，应注明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并说明采纳某种观点的理由。某些比较重要的史料，有益于阐明文章观点但又不宜直接用于正文之中，可用注的形式予以补充。某些思想观点与正文有关但又不宜在正文中展开论证，可用注的形式适当阐发，以为正文之补充。选用照片，要有照片注释，配上说明文字。照片的注释，应将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尽可能详尽、准确地进行说明。使用图表，要注明数据来源。译名、外来语等注释，有些词语有多种译法，但你只是采取了其中的一种，要注释说明，以免引起歧义。对某些专有历史名词要有释义性注释。如“三反”、“四清”、“黑五类”之类的，在一些论文的语境中有时也有必要以注的形式作说明。另外，引证史料中的一些人名也是需要注释的。人物的注释，一般应注生卒年代、籍贯、字号、简历等。在某一领域有突出的成就也要给予适当的介绍。

总之，注释的情况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凡是在正文中不便阐发，都可以“注”的形式，作为补充。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在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正文，作了93条注释。其中有的是比较重要的题注，有的是对正文的订正和说明，多数是释义性的。如《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题注，分别收录了这两个调查材料的油印单行本中关于调查的日期和参加调查会的人的情况的一些记载。这些都是了解正文背景的重要材料。^①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辑记事》，见《编辑杂谈》，第3集，81页。



2. 注释引文的基本格式

注释引文出处以详尽为原则。具体来说有以下格式：

著作的引用。引用专著时，按编著者、书名、版本（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年份）、页码的顺序注明出处。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如，朱健：《路易·艾黎在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原著者须注全名，并在名前加括号注明其国籍。如，[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从文集中析出文献的引用。标注顺序为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可省去文集责任者。如[荷]杜威·弗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66页。著作、文集的序言、引论、前言、后记的引用。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序言、前言作者与著作、文集责任者相同。如，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第1页。二是序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如，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刊物所载文章的引用。按著者、文章标题、所载刊物名称、期次的顺序注明出处。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版别。如，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第38页。定宜庄：《关于〈最后的记忆〉一书的说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报纸的引用。按著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顺序注明出处。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可标识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选选项）。同名报纸应标识出版地点以示区别。如，伤心人（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第69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页。《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外交部电》，《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8月14日，第4版。《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人民日报》，1958年7月8日，第1版。

转引文献。无法直接引用的文献，转引自他人著作时，须标明。标注顺序为著者、原文献题名、原文献版本信息、原页码（或卷期）、转引文献责任者、转引文献题名、版本信息、页码。如，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3页。

手稿、文件、档案文献的引用。按文献标题、文献形成时间、卷宗号或其他编号、藏



所标明出处。如,《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北洋档案,1011—59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7月,李劫人档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藏。

外文文献的引用。引用外文文献,原则上使用该语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外文专著标注顺序为著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文献题名用斜体,出版地点后用英文冒号,其余各标注项目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如, Peter Brooks, *Troubling Confessions: Speaking Guilt in Law and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48. Ran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28. 外文期刊析出文献的标注顺序为著者、析出文献题名、期刊名、卷册及出版时间、页码。析出文献题名用英文引号标识,期刊名用斜体。如,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99—215. 外文档案文献的标注顺序为文献标题、文献形成时间、卷宗号或其他编号、藏所。如,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Box 1032, NSC Fil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D.

引文在原书上如果跨页,在注页码时可用连接号,如“第34—35页”。如果原文散见两页,页码可用顿号,如“第34、36页”。

注释标记在正文中的位置如果稍不注意,也会出现错误。一般来说,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引用完整的句子,句号在引号内,注释标记置于引号之后;二是不引用完整的句子,引用半句,逗号或句号在引号外,注释标记置于引号与逗号或句号之间;三是整段引用或大段转述,注释标记置于段后或转述结束处。

3. 注释的基本原则

注释应遵守的原则,一是要实事求是,无论是史事或人物等的注释,都应实事求是,不能回避问题;二是注释的体例要前后一致。

一些有经验的学者在读一篇新的论文时,往往最先看的就是该文的引文注释,因为它能告诉读者,作者研究的起点和可能达到的研究深度与高度,继而可以大致判定该文对学术进展能否具有贡献。

(三) 附录

附录是对正文的一种补充,所包括的内容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可以分类、分别设立。如参考书目和参考论文可以分开,资料性的书目和研究性的书目可以分开,口述史料与声像电子史料分开,没有正式出版的学位论文资料也要单独列出,等等。可以根据史料的形式特点进行分类。比较规范的史学著作,在书后大都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如费正清的《中国新史》,附有参考论著多达



930种。

对理解正文有关的某些资料选段或文摘，不便在正文中引用的，可放在附录里。

供检索正文所用的各种索引，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主要是帮助读者检索。编制索引的方式一般是确定索引项（人名、地名或其他问题），按中文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每个索引项后标出书中出现的所有页码。索引要尽可能完备，页码必须准确无误，否则编制的索引就毫无意义。

译名、国名、地名对照。对于论著中出现的外国人名，要认真核查、考证，一般要列出其外文名字，以便核查。国名的演变也很复杂，如，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俄国”在不同时期称呼不同。胡华曾批评过一些学者，“写1922年以前，某某人说，‘我要到苏联去’或者‘我认为苏联……’，‘苏联革命’怎样，事实是1922年才有苏联的名称，在此以前叫苏俄”^①。这些都是中共党史的常识，一定不能混搭乱用。被称为“苏俄”是在1917年11月7日至1922年12月30日期间。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直到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之前，俄国的名称为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俄。被称为“苏联”是在1922年12月30日至1991年12月25日期间。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了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现在的俄罗斯即指俄罗斯联邦，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联邦制国家。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称俄罗斯联邦或俄罗斯。1991年12月21日，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苏联解体。独联体成为接替苏联的一个组织。独联体不是国家，也不拥有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权力，它为各成员国进步发展和加强友好、睦邻、族际和谐、信任、谅解和互利合作关系服务。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退出后，独联体有10个成员国，即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俄共产党的称呼也随之演变。1918年至1925年间称俄共（布），即指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简称俄共（布）。1925年至1952年间称联共（布），苏联成立后，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上，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以后称苏共，1952年苏共党的十九大上，联共（布）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1990年6月20日至今称俄联共，即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0年6月20日成立，是苏联解体后在苏共基础上重建的众多党派中，力量最大、人数最多、群众动员能力最强的共产党组织。该党一般被认为是苏联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继承人。

地名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异地同名、同地异名、地名改变的情况都比较多。如历史上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原则，根据政务院1951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

^① 胡华：《关于党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和写作问题》，见《胡华文集》，276页。



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先后更改地名的有：1953年迪化市改乌鲁木齐市；1954年归绥市改呼和浩特市；1954年云南省镇南县改名南华县，平彝县改名富源县。还有为纪念革命先烈而改名，如陕西省就在1935年为纪念谢子长，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1936年为纪念刘志丹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等等。有些地名有别称、简称，便出现一地数名、同地异名，如白下是南京的别称，羊城是广州别称，洪都是南昌别称，等等。还有地名的转译问题。1978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中国的人名、地名一律按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但有些地名的旧译法已约定俗成，也应有所了解，如Peking——北京，Canton——广州，Hankow——汉口，HongKong——香港，Amoy——厦门，Mukden——沈阳。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以统一外国地名中的译名。而在此以前，外国地名的译名有不少是不统一的，有些文献中出现的中译外国地名，与现在约定俗成的相差很远，以至于不知所云何处，如墨利加洲、亚墨利加——美洲，濠斯多拉利亚——澳大利亚，等等。

大事年表、世系表。编写大事记、年表的要求是：一是时间概念要准确无误。每一件史事，每一项活动的年、月、日都要十分准确。二是史事要准确无误。史事的真伪、有无可考证核实。三是文字精练、简明。

地图、统计图表、比例图等其他相关资料可以放在正文中，也可以放在附录中。如果不需在正文中对其分析，就可以放在附录中以备读者查阅。使用统计表格，需要对表格做编号。如果表格较少，可用“表一、表二……”这种编号方式。如果表格较多，可以按章节分开来编，如第一章第一个表可标示为“表1—1”，第三章第二表可标示为“表3—2”。

三、行文中的格式规范

（一）内容摘要和关键词的写法

1. 编写摘要的要求

第一，简要而完整，具有不依赖于正文而存在的独立性，能够自成一体。

第二，语言表述要规范，要使用规范性专业术语，不能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不能使用自造的概念术语。

第三，不能出现图表、数字公式或符号，不能出现注释性文字。

第四，应直述文章的基本观点，不能出现自我评价性的语言，不能采用“本文”、“笔者”一类的第一人称的写法。

一般写作者容易把“内容摘要”写成“内容提要”，其实这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造成误解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两个词汇都有“内容”二字。在英语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区分，所谓“内容提要”，就是英语的summary，它是对论文内容的简要概述；所谓“内容摘要”，就是英语的abstract，它是对论文重要论点的概括呈现。内容概述与观点陈述有着不同的要求。



2. 选择关键词的要求

第一，要切合主题，是文章的中心概念。

第二，属于本学科的专业术语，具有公知性。

第三，属于具有名词或名词性的概念，形容词、副词都不能充当关键词。

第四，应参考各种词表或工具书选取，以保障关键词的规范性。

第五，属于新学科、新领域的重要术语，凡是不见于各类词表和工具书的应能被本专业的研究群体所认可。

第六，数量以3~8个为宜。^①

关键词是专供检索用的，反映论著的主题和主旨。但在实际运用中，经常出现两种偏向：一是用标题中的词汇做关键词；二是将关键词理解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以至于用抽象的概念或外延很大的名词做关键词。其实，标题本身就具有检索功能了，再用标题中的词汇做关键词，就失去了用关键词检索的意义。举例说明：

1958年中国改变户口自由迁移制度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 当代中国史 重工业优先发展 计划经济 户口迁移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此，中央政府不断地发布命令，阻止农民入城务工，以确保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充足的商品粮食。与此同时，为了稳定城市工业化建设队伍，中国逐渐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就业、粮食和社会福利等与城市户口挂钩，并于1958年中国取消了户口自由迁移制度。

如果把此文标题中“1958年”、“中国”、“户口自由迁移制度”、“历史原因”这样四个词语作为关键词，这就出现了上述的两种偏向。有的学者认识不到内容摘要和关键词的重要性，认为这些因素是纯形式的东西，没有多大作用和意义，因此在写作内容摘要和关键词时相当随意，随便写几句与内容相关的话，就作为论文的“内容摘要”，随便写上几个与内容相关的词汇，就当做“关键词”，这种态度极不可取。专业学者在阅读论文时，首先是看其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如果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名副其实，阅读者一看即知论文的目的与宗旨，一下就明白了论文所要论证的东西。如果写出来的摘要与关键词与内容若即若离，既体现不出论文的观点，又体现不出论文的创新与特色。在此情形下，论文的价值与作用在读者眼里和心里自然打了折扣。

(二) 段落和句子格式

一般的段落格式安排，开头是该段落的主要论点，接下来是论证，最后是过渡句，向下一个段落和论点自然过渡。段落不要太长，把一个意思说明白了，即可另行分段。句子也不宜过长，能断则断。翻译其他语种的材料，应按中文句法来翻译，少用欧式语。近年

^① 参见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来，有些学者，慕欧美文风，邯郸学步，一句话的长度达三四十个字。这种拖沓冗长的句子越来越受到学界排斥。

（三）数字标示

注意时间代名词，如“今年”、“昨天”、“上月”、“今冬明春”等，在史学著作中容易造成时间错误。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应避免用时间代名词，要用具体日期。年份要用全数，不得省略，如“1988年”不能写成“88年”。有统计意义而且比较精确的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标示，如1070万吨钢、与会代表共578名、平均年增长2.5%。一个数字即使是具有统计意义而且精确者，在相对独立的语言环境中出现时，一般也用汉语数字标示，如增长了两倍、五个人。不具有严格统计意义的数字或属于概算性质的数字，可以用汉语数字标示，如四百多斤、一万多米、增长了十多倍。遇到具有统计意义而且比较精确的数字与概算数字在一起出现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予以处理，如果两类数字出现相当时，应统一用阿拉伯数字标示。在交代顺序或一般归类时出现的数字，通常用汉语数字标示，如第一、排到了第五名、大会第四号简报、十一个方面、二十六条建议。顺序词有时可这样使用：首先、其次、再次、最后；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一是、二是、三是……数字作为名词、形容词或成语的组成部分时，不能用阿拉伯数字，如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六一国际儿童节、八年抗日战争。两个一位数连起来表示约数的意义时，也用汉语标示，如五六月、八九个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一位数连起来时，同样用汉语数字标示，但数字之间应加顿号，如七、八、九三个月。军队兵团以下建制的番号的标示，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如第9兵团、第39集团军、第24军、第114师、第369团2营6连4排10班。兵团以上建制以及部分类似于专用名词的军队建制单位的番号的标示，一般用汉语数字，如红一方面军、第四野战军、八路军、新四军。

（四）标点符号

文件或文献的标题除在以全称形式出现时需要冠以书名号外，在以简称形式出现时一般也可使用书名号，如《指示》、《决定》、《通知》、《报告》等。带有“草案”等字样的文件在被冠以书名号时，书名号应将其括入，如《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文件或文献的标题以俗称等不规范的缩略形式出现时，不能使用书名号的，应当一律加引号，如“工业七十条”、“五一六通知”。引号的使用必须完全，不能只引用文件或文献的一部分，如不能将“五一六通知”写成“五一六”通知。历史事件和各种组织、机构、团体的名称，一般不加引号；但是带有否定意义或贬义的专用名词以及名不副实的组织、机构、团体的名称，均须加引号，如“大跃进”、“反右倾”、“两个凡是”、台湾“国防部”。“围剿”、“扫荡”、“制裁”等词语在带贬义的情况下使用时须加引号，和平演变一词不加引号。“左”与“左”倾加引号，如王明的“左”倾路线。历史事件和一般会议名称一般不加引号，如八七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会议。而带有引述性质的名词术语，均应加引号，如“斗、批、改”、“四清”、“三自一包”、“以阶级斗争为纲”、“一



五”计划、“十五”计划。标题末的符号除用感叹号、问号外均不能加其他标点。数字（指年份）表述需用连接号时，一般阿拉伯数字间应用一字线，汉字间则用二字线，如1949—1978、一九四九——一九七八。

（五）简称与缩略语

一般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人大、政协各级代表大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工作机构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文中时均用全称，如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复出现时一般可以用简称，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共北京市委。用简称时不加引号。文中使用的简称或缩略语，应含义明确，且属长期使用、约定俗成者，如“三讲”、“三个代表”、“十一五”规划。以往习惯使用的但缺少关键词或含义不明、不规范的简称、缩略语，应尽可能地少用或不用。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能简称为“正处”，这样的简称既不规范也不明晰。

第四节 中共党史论著的语言

一、中共党史论著语言的基本要求

史学成果要通过文字表述才能得以呈现，但史学表述不同于文学著述，有着语言方面的规范要求。

（一）严谨、准确是中共党史著作语言的基本要求

胡华在谈到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写作时特别强调：“有些当时人说的语言，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能臆造。比如说，十年内战时期就义的烈士，写他在就义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其实，那时就是喊‘打倒国民党’，或者‘打倒蒋介石’。把国民党分为反动派和民主派是抗战以后的事，十年内战时期的人，还没有使用‘国民党反动派’这个词。比如说1924年以前的人，对人这样说：‘我已经信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列宁主义一词，是1924年列宁死后，斯大林才提出来的，1924年以前没有这个概念。还有很普遍的，是写1922年以前，某某人说，‘我要到苏联去’或者‘我认为苏联……’，‘苏联革命’怎样，事实是1922年才有苏联的名称，在此以前叫苏俄。瞿秋白写《新俄游记》，新俄，其革命则叫俄国革命。比如说，写长征时期的人物，写某某人说：‘我们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没有错。’其实，长征时期对毛泽东还没有‘伟大领袖’这个称号。像这类的写法，违反了历史的真实，也违反了常识，应该避免。”^①做到这点，除了需要具备深厚的知识素养外，还必须有严谨、准确的语言风格。有些词汇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只有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准确把握它们的含义，不能泛泛使用。

^① 胡华：《关于党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和写作问题》，见《胡华文集》，276～277页。



（二）语言表述要平实

卢奇安认为：“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辞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①这段话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平实”二字，这是维护史学特性的需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出版以来，这部书印刷了20余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当然首先取决于该书的内容和论点，同时也跟它在表述上的平实分不开。白寿彝在总结史书的表述要求时，概括为六个字：明白、准确、凝练。这是平实的三个层次：明白，是基础；准确，是关键；凝练，是提高。^②可见语言平实是对史著语言的另一基本要求，此种文风的史学著述才能传之久远。白寿彝曾对此论述道：“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的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要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工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的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工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③白寿彝提倡史学工作者要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要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主要是针对学界的一些艰涩含混、故作高深的著述。固然，史学著述要求知识坚实、见解深刻，但更要表述清晰、文句晓畅，不然就难以为他人所了解和接受。近年来，有些学者以欧式语为时尚，句子冗长，修饰繁复，惯用倒装句，行文臃肿，含义不清，徒然增加阅读的困难。

做到语言平实，就要文辞中性，不能用夸张渲染的文学笔法。不使用带有强烈的褒贬和情感色彩的词汇。文辞中性既不等于消除作者的立场，也不要求摒弃文采（对于史著文采之要求，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了）。宋人吴缜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是有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

① [古希腊] 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192—213页。

② 参见瞿林东：《白寿彝的学风与文风》，载《光明日报》，2000-05-12。

③ 白寿彝：《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370页。



史之意矣。”^①

（三）还要讲求文德

“文德”之“德”是指“临文主敬”，强调史家对前人文辞应有公正的评价。要做到两点：一是“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二是“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了在史学研究当中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轩，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在学术史梳理中，对前人的失误，在评论中最好不要轻易说他人对某个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或“存在明显局限”。清人陈澧指出，对于前人的失误，但当辨析，不可诋讟，即辨析亦当存尊敬之心。评述已往的研究是一种与前人的对话，要带着敬意和谢忱，而不要用指责的口吻，行文应尽量中性平和。

二、中共党史论著语言的美学要求

注重文字表述，讲究文采是中国史家治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文字表述上的造诣也一直衡量中国史家是否是“良史之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宋人吴缜也提出史书“必资文采以行之”^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更是用大量笔墨分析了史家如何发挥“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梁启超著书立说非常重视文采：“《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③ 无论传世之文还是觉世之文都要讲究文采。

刘知幾在《史通·叙事》论道：“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他专作《点烦》篇举出前代文中啰嗦的例子，把他所认为应删去的字用“点”标在旁边。清代学者方苞称“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中国史著有“尚简”的传统。梁启超更是主张简洁，就是要做到“章无剩句，句无剩字”。他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不为文章之美，多言无害。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④。“戒浮词”是老一代史学家竭力倡导的文风。陈垣曾说：“文学家不善著史书，如欧阳修是文人不是史家，所以他写的《新五代史》是借史作文，有许多浮词。写作应当像顾炎武的《日知录》，一字一句能够表达就不要再写出第二个字第二句话了。”^⑤ 白寿彝也一直提倡：“作文要避免横生枝

①② (宋)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109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4806页。

⑤ 转引自蔡尚思：《陈垣的学术贡献》，见《励耘书屋同问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23页。



蔓，力戒浮词。”^①

历史学家郑天挺对此总结道：“他们提倡简要，反对文字的烦富，希望‘文约而事丰’，所以他们主张尚简。”他进一步总结在具体运用上的经验说：“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关涉，所以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何必再说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发生时有关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学家他们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做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滓在’。”^②卢奇安认为：“文笔简洁在任何时候都是优点，尤其是在内容丰富的场合；这个问题不仅是修辞的而且是本质的问题。我认为，解决的方法是简单地扼要地处理不重要的细节，而对主要的事件则予以充分的发挥；真的，许多枝节最好是省略。”进一步讲，“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的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③。

当然，史文烦简，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刘知幾说过：“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他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之所闻。”^④“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⑤材料的取舍体现了史家的史识，博采而慎取是首要原则。一般说来，搜集来的材料很多，但不是所有的材料都能用上，一定要注意材料的审核比较，择其善者而用之。章学诚在谈到研究材料的选择时说：“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铢镒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⑥

在“尚简”的同时，还要“用晦”。“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赅，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⑦意谓含蓄和凝练。顾炎武之“于叙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最主要的表述方式。

史著语言在美学上另一个要求就是生动形象。梁启超说：“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文采好的，写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写得呆鸡木立。这不在对象的难易，而在作者的

① 瞿林东：《白寿彝的学风与文风》，载《光明日报》，2000-05-12。

② 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见《探微集》，2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古希腊]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192~213页。

④ (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98页。

⑤ 同上书，117页。

⑥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173页。

⑦ (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173页。



优劣。没文章素养的人，实在把事情写不好，写不活。要想写活写好，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练习。”^①他认为文章要写得“飞动”，“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好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板起面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②。这是说，行文生动优美是史家必须训练的基本功。

白寿彝提出了“历史文学”这个概念，意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③。他认为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即“闲中肆外”与“艺术加工”。“闲中肆外”意即内容要充实、丰富，而文笔要发挥尽致，但“只有闲其中，才能肆其外”。每个人写出的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讲究文采与文风平实不矛盾，历史文学所要求的艺术加工，以不改变历史真实为原则，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不同的，不能因文损义，犯下刘知幾所论的“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④的错误。以优美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当然胜过枯燥无味的论述，但这种优美必须在“不以文害辞”的情况下进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大革命失败后那段历史的话，广为人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种富于感性的形象化的描写，既简洁概括又生动有力，极具感染力，这就体现了一种语言功力。

近些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著作，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得比较生动活泼，也很有新意，为读者所欢迎。但是，这样的著作数量不多，大量党史著作特别是中共党史教材，反映形式单一，可读性差，如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专门认真去读的人很少。许多中共党史著作和教材之所以写得枯燥干巴，是因为部分学者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共党史著作和教材就应该主要是讲抽象性的东西，重视理论和资料，不注重文采。胡乔木曾就党史编撰问题提出建议说：“事实比理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对于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动、具体的描写，不然历史就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历史本来是充满革命斗争的激情、动人的画面的，而我们写的本子常常变成了灰色的、苍白的。”^⑤与这类党史著作和教材受冷落的情况相反，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纪实文学热，有关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的纪实作品，不胫而走，人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4806页。

② 同上书，4807页。

③ 白寿彝：《史学概论》，189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④（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180页。

⑤ 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1985年11月4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42页。



们竞相阅读，深受欢迎。在这些纪实作品中，确实有一批将严格的史实和生动的文章结合起来比较好的著作，史实比较准确，又有可读性。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出了一批品位不高、粗制滥造、严重失实甚至有些低俗的作品。因此，如何增强党史论著的生动性、可读性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中共党史学是一门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学科，研究成果要有思想性、理论性，但这些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也应该讲究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力争写得语言生动形象。胡乔木谈道：“一般地说，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个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①他具体举例说：“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可以描写一下成立时的情况。当时法国巡捕房同青洪帮勾结，对参加一大的人盯梢，会议不得不换地方开。开成立会时，报纸上没有发表任何消息，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开始点燃起来了。不要老是写会议有哪些人到会，作了哪些决议。要用当时社会上的反应，从客观上观察和评论一些事件。对某个事件，当时报纸是怎么说的，中国反动派是怎么说的。但是，同他们说的不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理解到这个事件的意义，这个事件有如何如何的作用，等等。”^②胡乔木给党史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党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有30年的革命党历史、60多年的执政党历史，90多年的光荣历史有太多感人的场面、复杂斗争的场景，而正如胡乔木所论，如果“仅仅说某某同志‘英勇牺牲’了，这几个字还不能令人感动”。党史的撰写“一定要有科学性，要有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论断，要对重要的问题作结论，同时又要有生动的叙事。要穿插一些重要报纸的记者、作家的评论，要写出党史人物斗争生活的细节。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动人的描写，有大开大阖的章法。要改变过去那种枯燥、干瘪的写法，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④。因此，写出有声有色的历史画面，写出中共党史人物斗争的细节，再杂以精辟的议论，增强中共党史著作的可读性，这就要求中共党史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没有生动的表达形式，再好的思想、理论、观点，也不易为广大读者迅速接受。因此，中共党史工作者除了应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史学功底外，还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读者现在已完全不能容忍枯燥、说教式的文字，能够反映出时代气韵的、生动活泼的、具有美学特点的新式语言越来越受到学界欢迎。

① 胡乔木：《如何写好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这段历史》（1986年10月25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45页。

② 同上书，246页。

③ 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1985年11月4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43页。

④ 胡乔木：《如何写好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这段历史》（1986年10月25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251页。



参考文献

一、经典著作与汇编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8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列宁选集。3版。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专题文集。第1~5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毛泽东选集。2版。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文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文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文集。第6~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邓小平文选。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编辑组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胡华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

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二、国内学者相关论著（以汉语拼音为序，同一作者著作排列一起）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近代后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陈铁健。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陈启能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陈明显。中国现代史科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陈其泰。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陈恒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陈玉堂。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北京：红旗出版社，1985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常建华. 社会生活的历史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杜玉芳. 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
- 范文澜. 范文澜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范文澜. 范文澜全集. 第10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范达人. 当代比较史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范达人. 易孟醇. 比较史学.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1
- 龚育之.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下).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龚育之. 党史札记.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龚育之. 党史札记二集.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龚育之. 党史札记末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 高增德, 丁东编. 世纪学人自述(6卷).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 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顾颉刚. 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郭德宏, 周国全. 王明传.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 郭德宏主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 郭德宏. 彭湃研究.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 葛懋春主编. 历史科学概论.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实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韩震, 孟鸣歧. 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 胡乔木. 胡乔木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胡绳.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胡绳主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胡绳. 胡绳文集(1979—1994).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胡绳. 胡绳全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胡华主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1991
- 胡华. 胡华文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胡华主编. 中国革命史讲义(上).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79
- 胡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
- 何东. 中国现代史史科学.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7



- 何干之. 何干之文集.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4
- 何兆武主编.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侯外庐. 韧的追求.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 侯建新主编. 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侯永禄. 农民日记中的历史风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 蒋大椿. 唯物史观与史学.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 蒋大椿, 陈启能主编. 史学理论大辞典.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大纲.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蒋建农等. 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下).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姜义华, 瞿林东, 赵吉惠. 史学导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翦伯赞. 史料与史学.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 金春明主编.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康乐, 彭明辉主编. 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 黎澍, 蒋大椿主编. 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黎澍主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黎澍. 再思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黎澍.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李振宏.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李振宏. 历史与思想.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李大钊. 史学要论.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李伯重.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 李红岩.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唐)刘知幾撰, (清)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刘跃进. 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 刘北成, 陈新编. 史学理论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刘书林, 蔡文鹏, 张小川.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 罗国杰主编. 伦理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5
- 彭明. 五四运动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彭明. 板凳集: 彭明随笔. 桂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彭明. 彭明文存.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 庞卓恒.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庞卓恒. 比较史学. 北京: 中国文化书院, 1987
- 彭卫, 孟庆顺. 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彭卫. 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瞿秋白著, 陈铁健导读. 多余的话.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5
- 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瞿林东. 史学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瞿林东.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瞿林东.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齐思和.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 齐鹏飞. 杨凤城主编. 当代中国编年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齐鹏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荣孟源. 史料与历史科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施金炎. 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 沙健孙, 龚书铎主编. 走什么路: 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 石仲泉. 我观党史.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1
- 苏维民.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 田汝康. 金重远编.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田居俭. 春泥集——田居俭论史文存.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 唐宝林, 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唐宝林. 陈独秀传(下)——从总书记到反对派.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唐宝林. 求真集·唐宝林卷.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 唐曼珍. 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胡适口述, 唐德刚译注. 胡适口述自传.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吴泽主编. 史学概论.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王晴佳, 古伟瀛.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 王仲清主编. 中共党史学概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 王学典.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 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王炳林. 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王文滋. 胡绳晚年学术思想研究.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
-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 杨之华. 回忆秋白.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杨奎松.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杨奎松. 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 杨天石.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杨凤城.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 杨豫, 胡成.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杨念群, 黄兴涛, 毛丹主编.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杨玉圣, 张保生主编. 学术规范导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严耕望. 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 于沛主编. 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于光远.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郑天挺. 探微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清) 章学诚. 文史通义.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张静如, 唐曼珍主编. 中共党史学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张静如.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 张静如. 静如文存.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张静如. 张静如文集.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6
- 张岂之主编.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张柱洪. 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张宪文.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张广智, 张广勇. 史学: 文化中的文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周一平. 中共党史学史.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 周一平. 中共党史文献学.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赵光贤. 中国历史研究法.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 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朱佳木.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朱本源.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三、国外学者相关译著 (以国别为序, 以出版时间排列)

- [德]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德] 卡尔·曼海姆. 卡尔·曼海姆精粹.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德]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德] 于尔根·科卡. 社会史: 理论与实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法] J. 勒高夫, P. 诺拉, R. 夏蒂埃, J. 勒韦尔主编. 新史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法] 雅克·勒高夫. 历史与记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法] 马克·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法] 雷蒙·阿隆. 论治史. [法] 西尔雅·梅祖尔编注.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法] 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法]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法] 亨利·博格森. 创造进化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法] 弗朗索瓦·多斯. 碎片化的历史学: 从《年鉴》到“新史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美] 菲利普·巴格比. 文化: 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美]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第四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美] 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美] R.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美] R.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美] 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上、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美] 费正清. 中国新史. 台北: 中正书局, 1996
- [美] 周策纵. 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 [美] 费正清. 中国: 传统与变迁.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美] 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传.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 [美] 詹姆斯·鲁滨逊. 新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美]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美] 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 2000

[美] 保罗·皮科威兹.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 北京: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90

[美] 乔伊斯·阿普尔比, 林恩·亨特, 玛格利特·雅各布. 历史的真相.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美] 西里尔·E·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美]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美]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美] 黄宗智. 经验与理论: 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美]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美]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美]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美] 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美]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美] 阿里夫·德里克. 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1937).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美]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美]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新旧历史学.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美] 李侃如.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荷] F.R. 安克施密特. 历史与转义: 隐喻的兴衰. 北京: 天津出版社, 2005

[日] 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日] 浮田和民. 史学通论四种合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俄] 普列汉诺夫.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苏] 波·尼·米罗诺夫.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苏] B.H. 米罗诺夫. 历史学家和数学——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英] 卡莱尔. 英雄和英雄崇拜: 卡莱尔演讲集.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英] 罗德里克·麦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第1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 [英] 罗德里克·麦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1958—1960）. 第2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英] 罗德里克·弗拉德. 计量史学方法导论.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英]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历史是什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英] 迈克尔·马尔凯.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英]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英] 罗素. 论历史.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英] 彼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英] 彼得·伯克.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英]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英] 约翰·托什. 史学导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后记

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否则就难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对于治学者个人而言，也必须具备一些基本学术理念与专业技能，也就是古人常说的“道”与“术”。但“道”与“术”从何得来？仅就史学而言，通过笔者多年的探索与尝试，深深地体会到，它们深藏于中外学者的治史实践和典范著作当中。因此，本书坚持立足于国内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前沿，结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用史学理论解读与分析中共党史研究实践，并竭力融会中西，将西方新史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力图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突破与创新。

本书虽以“概论”立意，但从“实证”切入，在论证有关中共党史学的理论问题时，避免宣教性的空谈，而是从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去寻绎、总结，以增强其理论的可参性与直观性。同时引导读者去领略一些优秀著作的史学魅力。因此，本书在撷取实例时，旁征博引，并不限于单一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广泛阅读中共党史领域前辈的学术论著，笔者受益无穷，且深深感念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优良的治学传统。前辈学者的课堂讲授、著书为文，皆重治学之道。他们的字里行间遍插着“治学金针”，示以授人，极大地方便了后学者觅得治学门径。研读前辈学者的著作，常常为他们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笔者也一直试图在教材中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好学风、好传统加以发扬光大。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白寿彝先生的名言，也是笔者的老师陈其泰先生曾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只有你真正地把生命投进去，你写的东西才有生命力。”不敢企望此书有长长久久的生命力，但是如果本书能够为中共党史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与帮助，那么，笔者这么多



年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也就不至于沦为“浪费生命”了。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共党史系一直致力于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为青年教师的科研、教学工作及学术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如创造机会让其参与马克思主义学院“211工程”、“985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学院自主设立的青年教师科学研究资助项目，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点教材建设项目等。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正是受惠于此。特此鸣谢！

宋学勤

2011年3月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BK811寓居